

# 目 录

绪言

- 一、反右派的由来
  - 二、大跃进与前奏曲
  - 三、大闹钢铁超英美
  - 四、阴谋阳谋反右花絮
  - 五、划成右派关键在领导
  - 六、言行上纲上线成右派
  - 七、我成右派的因素与结论
  - 八、文化大革命与反右派
  - 九、幸运和悲恸
  - 十、错划改正
- 后语

## 参考资料

- 叶永烈著：沈重的一九五七  
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  
叶永烈著：解秘名人秘闻秘事  
隆仁等编著：新编上下五千年  
江南都市报：朱德元帅最后的军礼  
王兆军编著：谁杀了林彪  
季羨林著：牛棚生活  
文聿著：中国左祸  
章怡和著：往事并不如烟  
章凡玉著：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美)程念著：上海生死劫

# 右派滄桑

## 緒言

讀《中國青年報》二〇〇〇年九月七日載陳萌的文章《右派依然讓我們痛心》！觸痛了我的心，其敢于直言不諱，也壯了我的膽；只是我現在才寫《我成右派是怎樣來的》。是基層的實際情況，高端的有人寫了。這是一棵無名小草的基層雜憶，引杜鵑啼血猿哀鳴的往事，九死一生夕陽耄耋話當年。往事不堪回首而常回首，是揭諦揭諦，右派自我揭諦，般若波羅蜜多揭諦，反右真諦。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當時連黨中央都不太清楚，毛澤東的估計，全國右派份子不過4000人左右，是初于北京說的。1958年4月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說全國右派30萬人，不久又說40多萬人。第二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摘掉確改悔的右派份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說右派有45萬人。1980年公佈錯劃改正時的統計數全國為552,877人，比實劃數必然少一點，因有些人亡家破了，未來改正。1980年5月計被摘帽者為54萬多人，剩下一萬多人繼續甄別，最後的結論是96人確定不予平反，其他所有的摘去帽子，在1957，1958年右派份子，絕大部份被送往勞動教養，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江西省公安廳主辦的彭澤芙蓉農場，收集贛、皖、

鄂的部份“牛鬼蛇神”，絕大多數是右派份子，人數在上萬計，圍墾尤進湖。南潯鐵路火車當時每車次抵九江，下車擔着衣被行李為押解往“勞教”、“勞改”的青壯年“牛鬼蛇神”，列隊數少時在幾十，多時至百以上計。

瑞昌賽湖農場原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裁軍時圍墾的雛型屯田農場，負責農業技術者蔡道總是國立中正大學首屆農學士，解放後入江西省農林廳工作。後也由廳調進賢縣農技站，被劃上右派份子兼歷史反革命份子，被判刑五年以上，刑滿于德安縣林泉鄉初級中學任英語教師。一九五二年省公安廳派二位處長來，暫任書記孫任場長。因當時我是省農林廳派駐瑞昌縣農業技術推廣工作隊隊長，哲、孫邀我去勘察規劃以完善建成勞改農場，收納牛鬼蛇神。然而幾乎是我自己規劃之後，成自己葬身之地，蓋我被劃右派份子後，是送往彭澤芙蓉農場勞動教養，却不收容而退返，這是罕見鮮聞的，蓋不够屬此類條件。

與我共單位同時被劃的右派份子劉如玉，判刑五年，于賽湖農場勞改，得血吸蟲病，是死于此。

對右派份子中所謂“罪輕一點的”，各縣均自辦墾殖場，右派份子和下放幹部一起勞動，實際是對右派份子監督共勞動。當時全民皆兵制，編縣為團，鄉為營，墾殖場為鄉一級，即營，但這混雜的集中營隊，不能叫“集中營”，其名曰“幹部上山下鄉”。

湖口、彭澤、都昌三縣毗鄰的武山，由九江地區開

發為國營武山墾殖場，供幹部上山下鄉。九江縣開發國營岷山墾殖場計有右派份子百多人，“老右”背後講過幹部、領導等人的是非，乃至談論了時政，我也看過晚上即開會鬥爭，受吊、挨打、罰跪之公審。

九江縣當時共劃了右派份子二百六十三人，錯劃改正時的統計數為二百三十二人，其中包括中右（中間右派）八十人，右派言行十人。如此經錯劃改正的只是88.2%，而未參入錯劃改正的為11.8%，以此推算，錯劃改正數552,877人，則實劃了626,844人，王明稱“劃右派”八十万，是毛澤東也承認批評他錯誤的八十万，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迫害（引王明著《中共50年》203頁）。香港《爭鳴》二〇〇六年一月號《反右運動檔案解密》，在全國知識界中一口氣劃了三百七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個右派份子。

全國右派份子加中右份子再加“反社會主義份子”及如果總計這些份子和受株連的家屬們統計在內，則為數達幾百萬人之多。毛澤東的估計“右派份子”數，北京只有四百人許，全國右派份子也不過四千人左右，僅折合實際的千分之七左右。但是只北京大學一校被劃的師生右派份子即達五百多人，八個民主黨派內被劃的右派份子九千多人，其中民盟便達四千多人，幾乎佔了民主黨派中的一半，幸而這對言行的可以無限上綱上綫之歷史悲歌已一去，願其一去不復返了。

各位受右派頭銜的溯源不一，有因上“萬言書”而

被加冕的，全國馳名者就是李天德。

李天德，當時年僅十九歲，重慶大學冶金系二年級學生，從保命哲學來說，可謂不懂政治、不識時務、不自量力、上萬言書《獻國策》被打成右派份子。四川雅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于文化大革命時給他定性為“現行反革命份子”，建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後來四川石棉縣人民法院判處六年有期徒刑。

也有本屬善意，從幫助黨整風改進工作出發，改善領導、幹部、群眾關係，而提意見後結果說多了或言辭尖銳了，領導不滿意，認為反對他，便是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而定性右派份子的實權，在單位領導的手上，因此很容易被“右派份子”緊箍咒鐵帽子戴上了。

江西九江縣人民政府財政科科長吳式行，高中畢業生，履行其財經政策，覺得縣、區級領導報自用公雜費趨奢，在縣整風牆報上寫了一篇《春風未過潯陽關》的文章，批評縣方整改不力，自身是共產黨員，履行黨員對整風之職責，但是家庭出身為地主，被劃上“右派份子”，取消當時行政十八級的工資每月 78.5 元，僅得生活費每月 20 元，上山勞動了四年餘，不是判刑勞改的勞動改造。

不少右派份子的年輕子女，因受累失學失業，苦受株連而埋怨其長輩，不應該亂鳴亂放，這是冤哉枉也。而起初誰也不知道這大鳴大放，是一個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的政治運動，這謀略是手段，屬陰謀抑陽謀？領

導要你上當入圈套，你是很難逃脫的。這些身不在局中人的幼稚無知子女，何能理解這種政治趨勢。

其實，這次反右派運動，毛澤東是蓄謀久遠，胸有成竹，近經粉碎高、饒反黨集團，打倒胡風反革命集團等之後。一九五七年，毛兩次全國出巡，頭次是煽風點火，後次是要突擊打仗；他對工人、農民點火，他發動工、農對知識分子進行戰鬥，說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他們稱老子天下第一，不算天下第一到也是第二，試問工人、農民，那麼你們算什麼？以激發工農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右派份子多是在知識分子中，毛即發動工人、農民向右派份子進攻，推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以掌文權，講的是他們過去受苦受剝削，念文念到不認識的字，只得問學生：“啊！這是一個什麼字呀！”

毛澤東的傳達報告中，還談過讀書比“殺豬”還容易，殺豬時，“捉它它會逃，殺它它會叫；”讀書可以隨意翻左便左，翻右便右，不聽話可以把他一摔、一拋，甚至一踢。

江青早就隨相呼應，把知識分子定為牛鬼蛇神中的老九，還加上一個“臭”字，即“臭老九”。這排序是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蛋份子）、右（派份子）、資（產階級份子）、叛（徒份子）、特（務份子）、知（識份子），其實她是沿襲得元朝關漢卿戲劇中的社會階層的排序為：一、官（大官）、二、吏（小吏）、三、僧（和尚）、四、道（道士）、五、醫（醫生）、

六、民（百姓）、七、獵（獵人）、八、娼（妓女）、九、儒（知識分子）、十、丐（乞丐）。由于元朝是蒙古族統治中國，知識分子是最反對異族入侵的，所以蒙古人把知識分子列序僅高于討飯的乞丐，尚遜于賣淫的婊子；而和尚講究成佛，道士修煉成仙，不問政治，不反對他們，醫生是其治病以求活命，所以列于高層次。

誠然“老九”之不如“老八”者，妓女色遜，媚態不能承歡嫖客玩弄了，只不過“門前冷落車馬稀”，尚可“老大嫁作商人婦”；文人被“誘奸”（梁公定名）過期失寵，却被拳打腳踢，甚至嗚呼哀哉！

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名娼賽金花媚住聯軍統帥瓦德西，苦口婆心勸說，竟從德國兵手中，救出了一萬多中國人同胞，儒豈若娼？

以上話說儒不如娼，然而娼也未必長盛不衰，市井傳聞：有在一張特大床上，共被同睡數裸體妙齡女郎供玩，其不如意者，也會被大個子男士，大腳踢出被褥，滾下床跌昏了的，尚是哭笑不得。權威縱欲，受禍者又不止“行”也。

## 一、反右派的由來

反右派運動這名詞，我最早在《聯共布黨史》中，便見過斯大林曾進行過反右派鬥爭，姑且不管其起因；然而我國的起因，實是一九五六年國際風雲驟變。

首先毛澤東的報告說：“赫魯曉夫捉到斯大林打了

一棍子”。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一個深夜，即赫魯曉夫于蘇共“二十大”會後，繼續秘密揭露了斯大林的心胸只有說狹窄，疑心重、殘忍和濫用職權；蘇共十七大會選的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一百三十九名，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被捕和處決了九十八名，佔70.5%；軍隊內的大清洗，五位元帥處決了三位，五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斃了三個，全部二級集團軍司令10個人全部槍斃。八十五個軍長中斃了五十七個，195名師長中斃了110個。全部軍區司令員被清洗，海、空軍首腦被槍決，所有艦隊司令員僅一人得以生返等。列寧建立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計十五名，斯大林清洗前四人已逝世，九人則死于其手，剩下的二人，便是列寧和他自己，自然要保平安。總之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蘇共黨員達七十萬之衆，這是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反右部份數據。

隨之，波蘭統一工人黨書記貝魯特死于莫斯科，什麼病？不得而知，但他是忠于斯大林的。波茲蘭城發生騷亂，三天後，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街頭，學生游行，推倒了斯大林巨像，并拖着在街上走等等。

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波、匈先後發生罷工、游行示威和騷亂暴動。這年秋冬，中國國內也出現一些不安定的情況，有一些地方發生罷工、請願的事；不少農村夏收後，鬧糧食、鬧退社的風潮，有所發生。知識界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後，于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等問題上，以為可以暢所欲言，



各抒己見，提出意見不少，有的意見提得尖銳了，李維漢說“姑嫂吵架”。毛說：“不對，非姑嫂，乃敌我。”便是反黨反社會的右派份子了。

一九五七年初，周恩來到北京大學，鄧小平到清華大學，發表了關於形勢的長篇講演，目的穩定和統一大學生的思想，青年學生認為矛盾壓抑；先後有北京醫學院一同學從40米高烟囪跳下身亡，5月1日清華大學水利系一同學跳西山鷲峰，5月3日土木系一女同學卧軌自殺等事。

毛澤東當然受到震撼，斯大林去世後，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五個整風學習文件。考慮如何應付這民主風潮，他可能分析了中國形式，認為中國經過了剿匪、反霸、鎮反、肅反，人民尚似馴服，中國不可能像東歐吧！但也要似民主姿態，于是提出了“小民主”、“和風細雨”、“毛毛雨”式的整風，這倒是頗具吸引力，以防患于未然，誰不點頭叫好。“大民主”怕難掌握，擴大了時，則疲于對待。小民主則對方惟有是聽，只接受認錯，毫無反抗餘地，毛澤東積累了有蘇區、長征、延安等歷次整風的成熟經驗，定下了具體步驟。

首先要你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些人也就從容發言了。而具有成熟政治經驗的人，仍然顧慮“早春天氣”，回暖會乍寒，發言仍有顧慮。

于是便由統戰部把民主黨派人士請上天安門，毛澤

東親自打招呼，說：“今天請各位，是要各位幫助黨整風。”言辭懇切，整風邀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1956年5月8日至6月5日共13次，不信也會信，就信以為真了。

其時，上海《解放日報》有社論《我們贊成“放”》，繼之《只能“放”不能“收”》，未數日、江蘇《新華日報》社論《大膽“放”好得很》，這實際是“誘敵深入”、“引蛇出洞”，讓牛鬼蛇神“大放吧！”，讓毒草“大長吧”！實則“騙入圈套”。農村諺語，這是推老人下坑。實際是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中的第十六計，“欲擒故縱”的效版。

且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大約只是十天後，便另一重要指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論斷就出籠，毛澤東即已作出“風向轉了”，實是“轉風向了”。

已是反右的定名、對象、數字等、均已內定了。

定名：由“右傾份子”、“右派份子”、“右翼份子”三名詞中，選定為“右派份子”，“名正”則“言順”了。

對象：柯慶施認為右派份子主要是這三類人中，一類是原來民主革命時期，民主黨中的右翼，一類是過去的當權派，國民黨時期的臺上人物，一類是政治上一向懷不滿的人，這樣後一類懷不滿的概論是廣泛的，可是可非的，其家庭出身或社會關係不良，只要偶有、甚至沒有亦度其隱有不滿的情緒，甚至牽強附會，套上定性，

所謂無限上綱上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便是“右派份子”了。

毛澤東更已明確具體規劃了，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專科生、中專生、高中生、行政、技術人員中，他們歷史複雜，或是叛徒，或是在過去三反，肅反被整的人，或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屬、親戚被鎮壓的，毛澤東說：“這些人是這次運動時鬧得最起勁”，我認爲可能有其人，但非盡是這些人，這些人都參加了鬧？意在按比例數據內，從這些人中去剔除，此僅是初步要劃出的“右派份子”。

數字：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上，指“知識分子 95%是好的，擁護社會主義的”。換言之，即 5%是壞的，不擁護社會主義的，預示右派份子的比例便是 5%，毋容贅言了。實際被劃的 10%以上。

由于有指標下達，不划不行，以致有選舉產生的右派份子。這是黑龍江省哈爾濱某小單位，幹部八人，均未鳴放而盡職盡責地工作，無一個是右派份子。然而其上屬單位硬要其一個右派份子，於是沒奈何，八人投票選舉。選舉出沈德章，惟其家庭成份是富農而當選了，監督改造幾年後逝世。（戴《反右派始末》）

必須清洗打倒，先造輿論。

右派歌詞曰：“右派、右派！像個妖怪，當面他說好，背後來破壞。”

反右派運動實際便是肅反，是新肅反。這是毛澤東

反復強調的。

原來鎮反歌詞曰：“鎮壓反革命，大家一條心，它是‘人民’眼中釘，不許‘特務’害人民，‘特務、惡霸’是豺狼，你不殺它它咬人，大家快起來，全部動員，干干净净，徹底肅清那反革命。”

肅反運動開始時，一次只準耳聞，不準筆錄的肅反傳達報告，毛澤東說：“敵人說我們殺了三千萬，三千萬是沒有的，百把萬則有之”，鎮反殺人數字，其實還是有公開記錄的，你可以看一下×××主編的《××公安史輯要（1949——1990）××省公安廳1993年第17——31頁，盡管該書關於鎮反三期殺人數字，記述不大一致，一個25588，一個25385，但總數字都比22000還要多出3000人以上。致于殺、關、管，當年就超過10萬人，不包括捕後又放的人。（引自北京社會經濟學研究所網站，2005.01.19楊奎松題關於建國初歷史研究選題問題的回信。）黨公布的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際鎮壓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保甲長的公務人員及地主，最少500萬人。“這些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民間書籍也隨土改抄沒散失焚毀，民間傳言：“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坑儒理應當。”祖龍想自其始皇帝至萬世，而傳至二世即亡，後有詩曰：“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這次整風反右運動，是把一些被認為殘渣餘孽，

次品之次再掃除，是否干干淨淨？於是後來文革又提出吐故納新口號，即若呼吸作用，血液經過體循環進入肺循環把二氧化碳吐掉，吸入新鮮的氧氣，生命不止，呼吸不停，此乃至要，為整風中反右派之目的要求這看來是近因，但是政治鬥爭千絲萬縷，原因尚多，難以盡詳。

以上乃全國性的概況，致于各自成右派的具體情形，是同阱異源，分類各有稍差耳！

## 二、大躍進與前奏曲

為了快速實現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推行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却值中蘇關係惡化，支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專家撤走，逼債包括歷次支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軍火武器等款項，還要加利息，多折成糧食從西伯利亞鐵路多日夜川流不息地運付，十幾年的一邊倒，如今反臉不認情，難向中國人民交代，把右派份子先反掉，誰也不敢亂說亂動了。

國家要發生饑荒災難，上層黨政領導早已心中有數。一九五六年瑞昌縣范家埠，區行政幹部探試佈置向吃商品糧戶要獻出有多餘糧食指標，我那時是該縣農技站長，適旁座相與見了。

民以食為天，無糧則亂，後來不是野有餓殍麼？為了安定民心，來一個農業生產放衛星，後稱共產浮誇風！狂吹農業生產技術大進步，出現千斤畝，萬斤畝。我初

見《江西日報》報導鄱陽縣的水稻衛星為畝產一千六百多斤，是江西省農業科學院書記兼院長劉志超率工作組去驗收的，以為劉乃農業工作者（南下行政幹部），當可信吧，但還半信半疑，直增產到畝產萬斤更多時，暗中計算，以盛稻谷籬底面積，置稻田一畝折合多少籬，再按稻谷一籬淨重，如此淨稻谷平鋪堆于地，應有多少高度等機械折算，不可有幾千幾萬斤，衛星喜訊難以置信，却不敢言。躍進虛誇，勢頭很大，距右派集中營地僅十五里的黃老門墟牆上却寫上：“躍一躍，快馬加鞭三萬六，”試想畝產稻谷三萬六千斤，不是有的吃，吃不了麼？

明明缺糧，來一個畫餅充饑，望梅止渴。那兒的衛星放得越高，那處餓死的人越多，憶報載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縣發射的“中稻高產”衛星，畝產高達十三萬多斤，衛星升天却人命歸天。結果餓死的人最多，一副省長被撤職了。而環江衛星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炮制的。

雲南金平縣衛星人民公社，中稻有號稱畝產 60479 斤，河南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報導小麥畝產 7320 斤，青海柴達木盆地賽樸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發射小麥高產衛星為畝產 8585 斤。

經昔信陽事件揭秘（松原日報 2004.11.6—17 日）載《1960 年 10 月 21 日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 4 名幹部將“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的調查報告”》送達李富春，李上報毛澤東，

毛 26 日批給劉少奇、周恩來請今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報告說：“正陽縣原報告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揭發八萬多人。新蔡縣報去冬今春死三萬多人，現增近十萬人，遂平縣渣呀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餘人，現揭發為死四千人，佔總人口 10%，有的隊死人 80%，不僅農村，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毛澤東斷言“這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挂着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奪了領導權”。然乎？

當時大躍進，深耕可以增產，便越翻越深，安徽舒城艾煊的故鄉，有深翻到大半人深、施下肥却底層土翻在上面無肥，稻、麥根系是鬚根系，吸不到底施基肥，增產造成減產，當時似未遇什麼氣候大災，則天災乎？人禍乎？

天災人禍定三七開，有歸之于天災七人禍三者，實亦有歸之于天災三人禍七者。

這次全國共死了上千萬人，是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寫在（873）頁。史諾著《彼岸》：“大躍進死了二千五百萬人。（Edpar Snow: Other Side of the River）居然有人以食鹽銷售減少量，推算減少人數更多。2005.06.16 朝網《中國歷史研究的若干熱點难点问题》修訂版供佈：“1959—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 4040 萬人。（3000 萬—4500 萬人）”江西鄱陽縣委書記張洪福報該縣三廟前公社水稻高產畝達三十萬

斤，四川郫縣畝產達 824,525 斤。報載一女孩坐于豐產稻穗上之影，是湖北麻城縣建國二社衛星田，早稻畝產 13,600 斤，是水稻分蘖後，將十畝插的稻秧，移集于一畝，盡量密植。成熟期于稻叢禾行中，放一窄長木板凳，小女孩盤腳端坐其上，使稻穗與葉蓋住凳。繼之麻城附近，更有報導高產三萬六千斤的，當時麻城縣農技站韓站長，原任廣濟縣農技站長時，我與之隔長江任江西瑞昌縣農技站長，有棉花紅鈴蟲聯防交往。

江西九江縣以新塘人民公社餓死的人在該縣最多，人民群眾含恨最深，到文化大革命時，該公社群眾要提鬥當時原中共縣委書記左鳳崗。如果去，必然交待不了，幸縣革命委員會保護不讓提出去，怕批而鬥，鬥而打，打而傷，乃至打死，蓋彼時左曾任該公社書記。不敢去經這風雨見這世面。

一九五三年選水稻豐產勞動模範，九江縣新塘鄉劉友松報其水稻千斤畝，是一塊稻田計 1.13 畝，因土改分田時，其豐產田的上田埂有一棵樹，會拔肥及蔭禾陽光，劉友松是貧農，作為 0.93 畝分給他，當時他先響應一季中稻改早晚二季連作，所收之谷二季折合畝產超千斤，報上全國水稻勞模。勞模年年要創新，他挖了一個小棕樹兜冒充是栽芋頭時播的種芋，九江縣農民叫“芋頭娘”，進貢獻給九江縣委書記左鳳崗，左高興笑得合不上嘴，說“了不起”，你真是全國農業勞模。

南豐縣鄧某，全國水稻勞模千斤畝更上一層樓，其



豐產田收割時，過硬請江西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系主任姜文正工程師去，當面收割驗收，先夜對姜主任說：“我們不待天亮即起早收割，你起不了早，可天亮到這田監視，那知姜更過硬，子夜十二時即親到該田，却尚未動鐮收割，即于稻林中放入了幾擔脫粒谷，明日可冒充此田產量。如此各地假豐產，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這饑荒即臨，黨中央是先知先覺，最清楚的。一次周恩來總理游廬山的觀音橋、天下第六泉，山徑不識，適一女孩早晨牧牛歸，詢其途并邀導游；返時稍憩該女孩家，周總理見其祖宗牌位姓周，談諧說：“到家了，”也詢問周女孩的父；“糧食够吃麼？”女父周老農彈淚訴苦，尚得強作笑容，總理告以這是蘇聯逼我們還債，以後會好轉的，臨行并饋其自帶旅游備饑餅干，周老農誠如獲至寶，是總理偕老農均吐了真言。後周薨，清理其事迹，有周與該女孩合影，即使星子縣委予以提升該女孩為幹部，因文化太低，僅列入鄉一級婦女主任是乃周桂花該人也。

此次饑荒情況，我環境所限見聞不多，僅在十幾里路直綫兩端所偶見的事，記憶猶新。

一次我赴潯，于黃老門火車站，目睹一位年約十五歲左右妙齡女孩，直直仰卧于站臺地面，氣息奄奄，搭火車的人，環繞凝視，皆無能為力，惟一人說這是餓的，若有人能送她去距此二里許的精神病院，有飯吃便會好！因登車而離，不知其後果。

另一次赴潯，于火車廁所門邊，倚站一位少年，叫我一聲“鄧老師”，奇而詢其姓名及何往，乃四十年代（1945）時，我任教新淦縣立金川鎮中心國民學校的學生陳天一。其父陳群乃解放前二屆的國民黨新淦縣黨部書記長，解放時任縣政府科長，被處決，該生之妻已携女離异了，孑然一身成流浪漢。因其叔于瑞昌縣省公安廳的賽湖勞改農場工作，投奔去吃幾餐飯，延續生命，但是一直未返其故鄉新干縣。餓殍暴何處？不得而知。

一次搭晚車，黃老門火車站候車室椅上，躺着一位大個子青年，口中唱着：“鳳陽花鼓”，我聞而叩詢他，此歌何時何人作品？他說明朝知名人，我想若果明朝人，口唱“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罵了明朝的始祖，豈不誅族？後查才知此民謠出自李闖王軍中，其討明檄文中尚有“徵斂重重，民有饑寒之色；玉修累累，士無報國之心”句，該青年適是鳳陽人，亦饑來驅其出，皖奔至江西。蓋往江西省人民政府的在工作之親戚家乞食，填其響如鼓的饑腸。

一次岷山場場長許木水端碗飯在門口吃，一老頭來討飯，許說現在分食，哪有多飯，便問炊事員有無多餘的飯？鍋巴給老頭吃了仍不走，拉他出去廚房要關門了，該老頭便倒地死了。

一九五九年一安徽逃荒農民帶二小孩，一女孩七歲左右，一男孩四歲左右，在九江縣馬回嶺墟，眼看即將餓死，于是把這小男孩半賣半送，以求活命。開價人民

幣三元，一個該墟附近排山村農民經該墟親友家祇借到人民幣二元柒角，帶走了這小男孩。分離時，大小號哭，悲哀慘不忍睹，觀看衆人無不落淚。由于大躍進時大煉鋼鐵，大砍森林，致生態大失調，大災荒，鳳陽人大逃荒，走四方，後來鳳陽縣黎園公社小崗生產隊農民，終于感到這大集體生產，不適合發展生產而歉收，人能力有大小，這集體生產，矛盾重重。1978年該生產隊人，認爲如此坐待等死，不如斗膽“包產到戶”，該隊20戶（內單身兩戶）115人，共分4個包產組，後更爲8個小組，每組只有二、三戶，有的是父子兄弟一個組，仍有矛盾，心不齊。討論時，二十戶有兩戶無人在家，秘密合訂一契約。每戶農民保證完成全年上繳公糧，不向國家要糧，如有不幸，幹部坐牢、槍斃等意外，社員全體保證這幹部的小孩共養活到十八歲，于是，分組分田，一夜即辦成。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尚在頭版發表《三級所有，隊爲基礎》應當穩定。年底該小崗隊糧食產量達到12萬多斤，比以往年3萬多斤，增達400%，才真正的大躍進。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說：“政策放寬，效果很好”！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轉“1981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包干到戶，包產到戶”。1983年初全國農村實行“雙包”達93%，1984年土地承包延

長到15年以上，此乃後事。

新鳳陽花鼓出現：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鼓鑼聲：咚咚咚鏘，咚咚咚鏘，咚咚鏘。）

大戶人家賣田莊，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討四方。（鼓鑼聲）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如今已解放，生產從事大躍進，畝產水稻萬斤糧。（鼓鑼聲）

皇帝已被拉下馬，執掌實權太上皇；階級鬥爭定為綱，人民膽怯心徬徨。（鼓鑼聲）

說鳳陽，道鳳陽，貧富大小空肚腸，依然外出去逃荒，野有餓殍卧路旁。（鼓鑼聲）

日未午時腸鼓響，可食野草全採光，父帶兒女討四方，二元柒角賣兒郎。（鼓鑼聲）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梨園小崗村，二十戶人夜相商，公社生產非方向。（鼓鑼聲）

“包產到戶”且試嘗，不要國家供粒糧，保繳國家的公糧，如此居然未逃荒。（鼓鑼聲）

說小崗，道小崗，如此討論頗緊張，幹部耽心坐牢房，大家共養其兒郎。（鼓鑼聲）

契約如此訂妥當，該年增產四倍糧，如此政策新花樣，全國農村都模仿。（鼓鑼聲）

鳳陽花鼓女郎不再唱着“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

鼓乞四方”。

其時我所居九江縣岷山，一日晨起入廁，見一死尸，昨夜置糞坑邊地面，人云是“富農份子”，修荆林街（古柴桑）馬頭水庫死的，暫放此待其家屬來收尸，問他人其何以死？衆云修水庫群衆，食難填腹，焉有力掬土上壩，監修幹部找動力，號召“對社會主義有認識的，便赤膊上陣”！正是嚴冬，北風起兮草枯僵，安得勇士兮衣脫光！于是先詢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獻忠”開始，誰敢說沒有認識？赤膊蜂涌擔土前跑。在朔風野地，饑腸漉鳴的情況下，冷風戰慄，怎不以跑而發熱取暖求生？也就有意邊跑邊掉，結果一擔土滿加重上，到壩上大約只有半擔，不少人腦內唱着“孟姜女”哭長城的“冬月裏來雪花飛，赤膊上陣無單衣”！口中不敢哼出聲音，這“熱”、“愛”社會主義的“大躍進”，躍爲簡化字“跃”，與“妖”同形，九江土話有點諧音“要”，農民群衆認錯別字，這大躍進也就讀成“大妖進”音。

這水庫內是陶淵明故居栗里，我曾伴从兄鍾伯，華中、中山大學副教授，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授同往考察過兩次，有《栗里說》、《栗里再說》文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歷史學報。

己未端午日，从兄自南昌至黃老門，陪其訪荆林街陶公故里鹿子坂。其詩曰：

一物不知儒者耻，每憶斯言傷栗里，

栗里紛紛皆浪傳，故里唯有真鹿子。  
江洲司馬訪后稀，千載鄉賢誰料理？  
佳期不對妻與孥，伴我攀山踏雲水，  
腸饑訴餐向人覓，揮汗借榻雷斲起。  
念昔東波端午高安游寺時，子由守  
官不敢陪杖履，三子相從一時樂，  
豈若吾儕縱雙趾。高安投檄爲兄囚，  
君亦戴盆廿年矣！辛酸舊事任東流，  
賴有佳兒勝吾喜，相看俱是暮年人，  
一游後日難忘已。敬遠惠連動詩篇，  
陶謝高風樹前軌，湖山佳處努力邀，  
老健清閑尚能倚。

## 鹿子坂

众水落千峰，萬仞東南瀉，鹿子扼其西，  
密與柴桑亞。當時坂中賢，詎識遠顏謝？  
朝杖出西廬，弱女斟來夜，時偕丁劉遊，  
不廢春秋稼，一朝作參軍，始就上京舍。  
千年留故宅，有客忽來夏，青衫騎馬過，  
詩句時壇霸。禮賢后世疎，攘美競紛詐，  
無知僭栗里，謬久難自化，吾爲昔賢憂，

今來屢增詫。

若陶淵明見此修水庫景，必定勝過《孟姜女哭長城》的詩歌更多。今竟流露當時參加修該馬頭水庫的右派份子原九江縣港口小學老師葉翔中詩詞，葉于1957年被錯劃右派后，悲憤使雙目失明。其《蹇懷集》中，《西江月》詞有“劃右整風蒙辱，學耕牛后覩顏，風風雨雨苟殘延，最是傷心瞎眼”之句，其《馬頭挑水庫》詩：

風雲湧起大高潮，山峽築堤蓄水牢。

調集民工人萬衆，定籌計量土千挑。

橫眉好漢獎三飯，俯惜怠工罰整宵。

但願牛頭馬嘴吻，鳳凰捐翅鎖金蛟。

註 牛頭山馬頭山間築壩相連儲水，從牛頭山北之鳳凰山兩翅取土。

## 在馬頭水庫患病

遣赴馬頭似杞良，天寒衣薄思孟姜。

疲勞過度四肢腫，饑餓交加六腑傷；

日食半斤車百運，夜餐四兩土千筐。

當年萬里長城築，多少儒生埋異鄉！

註 范杞良罰築長城，孟姜女送寒衣。車推土，筐盛土，日食糧九兩。

### 其詞：阮郎歸·吃糠焦麵

馬頭勞動嘆時長，人將餓斷腸，一天挑草躲回鄉，磨成焦麥巧糠。心歡喜，有補糧，難吞滿口香。哪知密結腹難當，可憐掙脫肛。

### 阮郎歸·剝油樹皮吃

塘邊一棵樹名油，水車龍骨求，樹皮可食時人謀，熏成黑饅頭，澀又苦，難下喉，餓人也不留，後來隊長找原由，批評何有羞？（油樹即榆樹）

### 三、大鬧鋼鐵超英美

此次我幸未被派去修如此水利，而參加大鬧鋼鐵了，蓋毛澤東號召有云：“帝國主義所以敢于欺侮我國，是因為我們的鋼鐵少了，要急起直追，三年基本上超英國，十年超過美國”來一個群眾大鬧鋼鐵運動！金口玉言，一語即在全國開展運動。要求 1959 年鋼產量達到 2500 萬噸，便超過了英國，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所見橫直數十里的遍山大森林，一砍而光；樹木鋸成樹筒木段或燒成木炭，以作煉鐵燃料，我沿途所見樹筒堆集錯雜，或若短斷矮化古長城，全國面積之大，我未見之，無法統計其立方米數，運樹筒礦石人如行軍、蟻陣數里至十數里。後來失去生態平衡，形成自然災害。

九江縣城門公社有一座礦齡不足的鐵礦山，大煉鋼鐵中，也認為“可以”而進行開採，礦石分運到各處建立的煉鐵“土高爐”，以木炭火熔化出鐵（這作法是全國性的）。有載宋慶齡的後院也建立了如此“土高爐”，這位孫中山先生夫人彌留之際，加入中國共產黨受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均1981年5月）。正是親愛的毛主席，我也遵照你的指示辦了。慶齡後骨灰葬上海宋家陵園，未瘞南京紫金山，不似何香凝之與廖仲凱合葬。因父母尸骨文化大革命被掘暴于外，尚是周恩來知後重使入土，慶齡認為愧對父母，死同地葬且護陵，却愧對孫先生夫！

我肩擔傳運過松樹筒，或鐵礦石，由于身小體弱，擔量和行走，不敢五步一停，十步一攔，只有駝腰慢徊，咬牙開腳，致均居“殿後和尚”。開大會點名批評時，則每次均“獨佔鰲頭”、“頭名狀元”！

我身體孱弱勞動力差，以致有點勞動力的“老右”也不願與我共同定額勞動，拖了他們的後腿。一次早稻移栽插秧，却分我孑然一身包插一小田，我便學以致用，進行小兜密植，少株淺插，以爭取增加有效穗數，低基

節分蘖，單穗增着粒數和粒重，可是久插腰酸難支，便蹲插移步。當時上山人員後是我學生陳文夫見之，當其任九江縣政協文史會負責兼老協工作，相晤時常對我嘻戲效顰，但實際當時收割，強勞力“老右”陳學思告訴我，以我栽的該小田單位面積畝產量最高，實踐了科技有效，如是我對陳文夫之效尤嘻戲，回以相對嘻笑，命名這是“蛤蟆插秧法”。

後來換了崗位，去拉煉鐵土高爐旁的助燃鼓風箱，做鼓風手。一天站立拉十多小時，疲勞到稍一停拉，即可站立“鞠躬如也”地鼾睡，換班去休息，顧不得污臉、灰身、髒腳、倒在地鋪床上，便一覺眠長。糊塗夢中，稍聞到“吃飯”二字，或碗筷響聲，便滾掙而起，怕失掉號稱三兩米一小碗的飯，饑腸難飽，又得去拉風箱做鼓風手。

然而木炭火力溫度僅八、九百攝氏度，而鐵礦石熔化的溫度要  $2000^{\circ}\text{C}$  左右，鐵的熔點為  $1812^{\circ}\text{C}$ ，後來看到鋼鐵廠煉鐵是鐵礦石粉末拌焦炭粉混和入高爐，這土高爐怎能出鐵水？

由于反了右派份子，逢人且說三分話，可以為所欲為，冶金學家、地質系師生，很多在鄉下體驗生活，豈不知之？只是知之不說，恐怕言者有罪，所以未可全拋一片心，都是知無不言為知而不言了。

于是主持煉鐵的工農幹部，絞盡腦汁，妙想天開，提出巧計“以鐵引鐵法”，他們將破舊鐵鍋、鏟、軋碎，

倒入煉鐵土高爐中，這些是第二次的熔化，且軋細碎，需熔化的溫度比鐵礦石可能較低一點，偶爾有的熔化了而從爐底流出了一次小便尿水似的鐵液，於是大家歡喜若狂，大叫“出鐵了呀”！“出鐵了”！“報喜去”！“貼喜報”。

北京市居民也紛紛將自己家中的鐵制廢用具，以手推車送去煉鋼。（圖載《新編上下五千年》2953頁）這大鬧鋼鐵，全國動員了九千萬人，全國當時人口七億人，佔13%。大小土高爐建了數百萬以上口，高的不達四、五公尺，小的幾公尺左右。男勞力都參加了，農村留下的只有老弱婦幼，農作物成熟無人收，一些脫產幹部逼着去收割，日間勞動了，夜間那有精神再勞動？只有在田間稻草上睡覺，派人守哨路口，見有幹部來了，便大聲偽咳，睡的農民即速滾起，打禾脫粒，“叮咚”“劈拍”像在打禾，待幹部得意洋洋往巡他處，走遠了，便又睡覺依然。這就是大躍進，可是肚子吃不飽，農民離鄉背井，外出逃荒，共產主義是天堂，誰也不相信。彭德懷說：“這餓肚子的天堂我不去”。

一九五八年召開<八大>會議時，彭德懷反映其在人民公社後，去湖南農村調查，有個傷殘老紅軍詩：“谷散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與呼！”毛澤東說：如果解放軍跟彭德懷走，我就得又去打游擊，於是1959年6月到韶山，1965年5月22日至25日上井岡山憶舊。

農民老嫗們也用陶器瓦罐盛幾小塊鐵礦石，埋入竈內炊事後的灰燼中以煉鐵，真是鮮見罕聞。雖然煉不出鐵，但是上級得到有個別“出鐵喜報”，笑逐顏開，認為這群衆大鬧鋼鐵運動，開花結果了。

九江縣進而便行更大的躍進，更大規模的煉鐵運動，利用城門公社鐵礦山，一山體自然生成一圍椅形山坑，底層架松樹筒，澆煤油上堆鐵礦石，層層相間疊累，山缺口作大爐門，門口挖溝一條供出鐵水，正是“城門（公社名）大火舉，紅透半邊天。”相隔數十里，可遠觀而不敢褻玩，結果松樹筒成灰，鐵礦石依然未化，真是可悲的今古奇觀。

事實上未煉出鐵，但是上級得“喜報”，便來文件要上繳鐵的任務，這却維艱維難了，公社只有將任務分攤到大隊、小隊、村、戶，各戶只有把家中的鐵鍋、罐、農具等，軋碎抵數而上繳，以完成任務。各村成立公共食堂，這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當時傳達劉少奇也高興得意說：“大家說共產主義好，居然共產主義社會也就到了”。

社會主義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按需分配。這各盡所能，大躍進夜以繼日人身無餘力，各取所需，每人每天大米八市兩的飯，農民人平均稻谷六兩，大家吃食堂，不必各家執炊，婦女勞動力從廚房裏，大大解放出

來了。每一自然村編為一個生產隊至幾個生產小隊，每一小隊共一食堂，一切米、油、鹽開門七個字，尚有醬、醋、茶、柴均集中于食堂，幹部、隊長掌握之。如是群眾菜裏油少見，幹部菜羹盡是油，衆目昭彰，對這共產主義是天堂，反右派運動在機關單位進行，農村是批鬥四類份子地、富、反、壞，誰敢多嘴？

還有割資本主義尾巴，依家依戶的菜園，把所有菜拔鋤鏟拉，一掃而光，有的受災戶說好話求情低泣。有的潑辣婦却罵：“你們是日本鬼子下鄉，不得好死”。大家吃食堂。

食堂吃不到半年，生產隊存糧漸空，有的地方一天三餐飯祇好三餐粥，而至三餐薄粥，二餐薄粥，食堂開餐鐘響，農民筷子敲碗，唱：“口當、口當、口當，一碗薄粥湯！”

然而虛假事物怎能持久，大勢趨敗，食堂終于瓦解了。食堂時期，盡管自己隊裏人，日未午，饑腸響如鼓，招待上級人員及外來客，却飯隨其餓腹飽填；出現了悲劇笑話：一次九江市國棉一廠女工，支援江洲人民公社江心大隊第六生產隊檢棉花，隊裏招待有大米飯、玉米棒、蔬菜、豆腐，還殺了一頭豬。女工也是久久受餓的，到此放量吃，一女工吃了飯又吃玉米棒，久饑能飽食，嘻笑大張其口，結果竟飽脹死了。農民說：這是築斷了腸，饑腸婦成斷腸人！

食堂解體，原由分而合，今合而又分，因不久前將

鍋、罐等繳了鋼鐵任務，分爨安得炊具兮以執炊？突而其來，欲購無售，可忙煞了翻砂工人，也供不應求。周恩來對這大躍進，大鬧鋼鐵的總結是“煉了鐵，也練了人，”仍是成績斐然。

沒有這前奏曲“反右派運動”的鬥爭，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能如此順利迎風飄揚無阻地進行試驗麼？但是結局依然倡多、快、好、省寄望，仍成少、慢、差、費告終。更由于不接受檢查匯報意見的逆耳忠言，繼續演成了中國人民的十年浩劫大災難，文化大革命也即第二次反右派鬥爭運動。

我家那時大小五口，對這糧荒階段是怎樣度過的呢？我本人一九五八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墾殖場勞動，有一份農業工人的糧食指標，人個子矮小，需飯量較少，當然也仍免不了“日未午，饑腸響如鼓。”妻偕二女一子，幸得隨上山遷此農場，長女與子在我被打成老右這悲劇的刺激教育下，分別考取了高中、初中。女入九江市一高中，戶口遷入市，糧食供應標準按大城市學生給，稍多一點，子與妻及幼女戶口，仍于鄉下農場境內，後來兒子得入廬山高中，全家有勝農民的糧食標準，當然仍難以飽腹。

家人能遷入農場，也是機遇，我成右派份子，開除公職，毫無工資，算是毛澤東的恩賜給以生活出路，每月生活費人民幣壹拾伍元。怎樣供嗷嗷五口生活？妻提出只有返故鄉，死也只有骨瘞家山，種田不會，病貧交

迫，何得生存？但我自認爲沒有犯罪，即使在這上山下鄉的集中營地，估計勞動或不會長久的所謂“改造”，實在是糊糊塗塗，不識大局，竟仍主張子女升學，所恃者惟妻能縫紉耳。

起初我是被罰配于九江縣林牧農試驗場勞動改造，二個月後，因我勞動力差，該場便將我與下放岷山的人員中對換一人來本試驗場爲炊事員，我便調到岷山，這右派份子集中較多的營地，雖然不能叫而實際却是集中營。

從原單位江西省九江農業試驗站（一九五九年更名九江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起解出來後，便是與家音訊隔絕。這次往岷山墾殖場，經九江市必須一宿旅社，以候翌晨開出的火車，押送人上街游玩時，我利用了這片刻未監視之機，偷着打了一電話給尚留原單位的妻子，告知翌晨經距家十二、三里的黃老門火車站，下車步行去岷山；屆時妻孥已守待于站臺，我擔着行李，惟相互注目含淚，反手握示早寫好的紙條，子得見而取之。條示勵其力學勿輟，夫妻相見不準語，惟有對視酸淚流。

到了岷山，申請妻室也隨上山，承蒙墾殖場場長許木水批准，銘心感激。

妻上山從事縫紉，致子女得以繼續升學，全家只一擔半被絮、衣服行李，二擔中一頭是一架縫紉機，妻抱二歲幼女隨行李步行三十里上山，適我勞動歸而途遇，回想與抗日戰爭逃難做難民相同，夫妻相視，欲哭無淚。

在山上妻孥仍屬原商品糧，標準稍高于農民，仍不足充饑，惟有吃了上餐，忍耐饑餓等待下餐；星期日學校假期，子女回家，便登山采摘野果及含澱粉較多的栗子等，煮食或磨粉濾渣，粉給兒子上學輔食，妻日摻渣食，尚得換省節約少許米，給兒子帶往學校，輔增食量。

隨身三歲幼女，見其母親煮的粥，幾粒米飯于米湯中，似幾葉扁舟在鄱陽湖中漂蕩，哭着說：“媽呀！這是粥嗎？又喝這“清水粥”呀！”娘亦隨泣。幸妻所居該岷山曉陽埠孫家村，從事縫紉低收工價，或無償給人縫補，該村食堂的執炊老大娘，見如此母女，讓她倆也參加以其己米置食堂蒸籠中代蒸飯，執炊大娘，偷偷地以兩個手指尖，如數家珍般于全蒸籠各戶的飯鉢中，挾出幾粒至十幾粒、幾十粒米，置母女碗中以益之。後來妻也冒天下的忌諱，不怕扣“變修正主義”的大帽，修正主義便是反社會主義的，那時誰家單獨種了一點菜、幾兜蘿卜或扦插了紅薯，走個體不走集體，農村便叫“變修”。妻子餓不過，偷偷于雜柴林叢中種了幾粒南瓜籽，却真的結了碩果，有一個南瓜竟重達四十餘斤，可惜山鼠挖吃了一個洞，不然可參賽競選勞動模範，得瓜輔食，豈曰小補之哉？

歷史上有過“卧薪嘗膽”，我也經過了“卧薪嘗糶”，這是一九五八年在右派集中營地，但不能叫集中營，是幹部上山下鄉辦墾殖場。既是大型農場，便要辦得像個樣版，麻雀雖小，肝膽應全，現代化科學種田是離不開



氣象，於是決定在一個丘陵山上建造氣象臺，實是氣象哨，由一位縣銀行下放的金融會計工作的幹部王友福主持，其實右派份子中有大學農藝系畢業，受過江西氣象臺臺長宋國模教授的氣象學課，以及留日學林業的，但都是打倒對象，有技不能展，只能做苦力，勞動改造，于此平山頂成氣象觀測場，建觀察室等，我是爲泥工挑泥桶送泥，不能叫苦力，這是勞動改造鍛煉，生活體驗。

一天大雪降臨，尚未到收工時間，也未屆黃昏，不能收工。頭上身上白雪，豈敢擅離工地？後右派們乘王領導溜下山回家避雪去了，便躲進這剛砌牆、未蓋瓦的氣象記載室小屋，背靠北牆，可抗北風，撿點做屋木皮木屑燒火，倒也享受了兌現的自己勞動成果的溫暖。爲了建臺，住的是磚瓦窯廠的制磚工棚，一夜大雪吹覆得個個滿床，好似埋在雪內，幸天亮均起床了，瘞雪幸未僵。

氣象哨的兩根做風向杆的杉樹，已由南潯鐵路運抵距岷山場四十多里的沙河街站，必須去抬，長十二公尺以上，六人抬一根，我和幾位弱夫如張壽昌，潭勳等，受同是天涯論落人的老右關懷，總是抬點樹杪尾隨，重兜由農民出身幹部及身強力健漢右派份子承擔了，陳學思非常賣力，很想和很相信賣了力，可以將功贖罪，結果壓得肺咯血，後幸治愈。當時也沒贖到罪。

因樹卸落于車站南端二里以外的鐵軌旁或路下，尋找到下午四時左右始發現，在街中餐，吃的南瓜糊米粉

拌爲團，炕燒或油炸的，當時是盛饌，已消化了大半，抬樹只行幾里便開始下雪，越下越大，約行十餘里，天色漸黑，大雪紛紛，步履維艱，至排樓村，賴九江縣的“老右”們當地人具鄉誼交涉，接受了入屋內避夜躲雪，用糧票出高價，買到一點米煮食。

這個自然村的農民，知道這些上山下鄉的，現在成了“老右”，過去是幹部，尚有幾分同情感，給了一些村食堂種的蔬菜及一點油炒菜，并端點霉豆腐佐食，所購之米何够盡飽，個別農民竟獻出一些自己儲備接命糧“糠粑”，食之粗卡咽喉，比中午在沙河飯店吃的南瓜粑，固然天壤之別，但饑不擇食却也津津有味，我們幾位體弱力微者，只聊嘗幾口，禮讓給體強扛大兜者，農民尚各自抱一點木柴送來，燒得熊熊火焰，尚可驅寒。

該室內有一個小小儲谷倉，這年頭那有谷儲？是以空的，今晚坐以待旦是一夜難挨，首先是那位九江縣人民政府財政科長寫了“春風未過潯陽關”，而被劃的右派份子吳式行，現在却逢冬風、雪風，他想閉目稍憩，先廁身倉內，我也步趨隨入，後繼不乏其人，這房中房又要暖些，倉中還有一些高粱秆，吳先抱蓋其身，并笑謂這是卧薪嘗膽。有的右派份子說已被打倒了，你還敢有膽，好得這次抬樹隊伍，全是“老右”，幸這次“老右”中沒有出現想立功贖罪、早摘右帽的，把這言“卧薪嘗膽”的實事，甚至上網上綫要報仇，向上級領導匯報，否則吳式行甚至株連他人，是一定要遭災挨鬥打罪

加一等的。

翌晨喜獲天晴，即踏雪歸程，抵臺嘗受王領導的一翻責未當天回歸，其實王已受了場長之責，說他放走了右派。有追思昨夜者，認爲小倉是農民的鷄埕，秸秆鷄栖，也回憶昨夜房角有數鷄偎抱，蓋見人多未敢入埕，今并見有人屁股褲上貼了鷄屎粑迹，昨天日夜吃了南瓜粑、糠粑，又坐了鷄屎粑，且卧蓋秸秆，于是將“卧薪嘗膽”改爲“卧薪嘗粑”，亦不可或忘也！

岷山右派份子較集中的勞動，最有趣的一次，爲冬季雨雪天，田地間不能開工，集中于倉庫來分開檢的野生油茶果的種籽和果殼，隊長等領導則回房休息了，參加的全是右派份子和少數落後的上山幹部。大家的話打開了，祇要不涉及政治，都爭先恐後發言，各講故事。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演釋到今古奇觀，儒林外史、聊齋志異、西游記唐僧以觀世音送的三頂緊箍咒帽戴上三個徒弟，跳脾便將其咒一念，頭緊得會痛，管住了徒弟等，如此老右，真似人才濟濟，欲明日繼之，天晴了，又各下地勞動。

我如此上山下鄉勞動了一年四個月，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幸逢九江市以岷山勞動學校和蛟灘湖勞動學校合并于岷山，成立九江市農業技術學校（當時市、縣合并稱市）缺乏合格專業技術老師，在岷山集中勞動改造的一百餘名的右派份子中，選了我和徐上達二名，真是百內挑二，徐上達是土地革命時期即共產黨員，任共產黨

湖口縣委書記，攻克星子縣城時，便是他從攻破城牆缺口衝進去，打開城門迎進農民軍的，功勞非小，土地革命失敗，他由親人是地方紳士，擔保自新了。抗日戰爭時，在貴州省從事林業生產經營工作，蓋其畢業于江西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林業科，解放後曾任九江地區林業局局長，九江地區農林水辦公室主任，後降為九江縣副縣長，是民主黨派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于大革命時期的自新，便是疑其為叛徒而劃成右派份子。

我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南昌未解放，國立中正大學農藝系畢業，有資格，解放後任江西省農林廳農業技術推廣工作隊先後歷任過派駐樂平縣瑞昌縣隊長。由于美國封鎖陸地棉進口，上海市紡織廠停工待料，我國大改土棉植洋棉即改中棉植陸地棉，須技術栽培防蟲的改進，我相繼任瑞昌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站站長，瑞昌縣人民政府農林水利科業務負責人，繼轉從事試驗研究，調任江西省九江農業試驗站旱作組組長，有亦稱旱作研究室主任，并曾代站長。一九五九年更名九江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今九江市農業科學研究所。與秘書羅林楠有隙，以莫須有之罪，劃為右派份子，我非九江縣幹部，其能知我者，蓋當時岷山墾殖場場長許木水，負責對我的肅反審查，知我的歷史檔案最詳，非屬歷史反革命範疇而提名通過的。

隨徐皆有專業知識，我調入該校任教師了，心想要更好地“將功贖罪”，工資也就依然每月人民幣壹拾伍

元的個人生活費，一如前節約五元，救濟家用，任課時數，力爭賣力，一般教師每周十二課時，我達二十四課時，幸運的是妻和幼女得遷入校內，食堂炊事員分飯，可能老師的比學生的多一點；吃超了，學校對食堂有超指標補助。

我調入校，從體力勞動轉為腦力勞動，耗飯量也較少了，可節約一些米；家遷入校，糧食定量按農工標準，比居民標準高了一點，食堂打飯又多了一點，如此苟延殘喘，度過這糧荒時期了。

國內情況如此，臺灣想乘機，叫囂“反攻大陸”，我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告臺、澎、金、馬同胞書”。且一九五八年已對第一個企圖解放的地點金門，解放軍以強力炮火轟炸了四十四天，馬祖空戰半個多月，不能攻克，全軍覆沒。

金門守將為胡璉，我軍前綫指揮葉飛，國民黨在公報中宣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神聖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借武力。”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毛澤東起草的《告臺灣同胞書》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你們和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在此次戰鬥，美國還調地

中海第六艦隊一半兵力到臺灣海峽，加強第七艦隊。毛澤東只有便說得十分風趣透徹：“炮擊金門，就是要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該次幸未打成大仗。

其實反右派運動便是備戰，把這些認為不可靠的家伙，初步軟禁起來，在當機關單位反右開展的同時，農村便進行夜夜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蛋分子）四類份子，鄰村鬥爭會上的呼口號打倒之聲亦傳入吾耳。

若真的打起來了，右派份子的後果與命運又將如何？誠難逆料。沿襲昔日“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這靠不住的>10%知識分子，先暫且把他們上山下鄉集中起來或判刑、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等。緊箍咒帽戴戴，小腳鞋穿穿，美其名暫且作為“對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的改造”吧！

一九五八年春天，中共中央先後即在南寧、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于此二次會議上，都揮着改變中國歷史的巨手，大談所謂“反冒進”，却批評周恩來等同志：“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打擊群眾積極性”，“給右派進攻以相當的影響”等等。

一九五八年所謂反教條主義，打擊劉伯承、葉劍英、肖克、李達。一九六〇年打擊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李達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到湖北省委受批鬥歸，死于小車上。

一九五八年國慶，劉少奇就建議特赦罪犯同時，給

右派份子寬大處理，有人求對這些右派份子也大赦，毛澤東說：“摘帽子，寅時兩個，卯時兩個，要什麼大赦。”意欲擒之，何能縱之，長期帽子戴着不敢動，豈不安靜？歷史改朝換代，勢必吐故納新。

毛曾反復強調過：“反右派運動便是“肅反”，是“新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民主黨派”。

結果在這岷山集中營地的所有下放右派份子，勞動改造到一九六二年五月，由九江縣統戰部辦了一個《改造右派份子學習訓練班》，中心內容是叫大家認錯，口服心服。然後戴帽子上山，仍戴帽子下山，一般返原單位或另行適當安排，不恢復原職，依然改造工資或有略增數元者，一般以一九五七年冬十二月上山，從五八年五月處分降工資伊始，至六二年五月訓練結束，足足四整年服役，不是判刑的刑期四至五年的勞動改造，是上山下鄉，弄得你啼笑皆非，好玩吧！秦始皇罰修築長城刑期是四年。毛澤東說：“秦亡于修長城，我們是修天安門”，實際右派份子等牛鬼蛇神的集中上山下鄉是墾荒生產，秦之築長城是防匈奴入侵。

我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幸運地先于右派份子中百內挑二任教了，衆羨幸運，但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雖任教，這右派份子教師，依然與一般教師或幹部有差距，磚砌瓦樓房是沒有我住，只有和工人住于上山時搭的蘆葦芭茅棚內。

認為現在是教書了，必須參考資料，于是往相距三

十餘里的原單位，將妻子給我妥寄存在農工熊家炎屋樓上的農學中西文書籍約六十餘斤，不以卷計而按我平時勞動的體力負荷所勝任估計斤數，費時一天掙來置臥室，因隔壁是已一年久的干燥茅屋燒水間，居然火星從烟囪落屋頂，茅棚起火大焚。

我去搶書，搬出門外，人灼火，火推人倒地，掙起前跑，為人搶救出火境，臉、後頸和手背全被燒傷，表皮水腫，衣、被盡焚，書未救出。若遲往運二日，則書不致受此不測火焚，固是自然災害，是繼五零年莊園佃戶于土改焚我書的第二次。那時佃戶怕株連而焚書，五十年代被焚之書，是先父中醫藥書及我的農學生物學中西文書籍，還有科舉時的古典文學書。祖傳經史子集數十書箱，為避抗日戰爭時兵災、寇災，妥運儲于新淦縣的最高山黎山煌源村，亦一九五零年為山民付之一炬。

該次學校火災，校方炊事員廣東人周杏南是軋花廠廠長，上山下放人員，搶救已物重燒傷，當晚由南潯火車運往九江市搶救，不治死亡。我是第二重傷，只有休息幾天，裹頭纏手以傷員恣態授課，也未立功贖罪。

這些書彼時未焚，恐也難逃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關。

我雖身名為教師，但是身後却由校黨委書記命定了一位監視人，暗中注意我的言行。我的監視者，為同一起任教的獸醫教師周龍水，當時中專畢業，現高級獸醫師。不過他并未對我吼斥過，右派錯劃改後，周自動對



我說的，并說：“我沒有對你囉嗦吧！”

#### 四、是陽謀，陰謀？反右花絮

幫助黨整風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要大鳴大放，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等等。結果言者有罪，是猖狂向黨進攻，鐵盆帽子飛來了，你是右派份子，認為這是陰謀。毛澤東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

實際上，對右派份子的定名定義，數字比例、方法步驟、對象準則、早已訂好，敘述如前，不贅。

人云“酒有‘四特’，右派亦然”，前面柯慶施所定的三類人中，對後一類是政治上一向不滿的人，可以大做文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謂無限上綱上綫，說你“是”，不是也得“是”，後來錯劃改正，便定為冤、假、錯案，不是便不是。

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中之第七計便是“無中生有”。

但是歸納右派份子的特點不外是：個人經歷了舊社會，有沾染反動黨、團關係，此其一。出身家庭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此其二。社會關係有不良事迹牽連，有臺灣海外關係，有家屬或親屬被鎮壓的，此其三。此却株連三代，廬山中學高中畢業生中，

一九六四年我的長子在班上名列第五名，還有第二名的李慧君（女）且是班上團委書記，因我是右派，李因其祖父入了“從善社”被鎮壓了，該年班上已升大學9名，鄧、李皆不得錄取。其四是秉性耿直，好說實話，直言不諱，領導關係不良。如此是為“右派份子四特”，清洗革命陣營，階級隊伍逐步暫定比例清洗之。但是右派份子中，很不容易找到貪污、腐敗份子。

這些右派份子標準，《中共關於反擊右派份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言之甚詳，毛澤東于六月十一日，已批語“即送劉、周、陳、朱閱、尚昆用電報發出。另印如前示。新疆、西藏不發。

### 劃右花絮：

“反右派”是全國性除新疆、西藏而外的一個大運動，是從整風運動開始，大鳴大放，轉風右派進攻，反擊右派等等，已有如椽大筆，寫于報紙、刊物、史料等處，無容贅述。我只是局限于我個人的遭遇及身周圍極小範圍所見所聞，一些小字輩的具體事例，不虛美，不隱惡，實事求是，以攻農拙筆，供之于世現醜。

先談和我同單位繼我被劃的右派份子劉如玉，當時他是江西省九江農業試驗站水稻研究室主任（也稱水稻研究組組長），前國立中正大學農藝系第二屆畢業生，曾任國民政府農業部派駐湖南省專員，是國民黨時期的臺上人物，過去的當權派。因農業部部長左舜生是青年

黨，于該部工作是必然也加入該黨，始得以保位。解放前夕，政府將解體，返故鄉江西萬安縣中學任教師以糊口，兼了該縣青年黨組織部部長，因該縣青年黨負責人劉天佑，是縣田糧處一股長，已够可憐蟲。劉如玉家庭成份爲地主，妻主家理事。

如玉尚飽學，對古文及古典小說中的詩詞，能背誦頗多，省農林廳爲了提高對初級技術人員知識水平，請來專家教授講課，劉總被選推之作黑板摘要，供學習抄，粉筆字又快又好。

鬥爭他使成右派份子，他于鳴放期已報上出現批鬥右派份子了，他是謹于言而慎于行，緘口未放，由于他的歷史作了鑄定，被定性右派逃不了，單位秘書羅林楠是商店學徒參加革命的，今于站代理黨支部書記兼整風小組組長，以劉爲高級知識份子，推測他對工農幹部的定腦內不滿，便定其爲“工農幹部不能領導知識份子”的主要反動思想，然劉無言行。他能言善辯，均用毛主席語錄，辨得難以上綱上綫，正是“以子之盾，擋子之矛。”

對其鬥爭會是在馬回嶺區公所召開，由于本單位名譽上是省農林廳的直屬單位，黨組織在省、地區、縣均不管而委托當地的區一級黨委會代管設一個黨支部，所以政治運動，當時均由馬回嶺區委會領導。

該鬥爭會從下午六時開始，鬥至子夜十二時，難鬥倒他低頭認罪。人皆疲倦瞌睡，本站秘書羅林楠因站長

吳筠調北京中央農業幹部學校學習農業課，黨支部書記由羅代理，見此情景，便用誘降之計，羅發言：“只要你對此工農幹部不能領導知識份子的思想，認一個錯，便既往不咎。”他信以為真，或可脫殼混過這“反右”昭關，仍依然說：“今後我若有此思想，當認是錯。”他出口是“今後若有”，而非“現在具有，”如此簽字簽名散會，各自呵氣去睡覺了，也就這樣定性為“右派份子”。

次晚在自己單位會議室內，便張貼起橫幅標語“打倒右派份子劉如玉！”天天批鬥下去，是其過去政治歷史作了決定，夫復何言？劃上右派份子兼歷史反革命份子，判有期徒刑五年，解赴瑞昌賽湖勞改農場服刑，仍主持該場水稻試驗研究，勞動強度雖然不重，但得了血吸蟲病，未滿刑便逝世了。

其妻因丈夫判刑去勞改了，驅回故里萬安縣農村，惟有種田，又遇饑荒年，貧病交迫死，幼子當時只有三至四歲，失母撫養亦夭折，全家共死三口，思之涕泣。

個人歷史關係而外，親屬反動歷史，亦得株連，九江縣沙河街稅務所所長詹遠澤，江西婺源縣人，其叔詹純鑒，于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分團部主任，且與蔣經國友善，當時經國任贛州專員。解放後，詹純鑒亦赴臺灣，并居要職，且詹遠澤妻盛維芬之父（即岳父）曾是國民黨軍之師長，已處決，即屬於有家屬、親戚被鎮壓的，如此詹之劃成右派份子，難以逃脫。改正後曾任九江市稅務局科長。

沙河稅務所稅務員張壽昌被劃上右派份子，本來該所幹部僅幾人，（不達十人以上），按幹部比例 10%有所長一人即符，但又劃了幹部王長興，計二名，蓋該所屬于縣政府稅務科，縣政府的右派份子指標有多，分于該科，科只有分到該所又一名，因物色到了張壽昌曾是國民黨黨員，蓋抗日戰爭時，張逃難到泰和，江西省政府遷此，難民招待所介紹了張而找到了一個小職員“錄事”，因其小楷毛筆字寫得很好，即謄稿人員，其位已是可憐蟲，若當時不加入國民黨，連這口飯也吃不到嘴。

大鳴大放時，張病住醫院，一言未發，然內已定了數，又屆運動尾聲，怎麼樣辦呢？于是縣人民政府整風辦公室派出二員，徑赴其病床前，征詢其對黨整風的意見，張信以為真，侃侃而談了蘇聯援助中國不誠實等厥辭。“够了”，“有了”，二人記錄起身返，并祝張早日健康出院，張出院回單位，跨進門即見早佈飾寫好的“打倒右派份子張壽昌”。正是奠堂先佈置，且待壽終正寢而已！

全國更有類似情況，上海冶金廠的沈默（筆名）原名沈志遠，本已是幹部下放在農村勞動，高興地認為可以躲過這場劃右派災難；不料廠方右派指標沒有完成，右派份子數量不夠，派車接他回去，猶高興以為上調工作了，到廠却是右派份子的補數。罪狀是他畫了《陳世美不認前妻》，是“醜化革命老幹部”，可想而知是有些老幹部做官了，另有新歡，便和前妻離婚了。這“醜化

革命老幹部”便是“醜化黨”，“醜化黨”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右派份子”。

九江縣血吸蟲病防治站醫師崔廣銓，年輕當時僅二十歲左右，秉性耿直，好實事實說，看到反右派有一些老實人成了右派，他被劃成右派後，尚對其站的書記王懷清說：“你們這打狼的鞭子，都打在這些羊身上”。家庭出身自由職業，母牙科醫師，後返故里，錯劃改正，竟任河口鎮人民醫院副院長了。

江西省糧食局工程師張楨祥，前國立中正大學農藝系第六屆農學士。由于家庭出身解放前父是美孚洋行江西代辦，楨祥屬於資本家子弟，也就成了右派份子，下放井岡山勞動改造多年，經錯劃改正，返省糧油研究所後任高級工程師，精英語翻譯。

九江縣岷山林場技術人員萬發仁，留日多年，攻讀大專學校營林專業，因與場領導吳宜湘不睦，按右派指標這位“洋貨”，必然要清除，無疑要歸之右字號。自己成了右派份子，妻便琵琶別抱，萬即得心臟病，後死于岷山右派集中營地，由幾個右派份子抬往蘆塘山上掘穴蓋土而已！後亦作錯劃改正，却無人前來認尸辦理。

九江縣農業局助理技術員。戴學潮，家庭出身是工人階級，父親乃鐵路工人，自己初中畢業，參加了江西省農業專科學校棉麻訓練班學習一年畢業，會寫“農業躍進文章”，年年增產，去年比前年好，增產了百分之幾，今年比去年好，又增產了百分之幾等等。正如瑞昌

縣農技人員戴澤仁說的這種領導作報告的文章，要連“的”、“啊”、“嗎”字都寫出來，領導作報告時，可不假思索而一氣呵成，如是領導非常歡迎，縣級領導歡迎，戴便目無科局級領導，會與之爭，然而劃右派是權掌握在單位領導手上，這樣單位農業局領導便劃他成右派份子，壓壓他的威風，所以處理最輕，保留原職原薪，戴一頂右派份子帽子改造，可惜老婆離了婚。

劃右派的實權，掌握在本單位的領導手上，但也要按本單位右派的指標，即應劃右派份子數以從事之。

秦漢玉原是九江縣新港區公所團委書記，自己正在搞反右派工作，劃別人成右派，以其是個知識份子，然而區黨委書記李仁貴是本地老粗幹部，秦是否有瞧不起之態度？正是螳螂捕蟬，安知黃雀在後，秦漢玉右派份子便是這樣來的。後來錯劃改正，任一個小商店售貨員。

鳴放時期，江西省人民政府在省府大禮堂，召開南昌市各高等學校內外的高級知識份子鳴放大會，由省長邵式平親自主持，大聲疾呼：“放吧！你們有啥說啥”。江西師範學院教授徐先兆登臺說了：“這有甚麼好說的呢？你們是統治階級，我們是被統治階級”，這便是一條被抓到的可上綱上綫的辮子，引蛇出洞了。

徐原參加過南昌八一起義，為贛東北起義領導人之一的黃道烈士手下的秘書，解放後，黃道之子黃知真任江西副省長時，常會乘車去該院校看望他，以伯父相稱，江西師範學院整風反右負責的是該校團委書記，何

敢劃徐爲右派？

只是徐于大革命失敗後，解放前抗日時曾任過國民政府江西上饒專署的少將參事（參政），疑其有叛黨行爲的叛徒。徐自稱是潛入探訊，後來終因省政府欲查此人，胡復何言？江西師範學院只有給其加冠，戴上了右派份子鐵帽子。

江西師範學院原函任中山大學教授鄧老師，解放前任華中大學、中山大學副教授多年，受聘西北師範學院教授，解放後高校教師歸隊調入江西師範學院，當時未評職稱，惟其工薪尚是教授、副教授的同一起點工資，後評職稱時，定其爲講師，然仍參與省府高級知識份子鳴放大會，當時多位教師促其鳴放“對其曾任副教授、教授却評爲講師不合理”。他因見邵式平說“放吧！有啥說啥！”語態表情神色不對，便婉辭不登臺，本來他有胞弟是中學校長，是地方紳士被鎮壓了，在老和尚的經典規定中有家屬，親戚被鎮壓的勢必劃爲“老右”，但是該院團委書記曾任其大女婿高幹提拔的秘書，劃其爲右派份子，怎樣好向其原來的上級領導交待？且他與其胞弟政治觀點不同，對反動政治不感興趣，于是他逃脫了這次右派歷史悲運。

九江縣沙河小學老師雷美芳，其原丈夫是國民黨的軍官，被處決了，雷老師携偕該丈夫所生一子，帶着改嫁了一位抗日時期參加的革命南下老幹部吳鴻英，又生一子二女，按老和尚的經有親屬被鎮壓，鳴放時她也說



了不少，九江縣教育系統已定了她是右派份子。若劃上右派份子，那麼便不可與吳鴻英成家，這位老革命四十多歲才娶到這個老婆，成了“老右”要判離上山下鄉去改造而家破，勢必天天向黨組織要老婆和把他四個孩子交給政府組織上去養，怎麼辦？後來九江縣整風反右辦公室，群策群惠替她想了一個辦法，就是促她自寫申請離職去東北（黑龍江）吳鴻英的故里、照顧吳的母親。待數月，反右運動過去，仍回九江沙河了，只是不再任教師，改行到供銷商業部門任職，如此而已躲過了反右風浪。

所以說劃右派，關鍵在領導。

九江師範學校剛畢業，任教九江縣新塘小學的凌興都老師，在岷山右派集中營地勞動改造，口口聲聲叫“弄得他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經常逃跑回家，家有老母，跑了又捉回，後來還逃外縣，難以生活而扒竊，終至判刑勞改，解置贛南勞改農場，難再逃跑了。現聞勞改成新人而生產，後仍得錯劃改正，做了一個小學教師，其為扒竊犯，實時勢逼迫所致，原來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好老師，錯劃改正後，仍常列模範教師。

鄭耀旗九江師範學校畢業，任九江縣新合鄉址坊小學教師，對劃他成右派份子，校方、鄉、區都不便肯定，便請示當時九江縣委書記左鳳崗，左也沒有看他的右派言行材料，更未見其人，電話中左氏回了一句話，“劃掉他！”鄭耀旗便這樣三個字下成了右派份子。

南昌鋼鐵廠中學英文老師羅時範，前國立中正大學經濟系第三屆法學士。在學生壁報一篇英文稿，寫“毛主席萬歲”，學生寫的“long live the Cheir-man Mou”學生反映羅把毛主席當“物”不當人，極端仇視毛主席，多這“the”字究竟是羅老師未改？抑學生畫稿到壁報上未改？一系列的無限上綱上綫，羅被劃上“極右份子”，後摘了帽子。文化大革命重戴帽子，并由全校師生看管監視，一個人見其大便後用報紙揩屁股，當時報紙上，毛主席影相很多，結果說他用毛主席像揩屁眼，極端仇視恨毛主席，劃為“現行反革命份子”。適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草芥人命，在南昌市要殺現行反革命份子五十個以穩定亂局，而南昌市只找到四十九人，分南鋼一指標，抓革命促生產來穩定鋼鐵生產，羅時範便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右派錯劃改正，進行了平反，有何裨益？人已死了。難道南鋼與中學領導，就聽這些學生的一時糊言，作此冤案？可是美國北京書屋2002年刊雜誌中，寫克林頓夫婦和布什父子的英文為“The Chintons & the Bushes”無半點關係！

一九六二年九江市農業技術學校副教導主任張遵英老師，講棉花害蟲棉葉蟬（又叫棉葉跳蟲）的特征，說：“它和其他浮塵子一樣，容易混淆，主要是兩前翅尾端各有一黑點，好似毛主席的下嘴巴有一黑痣，好認。當時學生向校方反映，校黨委書記戴子瑜停止其授課，便向市人事局要求將張調動，調國營新洲墾殖場任技術

人員，指導生產，未重處理，是農業局周升國局長因張是該局調出，算是明智，也是反右派風吹過了，文革尚未開始。

甚至文革後期，程世清到九江巡視，坐南潯火車過一趟，便說南潯綫上還有百分之幾現行反革命份子未揪出來，于是新建、永修、德安、九江又開始劃反革命份子。

因劃上右派份子而造成夫妻離散的，僅九江縣便七、八上十對。

凌興都在集中營地常叫着使他妻離子散，是劃上右派，妻離了婚帶着兒子另嫁了。

崔廣銓正在與九江縣防疫站護士張麗君相戀火熱的時候，雙雙均右派份子，繼續相戀，不是毫無階級觀念？只有各自劃清階級界限，不能右派再戀了。

萬發仁留學日本的大專學生，打成右派份子後，妻孥生活無倚靠，妻只有再醮。

秦漢玉這捕蟬螳螂，自己被黃雀啄了，帶着妻子上山，却琵琶別抱了。妻孫澤枝改嫁同一起的下放糧食工作人員朱家槐，秦朝夕見其恩愛，欲哭無淚。

劉鳳鳴是九江縣文化館館員，本已携妻并子登上了岷山，認為反右風頭已過，欣哉幸哉，却未想到單位的右派指標也追上山來，在山上也成了右派，老婆却被山上供銷社經理徐志雲佔上了，有吃有喝、何樂不為，劉只有將兒子送下山給家中老母撫養，天天却看着老婆新

姘、涕泪常流，惟有離婚成其好事。

戴學潮原結髮妻與其岳母居于九江市，自岳母見戴成了右派，促女離婚，女尚戀戴，因完成中學學業，是戴助經濟的，似感其恩，賴母命難違。一次受母逼女來到岷山要戴簽字，適右派集中在修公路，其妻找到了老戴，交談態度很溫和，輕言細語，泪亦滲流，戴簽了字，後聞自戴成老右，對岳母每月供奉三十元照舊，然而回家却不能與妻同床，睡地板上，岳母保護女兒，高屈雙膝睡床外緣，女兒睡床內方，一個面朝東，一個臉朝西，母女同枕背向，而母守衛着女偕婿相愛，當時右派份子中有好開玩笑的說：“老戴，你太循規蹈矩了，不會子夜摸哨偷襲麼？”有人說摸到岳母娘怎樣辦？又有的說：“只要有濕潤，是滴水洞，管她是東方山洞？還是西方山洞？”搏得大家哈哈大笑一趙。

進賢縣工商銀行股長陳紹平，曾做過國民政府主席下直轄三處之紀計處會計，是臺上人物，劃上右派份子，兼歷史反革命份子，判刑五年。行長即囑其妻吳含石劃清界限離婚，吳夫妻恩愛，不從，即調其工作于城區邊緣孤寂地址的營業所任出納，且夜派人去做盜賊相洞嚇，吳亦戰慄堅持住了。最後查其賬，誣其貪污，連行長的內妹到與吳閑聊遺一件毛綫衣于吳家，并已送還，也列入貪污數目內，終致開除工作，是未離婚便開除工作。

我當時夫妻僅三十四、五歲，妻半老徐娘，亦不無

何挑撥進言者，“右派無前途了，如此而已”了。但我們婚姻基礎鞏固，難動其衷，正如二〇〇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妻逝世，我挽其聯：“相結髮六十三年，青梅竹馬，精誠縹紉，逝卿均成斷腸史；伴夫冤二旬一稔，茹苦含辛，共濟同舟，遺叟只是彈泪人。”

右派份子離婚最痛苦的，是離異後天天在一起，看着琵琶別抱，老妻新婚歡樂，自己孤家寡人。然而在這歷史悲歌，十年浩劫中，也有老夫老妻雙雙堅貞守節而同歸于盡的，余教授夫婦便是其中一對。

余纓是九江農學院教授，大躍進時處處辦大學，特選江西省農業專科學校教務長，調來主辦該院，他在舊社會做過上饒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農業技正，也算是農官，却劃上歷史反革命份子；文化大革命是第二次“反右派運動”，也就逃不了這受鬥被整。余纓也許認為難過關，想一死了之，以一了百了，老伴是舊社會結髮夫妻，願同歸于盡。是一個晚上在學院山背一個較深的塘內，跳水自盡，恐怕入水不沈，身上各綁一石塊，以免未溺死又挨鬥受苦。一九八四至八六年我在該院後改中專農校任教，却不見該塘附近有大石頭。又有說當時教授工資高，造反派抄了家搶了錢而逼押去死，以沉尸滅口。其子是星子縣中學教師，亦不敢斷定是自殺抑他殺？只是認尸斂葬，後移瘞于其家山了。

言歸正傳，話說自己，我成右派份子是怎样來的？按照老和尚的一本經，我是有成右派份子似是而非的基

礎，若認真按文件審定，是不屬範疇。所以挨批受鬥時，我毫不在意，直身平視，却“低頭”！“彎腰”！苛斥之聲盈耳，我遵命低下了頭，竟笑了，內心認為這在耍猴戲，得到的回禮是工會主席胡克柏（農工隊長）正襟危坐會議桌審判臺席，正在飲的一杯熱茶，澆到臉上，這樣一來，不敢笑了，茶只有唾面自干。奇怪的，胡原欲乘政治之風而上爬官位，後未遂離站，參與修廬山登山公路，于工人棚中盜竊而判刑了。後在彭澤芙蓉勞改農場勞動，現屬新人隊員。（即刑滿自新勞動）

鬥後，囑寫認罪檢討，實在無從下筆，這無中生有的事，也實在寫不成句讀，哭了，被農工羅其茂走來，見沒有在寫，就是一重拳打在背心傷痛多年，該時人權有人拳，人拳即人權，這樣“打倒右派份子鄧鍾瑞”的紅紙標語卦上了，將我在這樣說你“是”，不是也得“是”，白天工作，晚上受鬥，鬥了一個多月少二天，定性“極右份子”兼“歷史反革命份子”，受“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份。

當胡克柏主席送我去彭澤芙蓉勞改農場，勞動教養時，由單位所在地九江縣馬回嶺去彭澤縣，為候翌晨皖贛班小火輪，九江市必須一宿，只有寄放在九江市的縣看守所監獄。我嘗了一夜鐵窗風味，聞獄中有大哭聲，有叫冤聲，更有獄卒的苛斥以待聲，右派說是人民內部矛盾，未判刑而關你入獄，便得入獄，朕即法律。

次日到彭澤，我擔着被、衣行李，步行十多里，到

達芙蓉農場，由醫生檢查我的身體，經過這批鬥折磨近四個月又有胃病，醫生向接收負責人匯報，這負責人可能是公安廳的老政法人員，翻閱了我的檔案，可能覺得材料反動歷史問題等，不符實。蓋我一九四五年以來，即非三民主義青年團。黨團合併，我又沒有轉入國民黨，本來該場對解往的勞改犯、教養犯、只有接受權而沒有審案權，我這樣是稀奇事，他却對我的解差說：“這人沒啥，你可帶回去。”不收。改正後我問過當時九江縣肅反辦公室負責人，答不是此重大問題可以不收。若入芙蓉農場，我的家庭命運環境，將更淒慘悲切，決不可能如現在景況，但是後來我却又聽到說接收負責人尚受了批評：“把一個能從事植棉技術指導的人，竟不接收，使其走掉了，”蓋我從事植棉技術指導多年，九江地區農技界，略有知名，該芙蓉農場是圍墾湖沼地，以植棉為主，接收皖、鄂、贛三省的右派份子勞改、勞教罪犯即上萬人計，

我没有入該場，仍回九江縣，本是可能留在原單位改造，但是羅林南這個秘書，既驅我出，怎又能歸受？

返潯在彭澤縣候船又得一宿，胡克柏把我安置在江邊一個低級旅館，其本人自己便去投宿彭澤縣委招待所高級宿舍了。我當時很奇怪，右派是罪犯，怎麼這解差竟不怕罪犯逃跑？

我入了旅社，伫立旅社門口江干，見長江中流砥柱小孤山，居然想往旅游，惜無渡船，此可見我對此冤判

的心情，是若無其事。

返回九江縣是否改了處分全不知，初安置在九江縣茅山頭林牧農試驗場勞動，該場是九江縣農牧科下轄的，這場很小，只有四、五個右派份子；尚憶其一為小學校長、一為稅務所長，一為小學教師。二個月後，把我調到岷山墾殖場，右派份子集中較多的營地，是九江縣右派份子集中勞動改造的大本營，我便在此勞動。

## 五 划右派关键在领导

劃右派份子，既按單位幹部的10%定了指標，又有基因條例，而決定權還是掌握在單位領導手上，很多右派份子的吐露，是與其單位領導有關。

沈家鐸是九江縣公安局偵探股股長，工作成績出色，年輕能力強，出身革命烈士家庭，父親一九二七年參加了贛北星子縣暴動，中共武漢“八七”會議後，主力紅軍調集湖北陽新縣，其父任九江馬促農民協會主席，一九三〇年壯烈犧牲。唯階級論時，他的出身成份是好的；但是劃右派決定在領導，其公安局副局長張廷生忌其才，且張于舊社會參加了“金蘭譜結義”，這是解放時應鏟除的舊社會封建組織，惟沈知之。若沈暴露，張的副局長當不成，一定要下臺的。所以在縣整風反右領導小組計五人，討論沈的定性右派份子時，三個人反



對，只二個人贊成，應不成案。可是本單位縣公安局副局長張廷生是該局整風反右小組組長，聞訊趕來，決定要劃而成了老右，只是處分從輕，降級降薪，工資由每月 51 元降為 38 元，下放岷山勞動了四年，不是判刑的勞改而勞動改造，一九六二年國家經濟困難，新調單位又促沈申請退職而退了，現低薪在家。

扈才松是九江縣供銷社秘書股長，聶濟森，原第八區政府于另一股內，後聶晉升扈之上，同是一個鄉，扈文化水平較強，是否有輕視聶之舉？旁人推測扈之成老右與聶有關。于岷山勞改時，一次摸着松樹自嘆扶孤松以徘徊，有其他右派即嵌其姓名而贈其聯曰：“因當時恃有才而跋扈；致現在扶孤松以徘徊。”

江西省畜牧獸醫學校校長王石民，前國立中正大學經濟系法學士，是中共地下黨派于新淦縣中學任英語教師潛伏，并發展地下黨員 11 人，解放時支援前綫工作。繼任省樟樹中學校長，省樟樹農校校長，後調任為畜牧獸醫學校校長，該校中共黨委書記是農民幹部，怪王對其妻的工作安排未從優，不滿意；反右時欲劃王為右派份子，但得請示一下省農業廳黨組織，副廳長吳劍農對該校書記說：“若王石民是右派，那麼很多右派，都是右派”。言下之意，“你也是右派份子”，該書記領會了，怕自己也會被劃成右派份子，便不敢劃王為右派了。

九江地區人民銀行督導周正恢，上海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新調來行長是農村幹部，文化水平有限，

可能認爲周這個大學生眺他不起，便把他戴上一頂“右派份子”花花帽，該會老實了吧！

工農幹部領導，總認爲知識份子未尊敬他而內心敵忌，劃成右派之例頗多，不胫枚舉，人云：“武大郎開店，比他高的伙計都不要”，土地革命失敗的新淦縣紅軍共產黨創始人鄧宜之，大革命失敗後，回鄉教中學時曾說，紅軍內部忌才，當解放後家鄉土改劃他家成份爲地主，便自縊先逝，預知以後關難過。前談江西師範大學老師徐之成老右，鄧之未成老右，亦完全與領導攸關。

按我的單位江西省九江農業試驗站而言，當時共有行政與技術幹部十八人，依 10% 的比例應定右派份子二人。十八人中據悉個人有歷史問題的，一位爲兼過青年黨縣組織部部長的，一位迄解放時任三青團分隊長，二位其父已被處決的，一男一女，按規定標準如前言，論資排隊，屈指一算，這右派份子輪不到我的頭上來，當時我是若無其事，優哉悠哉！

可是領導決定一切，首先竟把我輕輕一抓就成了，那位青年黨縣組織部長曾是舊官僚，固然沒有逃脫，可是那位三青團分隊長，爲人善交際，對這當時大權在握的秘書領導，經常“有酒食、先生饌”，本來肅反時，九江縣肅反辦公室主要人物聶濟森，許木水到本單位，對該隱瞞此分隊長反動歷史，再候其坦白，否則計劃逮捕，該位啾哭了，承認了也就算了，尚算坦白從寬。反右時，該羅秘書却對其一字未提。

二位父被鎮壓的，這是有殺親之仇，該秘書却以彼等皆年幼而分辨開脫了，只是這橫掃是一次又一次，二位其殺親之仇的，男技術人員邵春，父任舊社會鄉長，女陳飛，父為國民黨中統中央社江西分社社長。文化大革命即第二次反右派運動，邵春後調任彭澤縣農業局技術人員，被鬥得跳長江自盡了。陳飛以稍錯賬，下放養豬，羅把她幹部檔案毀了，落實政策，只能當一個農工了，不能恢復幹部，因這女孩談話中，會談“羅這個死胖子，屎胖子”口頭禪不禮貌，以是報復。

我何以得罪了這位權貴秘書羅林南？說來話長，緣本站上級是直屬省農業廳，創辦于一九五六年，我是從瑞昌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站站長兼瑞昌縣人民政府農林水利科業務負責人調來的，由我接收該站土地與規劃試驗，具體也是負責旱作試驗研究室，站長吳筠原任九江地區糧食局副局長，調北京中央農業幹部學校進修業務課，當時幹部中只有吳是共產黨員，臨時調九江新農村報社一副社長是黨員，他在報社是從事總務後勤工作的，任本試驗站秘書，代理黨支部書記，我代理站長，一切站內人事組織，有待吳學習回來，重新安排。

站長去學習走了，羅林南秘書以我是非黨人士，亦無民主黨派關係，認為易于掌握，便向我提出：以他現居本站，是縣團級單位的秘書，薪不符職，要我給他加工資，我的答覆是：“工資問題在一九五六年已全國進行了一次普遍調整，今無調資文件，豈可個別妄增？且

待站長自北京回來，你再直接向他提出好了。”此次要挾不逞，又一花招，偽稱其于新農村報社時，因其家人口較多，每月報社有固定補助人民幣貳拾元，當時站長78.5元，我偕劉如玉皆77.5元，羅要我也依例定額如此補助。我的答覆是：家庭生活困難補助，年終由工會討論補助發放一次，若你于報社如此月月固定補助約20餘元。當時其工資40餘元，副縣級行政18級工資78.5元。可取報社證明來，我轉寄北京吳筠站長批示執行，如此又未得逞，積怨懷恨在心。

當時全站幹部農工共吃一食堂，有剩餘佳肴、米飯、竊端往其家，妻孥共食；農工見之，有不滿情緒，促我監督批評之；有一次我密察見而尾隨至其寢室批評過，有失其體面。他便怠惰工作。

在我隨省農作物輪作復種制度調查工作組，赴星子縣蓼華區調查時，他常終日垂釣，不理公務，以致牧童放牛不牽，踐食了試驗田、地，造成了不少試驗報廢，我曾書面向省農業廳報告了，否則大量的國家投資，試驗無結果，責將誰負？廳方派了孫氏二人莅站調查，羅以黨支部召站內全體幹部與農工會議，說我誣告。幸當時試驗的二期晚稻未收割，棉花未拔秸，吃的踐殘迹猶存，我引孫氏二人等往觀之，羅懷恨在心。如此、我成了他的眼中釘，認為老鄧不除，羅無寧日，所以反右開始，我便成了羅刀俎下的魚肉。

劃了我為右派份子，羅向在京學習的吳站長舉報，

吳回信勸其慎重從事，認為對一位技術人員，不要只看其缺點，要多看其優點，意即能否力事科學研究，科研單位最需要的是科技人員，羅在整風反右小組會上，竟當眾將吳信擲諸地，說站長不抓階級鬥爭。

站長吳筠在北京學習完畢返站，羅奉承遠迎于阡陌之間，而吳對其笑臉不予理睬，內心認為主要科技人員元氣均被你搞走了，這科研工作怎樣搞下去？後來又有政治運動，羅竟結幫農工，誣陷吳與南昌市江西飯店一女服務員屬特務有肉體關係，且獨來往密切等。迫吳亦離站下放他縣農村去了。

該站植物保護人員袁子元與羅不睦，被其常刁難打擊，不欲與其相處，在友人交談中說了一句“可惜臺灣不得去”，被羅竊悉了，寫報告到縣公安局，把袁監視了，袁出差于九江市潯廬餐廳便飯，與友人同志的談話，定為秘密集會，圖謀偷越出國境的現行反革命集團。幾平日與袁有交往的，均列入其案，袁判刑六年，瑞昌縣農業局技術人員熊華林判刑五年，地區農科所技術員黃培琳，從事植物病理研究，曾任反動三青團區隊長，獸醫師帥孝思曾任過國民黨軍中少校獸醫正，亦受派過三青團區隊長，與袁接近，均株連。黃自己磨刀霍霍，人猶以為他將殺雞待客，結果自刎。妻急奪刀抱之呼救，血噴滿室，黃自以手拉斷氣管和動脈，以達速死，帥亦自縊，均斃。

該站牧童胡佑龍，時年僅十四、五歲、可能手摸過

會計楊定根的一個三，四歲才會行走說話女孩的陰戶，有微紅腫，女孩說得出“佑龍”！“佑龍”！羅即以站具報告“胡强奸幼女”，公安來捉，胡母至哭求，楊會計尚對羅說“算了”，羅執意公安局捕捉，判刑五年，得血吸蟲病，刑滿回家病逝。由于該牧童無知，平時常背後會說羅是個“屎胖子”，“死胖子”等等，當時是無法治，不須什麼“法醫”確定是真强奸了？抑實無其事？

農工劉正柳，為人誠實是全站農工信得過的工人，公共選擇其管理伙食。大躍進時糧食緊張，羅林南常于食堂取米取油無手據，致伙食堂看着虧損，誣劉貪污受鬥成瘋子了，得神經病後自縊而死。

反右派份子劉如玉，其家死亡三口，已如前述，不贅。

一個小小地區農科所，在這“反右”、“文革”（即第二次反右派運動），直接間接致死人數九人，判刑四人，會計楊定庚錯賬二百餘元，定罪貪污判刑三年，死于勞改。因楊妻北京人，有時會說“羅這個死胖子”，法津奚若？我今年已八旬，誠九死一生話當年，是幸運兒。

余纓教授之死，羅林南之女，當時是一位鬥爭余纓的積極份子，誠女得父衣鉢。

羅林南實欲乘政治鬥爭之風而直上青雲未遂，但是羅害人太多，心有內疚，早得痴呆病而逝。

## 六、言行上綱上线成右派

我與領導關係已述之如前，然而劃右派的權主要在單位領導手上與口中，可以左話左轉、右話右轉，也可左話右轉、右話左轉，事在人為，這樣我被劃成右派份子，何足為奇？

同時還有兩個右派份子的幽靈，徘徊在我身的周圍。

一位是我在一九五二年自省農業廳率農技工作隊，派駐瑞昌縣的隊員王金亨，因該縣先進行了反右，王學會了對右派言行的如何無限上綱上綫，他對我與之相處五年，平日言行的如何套上綱綫，列了十多條，寄到我單位，羅林南在欲加我罪，正乏該言辭，實有如獲至寶。反右伊始，陳方現料，可以應用。王乃私立信江農業專科學校畢業，不從事農技工作，僅于下鄉在行政幹部工作組中搞行政工作，農技人員對他有意見，每于會議時對他批評，他認為是我主持，因為我是隊長、站長，如此他便與我有隙，認定了這次反右運動，可以搞我一下，後來他也成了漏劃地主而下放農村生產了。八十年代我與之同參加九江地區農技工作會議相晤，他對我說：“還是你腦筋清楚，我是糊裏糊塗。”我笑說：彼此彼此，都受了教育也都得到了改正，往事已矣！夫復何言！相對嘻戲。

另一幽靈是剛畢業于江西農學院分配下來的學生劉德心，廣西僮（壯）族人，可能這少數民族于同學間，個性強一點，他在校即已被劃成了右派份子，受了反右

派運動的洗禮，學會了對言行的上綱上綫，隨我在星子縣蓼華區作農業調查，對我平時的言行，均有條不紊地記入了他筆記本中，待本站反右揭發我的罪時，他累積了我這些現成貨，時間、地點、人證、物證、只要拿出筆記本照本宣讀便是了，後來相逢時，却因已錯劃改正，說當時對不起。

反右鬥爭“莫須有之”右派言行，只能認錯，辯論是不認罪，罪加一等，要提到實質原則上，自我分析，“實質”便是“實的”。且就定我的右派言行，根據如實提供，主要的幾場如次。

（一）對肅反不滿：

事情有幾個過場，一次是當新淦縣肅反辦公室的幹部來調查我任新淦縣中學教師時的二位學生鄧逢寬，鄧清泰是否三青團團員？因這時間已過了十四年，我不敢肯定，並請示過站長吳筠，如何交待？吳答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我只有交待為“不敢肯定”，如此便是不老實，抗拒交待。

且當時我正值星子縣農業調查結束，返經九江市，為了替長女找補習班，以備她有利升高中，未隨本調查隊下午火車回本單位馬回嶺，坐翌晨火車回。不知該肅反幹部先日下午到達了本站，是為有意識躲避。我詢知該調查人是乘下午火車返南昌，經其同意允許我先往田間試驗地，對照檢查助理技術員的試驗記載，約一小時後可在上午九時許，即離田回來作書面交代材料，這是



有意拖延交達材料，即是對肅反不滿。

## （二）同情勞改犯：

江西省公安廳于瑞昌縣主辦賽湖勞改農場，其孫場長與哲政委（原公安廳處長）邀我同去該場作規劃，蓋當時該場尚無農技人員，我們相與閑談而得知勞改犯人中，有不少高級知識份子，如王國貽乃上海震旦大學醫學博士，贛州醫院院長，是天主基督教徒，現于該場醫院治病。一為某大學化學教授，在場主持化學實驗室。一位武漢大學地理教授，他發現中國大陸每年南移多少哩。刑滿獲釋放時，乘長江大輪抵漢口碼頭，即由武漢大學以小轎車接去任教了。其所以判刑，是其夫人以教授高薪，于故鄉放過債，成了剝削地主，却不捕其妻，地主份子有男不查女，同時子女年幼，夫妻情篤，可謂代妻服役。平時閑聊，我講過這些事，檢舉人以之上網，上綫，這便是同情勞改罪犯，認為共產黨判刑判錯了，這便反黨反社會主義。

## （三）對打擊刑事犯不滿：

一九五五年有一次綁了四個刑事犯經過，眾人隨往觀看，我也在旁，曾詢問眾人，“他們犯的什麼罪？”并問過瑞昌縣當時縣委第二書記張振榮，因該時縣指揮農業生產的縣生產辦公室設在鄉下范家埠，而縣農業技術推廣站也隨生產辦公室相配合，領導全縣農業生產。張的答：“犯什麼罪，我也不曉得。”當時領導平易近人，我笑謂：“你不曉得行麼？”他也笑笑。可是王金亨對

此檢舉我，却添油加醋說，全文是：對打擊刑事犯，一點認識也沒有，反而指着這些刑事犯說：“這些善良的人們，他們犯了什麼罪呢？”試問在這大衆圍觀的場合，我會傻到如此程度，這樣說麼？劃我成右派份子的上綱上綫罪行，便是說黨亂判刑定性，爲對黨打擊刑事犯不滿。

#### （四）反對蘇聯科學和米丘林遺傳：

一九五三年，全省主要農技人員，集中于南昌蓮塘江西省農業幹部學校，學習米丘林遺傳，總之米丘林遺傳的成就爲：“生物有機體和外界環境是統一體”、“後天獲得性可以遺傳”，“孟德爾遺傳是唯心的”。我于討論時發言：黃帝《內經》的“天人合一”，即闡明有機體和外界環境是統一體；獲得性可以遺傳，早年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即以非洲長頸鹿闡明後天獲得性的遺傳，器官用進廢退，環境的直接影響。孟德爾遺傳當時以染色體爲基礎，雜交後代的顯性、隱性有比例數據，應是唯物，但不容你爭辯，如此便是反對米丘林遺傳，進而反對蘇聯科學。

#### （五）反對社會主義農業土地改革：

我平時談過先父從事中醫四十年，我出身于秀才中醫家庭，本來是想高中畢業學西醫，以中西結合的。適抗日戰爭時長沙第四次會戰，日寇逼境，報名投考國立中正醫學院，未赴應試。原來每年有國立江蘇醫學院來文到母校國立十三中要求保送畢業生往學醫，該年却

無，但保送我到江蘇學院數學系也沒有去。因家有荒田荒山，想自辦農場以改進桑梓農業，便考入國立中正大學農藝系，畢業時適逢解放，參加工作革命了；若辦了農場，當了農場主，後果將不堪設想。是即反對土地改革，反對社會主義農業，走資本主義農場主、地主制，即反對社會主義農業制。

#### （六）對蘇聯援助不滿：

一九五五年赴浙江慈溪縣參觀其棉花豐收，及其集體農莊雛型：“伍崇閘集體農莊”，這蘇聯式集體能長幾久，聞中國式兄弟大了鬧分家，蓋能力有大小。慈溪縣單位面積棉產是全國第一，蓋將毗鄰棉產高地區劃并為一縣，成長條形名稱慈溪，其縣長領導生產有功，升官了，但後仍各歸原縣。

歸途經上海、溯長江而上，抵九江回瑞昌，談了于黃浦江見到蘇聯商船，懸有“鐮刀、錘子、一五角星”其國旗。檢舉人說我說了“蘇聯援助我國，還不是和美國援助國民黨一樣！”且把商船二字改為兵艦二字，其兵艦開進了黃浦江，即是對蘇聯不滿，及反對我國的農業合作化。

#### （七）鬧獨立王國擺脫黨的領導：

一九五四至五六年我由五二年省農林廳率農技工作隊派駐瑞昌縣而留任該縣辦農業技術推廣站為站長，由于技術幹部工資及公雜費，尚是省農林廳按月下撥及直接往廳報銷，我便在農技人員中定了二人兼任會計和

出納，對廳報銷，未經過縣農林水利科轉，是即鬧獨立王國，擺脫黨的領導。

（八）周恩來未死于失事飛機，可惜：

報載周恩來赴印度尼西亞開會，原擬乘飛機被害失事，幸周機智，臨時未乘該飛機，而乘另一飛機，真是幸運、佩服周之敏感，可是檢舉人是誣陷我憤恨共產黨領袖，沒有把周墜死。

## 七 我成右派的因素与结论

右派份子的被劃上，該單位的主持領導，是多多少少要根據分配下的本單位右派份子指標，按規定標準，可牽強附會套上，即無限上綱上綫。我是被劃上“極右份子”的，根據中共中央通知指出的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之二，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劃成“極右份子。”

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份子，主謀份子和骨幹份子。

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并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份子。

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份子。

4、在歷史上一批反共反人民，在這次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份子。

那時候單位組織上，內定了你是“右派份子”說你

“是”，不是也“是”；只有他說的，沒有你說的，你只能低頭認罪，“是！是！是！”自我檢討要深刻，越深刻承認便越好，看看可以金蟬脫殼麼？要從實質上看問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是自己認識承認的，“實質”便是“實的”。

這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自己是看不到的，又不容許爭辨的，若容許申訴，我是要對照標準這樣說的。

按這四條對照自己，我只是一棵無名小草，農業技術人員，但寄望對於農業技術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以利農民生活的改善，無任何組織活動，何處為首？主謀什麼？那裏的骨幹份子可言？此對其一。

我的一生只寫過一些農業試驗研究技術性的論文，在全國性，省級農技刊物雜誌上登載過，未發表過任何政治性的，何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既沒有，那麼鼓吹什麼？此對其二。

大鳴大放轉了風向，成了右派份子向黨進攻，報刊上是日有朝暉，人云亦云，我初以之作談笑資料是有的，出了右字號便自緘己口了，批判也是跟隨報上所載而談，沒想到這閑聊間，竟身陷劣名，蓋對此可無限上綱上綫，此對其三。

在其四有關歷史問題，進攻問題，反動活動問題，這是好做文章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舊社會出身的人，不會是剛解放時的嬰兒，白玉無瑕。清查歷史，我于一九四三年，三青團吉安分團到校（國立十三中）發

展團員，我隨二百餘同學一次集體入團而參加了，也是爲了高中升大學，當時時勢，非黨非團學生被錄取率低。一九四四年我任教新淦縣園藝職業學校，三青團新淦縣分團籌備處，在該園藝校要成立籌備區隊，我也就隨之接到一紙任命爲該校區隊副命令，根據肅反條例，區隊長（含副職）以上，定性爲歷史反革命，年限却是解放前三年以後算起，即一九四六年以後，以前是抗日戰爭國共合作統一戰綫時期，不予計算，且一九四五年以後，我是無黨無派了。但那時反右風雨是緊鑼密鼓，有法也無爭論餘地。

我的父親又是縣參議員，按肅反條例，參議會屬民意機構，除正副參議長和極個別有民憤的參議員，爲歷史反革命份子，此外一律不列入。且我父親是個秀才中醫師，行中醫四十年，自由職業，解放後中共在新淦全縣各地，對他遍訪調查無劣迹，仍行其醫，醫德遍傳，人皆知之。

有堂兄鄧鍾鐸被處決，是新淦縣中學校長，當時縣一級即有判處死刑權，由中共縣委五人小組討論決定。其時鏟除地方封建勢力，校長培育了學生，是有地方勢力的，勢必鏟除。現其三子有中學十佳教師，高級教師，八孫七已大學畢業，有博士、碩士皆學士，及一經商于滬，有高級工程師，省局級幹部，出國有于留日本四人，訪丹麥及又一出法國。子孫皆于破鍋爛屋下自勵發奮有成。然而是堂兄非我胞兄，他的胞兄時尚任廣州中山大

學副教授。鐸且庇護了其校中共地下黨員王石民老師等，王亦自稱鐸未破壞加害其組織。

所以認真審查，我是劃不上“極右份子”，乃至“右派份子”的，更不是“歷史反革命份子”，但是祖宗遺下了土地、荒山、家庭成份爲地主是擺脫不了。父亦自由職業兼地主。我的出身是學生。

劃右派分子的標準，是遲遲下達的《通知》。

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爲右派份子：

（一）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治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三）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爲目的的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份

子，污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四)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的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五)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六)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以上這些點點滴滴，只要在你平日言辭中，隨時隨地莫須有之，牽強附會套得上那一點，所謂無限上綱上線，便立即成為右派份子了。還可“無中生有”，這是《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中的第七計。

可是毛澤東接連起草反右派文件指出：“這次務必使右派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指出明顯或是叛徒、或是過去三反、肅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資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屬、親戚被鎮壓的，他們在這次運動中，鬧得最凶。說是這麼說，我說有其人而非盡其人，總之在群眾面前掃除實是在群眾中清除掃盡，夫復何言！那時江西教育學院宗遠崖老師，當時尚未開始評職稱，是詩人沉默寡言，未鳴未放，也劃成右派份子，人叫他是啞巴右派，錯劃改正，任廬山區中學教師，退休後于廬山東林寺佛教大學任古代漢語教授，後整理廬山碑文。



## 我的右派份子結論

根據前面一些“莫須有之”的罪行，劃右派份子的決定權在單位領導，然而我與領導的關係，已如前所述復雜，則羅林楠對我的處理，惟恐不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故對我作的右派份子結論，初冤定為：“因父、兄被鎮壓，心懷不滿，所以成右派”。

當時在馬回嶺銀行營業所，由縣整風辦公室幹部帶來我的右派罪行書，要我簽字，我當時見此結論，拒不簽字。

蓋其時我有一堂兄被鎮壓已如前述，所謂鎮壓是處死槍斃，乃一九五零年，五一年之鎮壓反革命全國不知凡幾。先父是在一九五六年患胃潰瘍病，逝于故鄉新淦縣人民醫院內科病房，醫院有病歷可查，我並留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壽終遺照，及一九五六年六月父七旬全家合影。羅林楠知我未簽字署名，晚上又對我鬥爭，誘簽說：“難道你父親連被鬥爭也沒有受過一次麼？鬥爭也是鎮壓”。我說：他行醫四十年，濟世衆多，群人熱愛，醫德醫術，是皆崇敬，殺、關、管、鬥、均未受過。

于是我拿先父遺體照及其七旬全家合影二相片，往見馬回嶺區公所黨委秘書沈家許，他當時兼該區整風反右小組負責人，沈尚和平客氣說：“沒有便沒有，應當

改正”。羅竟以其自己坦白學徒時偷過店中老板娘的錢，也敢說出來，以誘發我的坦白，要我說父是被鎮壓的。但我不能無中生有，致未鑄成如此更大的冤、假、錯。

第二次要我簽名時，竟無結論，我也就簽上了名字。

至于我成右派份子的結論如何？直到一九七九年對右派份子錯劃改正時，中共九江縣委宣傳部幹事黃連生將右派份子材料副本檔案給我看了，是我簽字後寫上的，為我的右派份子結論是：“極端個人英雄主義！”

這就是坑害了我半生的八字。

如此結論很好作，不為過分，只要與領導爭執過，不管對與不對，有理與否？領導作結論，便可扣上“英雄主義”，若爭執得較激烈，便是“極端個人英雄主義”，反領導便是反黨，不獨是“右派份子”且已歸類為“極右份子”。

另外反右的同時尚被定上“歷史反革命”，我有過反動三青團區隊副的歷史，已如前述，按肅反文件，時間在一九四四年。于一九四六年以後，即解放前三年算起，再前是抗日統一戰綫時期，不以“歷反”論。且我于一九四六年以前。黨團合并時，即未團轉黨，非國民黨員，三青團也以我累不到會而被取銷了團籍，我是非黨非團，無任何黨派關係，反右時扣上我“歷史反革命”，并未在反右會上談過，只是背後寫上去的。所以肅反結論是如何？我也從未見過。肅反材料我也未簽過名，大概是我非屬肅反對象範疇。

只是肅反運動時，九江縣肅反辦公室五人小組組長聶濟森，為站內技術人員楊敬隱瞞反動歷史事，如前已述到本單位，由許木水把我叫到站長辦公室，聶問了我一聲：“你還有什麼歷史沒有交待的嗎？我說：“沒有”，“一如一九四九年于江西八一革命大學所交待的”。聶回了一聲“好”，“沒有你的事。”我便離開了。然而羅林楠對我，欲加之罪，什麼結論是都可以作上，幸運“歷史反革命”的結論，也隨右派份子的錯劃改正而撤銷了。

後曾問過聶濟森“肅反結論材料，我從未見過，也未簽過字，究竟我屬於什麼類型？”聶說：“那麼你便不是屬於此範疇。

在當時政治風雨季節，是無法無天，猶憶抗日時期因所讀中學已遷失學，在一個山中古廟永福寺讀古文時，私塾先生龍心一，在久雨放晴時，出一對聯要學生各舒己見的上聯是“天晴人亦爽”，我奉上的下聯是“山雨日無光”，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符合該政治時期。

誠然西游記中，觀音菩薩做了三頂花花帽子給唐僧，緊箍咒一念，管住了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三個徒弟。現在顯形的“地、富、反、壞、右”，五頂和資（本家）和判（徒）、特（務）及知（識份子）加個臭字于前，這頂不適合，可換戴另一頂。

劉基沐當時是九江市第一高級中學高三學生，于中學個性態度得罪了班主任老師，其家庭成份是富農，劃他為右派份子，條件不成熟，他不服，便不參加畢業考

試，找到故鄉九江縣沙河街小學任教。

可是他的原籍城門鄉黨委書記趙華木見到，由于他家是富農，其父善于經之營之，創辦了一個油榨坊，頗有起色，便沒收了。土改法規定不沒收富農土地和財產，劉基沐便向九江縣人民法院寫過申訴，今其回來家鄉了，鄉公社欲報復，給他戴富農份子的帽子，土改時，他只有十二歲，且這頂帽子，是他父親戴了，再給他戴不合適，右派份子帽子，學校當局沒有把他戴上，于是根據此次沒收他家的油榨坊，他對公社爭執過，便給其戴上一頂壞蛋份子帽子，把他捕送到芙蓉農場，不夠判刑勞改，便定名勞動教養。只八個月後，轉解往東鄉磷肥廠，半改造式的工人，直到一九七零年才返故鄉，原主辦九江縣五金廠垮了，現于街頭巷口修理腳踏車，這是一位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命運。

## 八、文化大革命与反右派

政治運動波濤起伏，一次未了又一次，反右派運動以後，繼之四清、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由于一九六二年大躍進失敗，黨中央工作會中，朱德說：“這幾年，黨的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陳雲說：“這幾年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且說三分話等等。”劉少奇更直率說：“產生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幾年來在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够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

綫的傳統作風……”。這實事求是沒有實事實說，只是且說三分話，射影如何，有觸聖顏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領導人監督，黨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二人棄權（編者按：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志廢了。（鄧穎超 1975 年 11 月 22 日日記）。於是毛澤東體會勢必“維權”、“鞏位”，是亦與“反右派運動”之勢必開展有關云。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編者按：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編者按：指毛澤東）退下。在 2 月 10 日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意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德、陳雲、鄧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周恩來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鄧穎超 1975 年 11 月 19 日日記）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傳是毛故里韶山沖的滴水洞），致江青的信中，說了若要鞏固統治政權，必須七、八年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是總結了推翻清朝以後，軍閥混戰以及蔣介石坐天下，都沒有坐幾久，就是沒有經常橫掃牛鬼蛇神，是失着。劉少奇的發言，便導引了文化大革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實權在太上皇手上。所以

劉少奇派工作組又犯了路線上的錯誤，不少老革命問劉少奇這文化大革命應怎樣搞？劉的答說“我也不曉得”！

這文化大革命便是第二次反右派運動，反右便是肅反，是新肅反，正符合歷史悲歌《沉重的一九五七》年以後的七、八年跨入第九個年頭。

其實反右派運動也是備戰，雖提“文化”，怕轉“武化”，先把這些認為不可信任的，初步批鬥，防患于未然。在當時機關單位打倒右派分子開展的同時，農村開會對地、富、反、壞四類份子進行鬥爭。

九江縣沙河街鎮公社新城大隊的治安保衛主任王遠慶在全大隊四類份子會（約 30 人左右）的訓誡報告說：“現在把你們這些韋陀菩薩管起來，是卸落好輕裝上陣，語意十分明確。

韋馱：梵文 Skanda（塞建陀）音譯的訛略，佛教守護神之一，亦稱“韋天將軍”，佛教傳說他為四大天王之中，南方“增長天王”的八將之一，而居四天王三十二將之首。自唐初“道宣”記載其事迹以來，即被安置于寺院中，其像一般穿古武將服，執金剛杵。立于天王殿“彌勒”像之後，正對釋迦牟尼像，豈怕對面成對抗？

王遠慶之言，意思是你們這些四類份子為國民黨留下的守護神，必須卸除，此語尚是富有學識之士，方才想得出韋馱。王遠慶是一個農村大老粗，他沒有如此學識水平，是乃傳達上級高端人之旨，他是誰？

其實是黨內高層次人，多聽了劉少奇的話，毛怕這是黨內的鬥爭。

一九五六年東歐國際風雲驟變，毛澤東巡視全國到南方，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武昌游泳，其《游泳》詞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于詩刊發表，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上即指“知識份子百分之九十是擁護社會主義的”，還有百分之十呢，沒有談下去，游泳的大標題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當時我們看報，尤以為這是寫游泳的大自然環境現象，而實際已預報了政治上有一個大風大浪即將來到，不是大江風浪，而是政治風浪。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開始“反右派”運動，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開始“文化大革命”運動。

然而緊跟着而首先遭災的，是武昌市江岸上觀看毛主席游泳的人，當時是人山人海，緊跟着看，有說“看到毛游到旁邊來了”。這陣不知發自何人的妖風，于是人擠人，人推人，不可止住，成群掉入長江，溺死的雖以老弱婦兒居多，但是會游泳的青年小伙子，在水裏人叢中，被想活命的拉住，有技也難施展，惟有同歸于盡，嗚呼哀哉！估計一共死了三百多人。這是一九八三年我于華中農學院與會，散步走于武昌江干，訪問了幾位碼頭搬運工人對我講的。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是第二次反右，橫掃牛鬼蛇神。1966年5月16日開始，江青一手操縱的紅衛兵于1966年8月中旬到9月四十天內，北京市被紅衛兵

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萬三千六百多戶（33695戶），另有八萬五千多（85196）人“黑五類被受驅出北京城”（何穎、高新著《中共太子黨 336 頁》）。可是在一九六四年却已又受一次橫掃遭災領先了。該年九江縣沙河公社，舉行“春耕生產誓師大會”，九江縣中共縣委會對水稻栽培，要求增產仍譜大躍進之弦，增了產便是領導有方，人力勝天。提出“提早播種，防止爛秧”。這提早他可以越早越好，不管生物形成的自然環境規律，但是防止爛秧，便交給你們農業技術人員保險，政治代替技術。

我因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岷山分校下馬，調縣農業科學研究所業務負責人，此次派往該公社授農技課。聽說該公社是縣委書記左鳳崗蹲點，即其親自領導。心想，若能講得好，看看可以將功贖罪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麼？

於是盡心備課，廣集資料，找到一本原國立中正大學農學院院長周拾祿教授的著作，也是當時他任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兼江蘇省農業廳廳長時，被劃成右派份子後，所譯著的日本農業專家論文匯成《水稻栽培學》中有旱播育秧、半旱秧田、尼龍秧田三法，以防止水稻旱播爛秧，尼龍為英文 NYLON 的音譯，即聚酰胺纖維的商品名，我國叫“塑料薄膜”。

我並將九江地區農科所的塑料薄膜秧田試驗總結，及我在九江市農業技術學校教學試驗的半旱秧田總結，



編入備課教材講了。說了塑膜育秧是日本開始，現在其已全國普及，我國即將開始，等待今年試點示範推廣。

這位中共縣委書記左鳳崗在座聽講，他認為講了外國好，崇洋媚外，是右派本性未改，又遭到他直到縣農業局，向局長周升國大發雷霆，怎樣叫這樣一個人講課？光說外國好！周豈敢有違，只有又把我開除。可是縣委副書記張俊宸是我于一九五三年從省農林廳率農技工作隊派駐瑞昌時的該縣縣長，以及我右派期間任教勞動大學岷山分校時，他以書記掛帥，兼過該校黨委書記校長，雖有老關係，認為如此沒有講錯，可是左氏居于一把手開的口，張氏乃二把手，除與人嘆息“此人（指我）可惜”，也莫可奈何！如此我一言非錯之冤，“對”也是“錯”，又成了敵對份子。

我向張交涉時，原農業局幹部集體宿舍，于已下鄉幹部空床上，躺宿該夜，以待翌晨火車返沙河，該空床原于市農技校及岷山“共大”同事老師周龍水之床，當時室內只有兩人，其一范學元，也是同于市農技校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岷山分校同時任教的老師，居然竟向周升國告密我留此室。周命范將我外逐，不能留宿。我懇求暫住一夜，范亦不能和不念故情。實則在階級鬥爭為綱的當時，誰對階級敵人心狠，便可乘鬥爭的階級爬登政治的官階，范氏的外號“縣長”，是其向上的目標，但最終連農業局的股長也沒得當上，費盡心機。可我是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岷山分校下馬（即撤銷），持縣人

事局的組織介紹信分配到縣農業局安位于縣農科所的業務負責人，這開除逐走就是局長命所長叫你“走”、“滾”就是了。蓋我當時除明日購火車票的人民幣三角以外，真是身無半文，那能投宿旅社？于是，只有去投宿火車站候車室的候車椅，已睡滿了，折往候船室之椅，亦然。欲跳入長江以一了百了，心念妻室子女不忍，仍掙扎活着。

當時對我的開除，是無所謂開除不開除，就是要你離職就是了，認為你（指我）是岷山啓用的右派份子，你仍回岷山去吧！什麼人事制度不制度，縣委書記一言九鼎，在該縣，朕即法律的“土霸王”。

可是原來在岷山的右派份子集中營散了，原任教的勞動大學岷山分校也撤銷停辦叫做下馬了，我到那裏去呢？

由于“共大”下馬，我才調到縣農業科學研究所從事試驗研究只一年，又突如其來遇此不幸的冤哉枉也。本來這一年中，因與家離開，家人生活難維持，想回岷山教小學，則與家室同處，又被認為不安心本身工作。

今叫滾回岷山去，也無介紹信，教小學不得入，想舉家重新遷往一九五八年初上岷山時的原址曉陽孫家村。當時岷山黨委書記楊咏銀不同意，要另分往一個生產艱巨、收入低微的村莊。家庭因我調沙河想返岷山不成，只有家也從岷山遷出，至沙河街只有三天，而我却遭開除，妻能縫紉却業務未展開，簡直我能在地球上生

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嗷嗷四口，食半斷炊，求生無門，欲死不忍棄妻孥。

如此夫妻，日夜對泣，年方二周歲的在喃喃學言語的幼子見我夜在流淚，脫出一句“爸爸莫哭”。此言堅定了我的“要活下去”“不能尋死”的信心。

爲了兒女，爲了家庭要活下去，一定要頑強活下去，只有厚顏不慚再去哀求原有老關係的現九江縣委副書記張俊宸垂憐，張同情并曾到縣人民政府勞動科，提出“鄧鍾瑞這個人，今不能當幹部，生活出路還是要給他”。此話是後來該勞動科科員王臨川告訴我的。正是左誠暴吏，張乃青天。

對於左鳳崗是一個如何的官？我且在此以略知者插幾言。

前新合鄉址坊小學老師鄭耀旗，當鄉、區劃他成“右派份子”猶豫不決時，向縣方請示：左氏沒有見過鄭其人，也未曾審閱過鄭的右派材料，電話回言：“劃掉他”。鄭便成電話中這三個字定數的一個右派份子。

大躍進時期，左氏主持的九江縣新塘公社，餓死的人最多。

江洲公社人民政府爲了想修水閘，欲辦一件事，留了一筆錢未交銀行入庫，由于修此閘未先請示過左，左便定爲集體大貪污，受到集體開除處分。

九十年代他任中共江西撫州地委副書記，當大打擊全面刑事罪犯時，他的一個姘婦之子，本是打擊刑事犯

中，撫州地區的第一個大頭頭，要處死刑。他預先知道，便促撫州地區檢察院在打擊刑事犯開展之前先提出，先使法院判了較輕的有期徒刑，送去勞改了。這打擊刑事犯開展，則先判了刑的不追究而免了死刑。這豈是共產黨的司法獨立？還有黨委五人小組，可以決定生死權。

後來，打擊刑事犯時，將第二、三等頭頭判了死刑，這些頭頭也是撫州地區大官的子弟，左狡弄手法，但結果終被人檢舉揭發了。將他本來是“開除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却他用手法，改成留黨察看處分，弄到仍返其九江，是其老根據地，人熟關係多，終恢復了黨籍離休。

對於我的生活出路，縣勞動科派幹部王臨川至新洲墾殖場聯系，把我介紹到場屬棉花試驗站放牛，工資為一級農業工人每月二十三元，又由原成右派份子時生活費十五元增到人民幣三十三元又下降。本來新洲場農工工資計算法，為了刺激農工積極勞動性，採取“死分活搶”法，是農工工資不固定，即各評底分，再于勞動時計件搶分數，農工總工資除以該月總分數得分值，乘以各人總分數得其工資。則我每月只能得到 13-18 元，該幹部王臨川，却直接向該棉花試驗站書記兼站長張功水交待，我放牛得固定工資，不參與記件搶分制。

在該站勞動數月後，又常調從事農技工作，如滅紅鈴蟲的棉秸枯鈴處理，儲棉倉庫內藥劑薰蒸等工作，寫了一本《滅紅鈴蟲三字經》為科學普及資料。可是場總

書記程昌鑫囑各分場、隊的倉庫張貼。“文革”時程這應用右派文章，受到群眾的批評指責。雖然牧牛却也有畜牧科技，傳說，得了血吸蟲病的婦女不孕，此母牛腹水已便便大腹，居然已分娩了一條小公牛，後來未半年母牛病死，雛畜乏乳哺育，被宰吃了。我還只得流了幾點同情泪，這是由于我調升了工作，沒有放牧護理。

次年縣方派了一位當時組織部副部長來任該總場書記兼場長。這位場長一把手程昌鑫到場，即改組該場棉花試驗站，由副場長戴忠祥在總場宣布該站成立，站分育種、病蟲害防治、農業機械、生產四組及氣象哨，分別我為該站業務負責人，及藍寶光、劉思洪、楊仁發四人任組長，我兼育種組長，楊由該站書記兼站長，黃其珍當時病蟲害防治組員，後任該站站長、省棉花研究所副書記、九江地區供銷社副主任，劉思洪後任南昌鋼鐵廠職工大學副教授、氣象哨配一農工記載，我負責業務。

于我又能任業務負責人，也是張俊宸到新洲場視察時，對場黨委面諭，可以應用我的業務水平。對程昌鑫下來任場職務時交待過？

未數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又只有從事勞動做牧牛人。

事情“失”與“得”，常常是相對論，諺語有失必有得。我因講課說了“外國好”、崇洋媚外而又流放到新洲場。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武鬥，沙河的窮凶極惡場面，

我躲避了；在新洲我遇到貴人的保護。

沙河的鬥爭是在小學校體育場搭臺，使牛鬼蛇神赤膊跪于臺上，一個個笞楚鞭撻，無不偏體鱗傷，血迹斑斑。

羅德和是九江地區馳名的民間中獸醫，是地主份子，他的徒弟袁振國文化水平低，只讀了小學三年級，對獸醫技術沒有學好，認為羅技術保守，沒有衣鉢真傳，且袁那時當了鬧革命的“大聯籌”的委員，更想青雲直上。以大磚塊重錘其背，表示積極，羅原患哮喘病，鬥後下臺游行，只走二百餘公尺，便倒地死去了。

傅鑄業是九江縣人民醫院業務院長，留日學醫，妻日本人氏，扣以裏通外國，鬥打得游街後，回醫院便倒在樓梯下，醫院怕他死了，訊傳到日本，因其妻已歸國，國際影響不良；乃子夜即以救護車送往九江地區人民醫院搶救，當時復活，現亦已死多年了。

吳肇祥是江西省醫學院首屆畢業，任過國民黨軍上尉醫官，文革時是九江縣人民醫院內科主任，一九五七年已劃右派份子并摘帽子，這第二次反右的文化大革命又在劫難逃。于鬥爭臺上赤膊跪着，有人認為他治病有官架子，用碎篾片打身背還打其頭，誠若大劈，背血斑斑，頭皮破，大出血，吳以手摸摸，臉成血臉，頭成血頭，符合牛鬼的鬼頭鬼臉，隨之游鬥後患腦溢血，經搶救，不能行動自如多年，今亦已故。

蔡芝炎是九江縣農業局副局長，原江西省農業專科

學校畢業，武鬥後得了心臟病，已故多年。

程德昌九江縣農業局技術人員，中等農校畢業，年輕俊秀，正與局內女農技人員相交好，武鬥逼其二人發生了肉體關係，程在屈打之下承招了，女感羞耻，否認，竟打程幾耳光，程因此得了精神病，日日瘋瘋癲癲，流落街頭活着。

這文化大革命是全國性的，雖然我在新洲場，幸運遇“貴人”對我庇護了。留待後叙。

然而新洲場依然浩劫難免，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全場計五個分場，一個試驗站，存在三個造反司令部，由于場位于長江之中，鄂皖贛毗鄰，于是武漢造反派，什麼“江工總”“紅二師”組織場內的革命造反派，于是鬧得把全場棉花生產停下了，抓反革命帶上腳鐐手銬，全場近三百副，戴上了農工或幹部的手、腳。使場內農機修配廠的鐵匠打不贏。

今天你是革命人士，明日却成了現行反革命份子，服農藥自殺的，時有所聞，全場約十餘人，或自投長江以一了百了，全場如此而死的為四人。

文革到1967年3月軍隊高級將領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突然的“莫須有”罪名批臭。在康生列出的誣陷名單上元帥8名、大將7名、上將18名。軍隊中也出現大批冤案有8萬多人遭到迫害，1169人被害致死。原來在“反右傾”運動中，中共中央規定重點批鬥的人數控制在1%以下，1962年甄別平反時，被劃為右傾機

會主義份子的黨員幹部 365 萬，佔全國黨員總數 2600 萬的 14.04%。

扈景會是新洲場醫院院長，成了現行反革命份子，是關在本場棉花試驗站，一日三餐向食堂挂的毛主席像低頭認罪，三鞠躬後，口中要念念有辭，“毛主席，我有罪！罪該萬死！”如此念三遍，食堂炊事員才給你一碗飯、一箸菜，一瓢飲，仍得蹣跚入室，我幸未帶上銬鐐。但這請罪，也得遵行，因為我是老右派，不是現行反革命。可是這院長于先一天我們共同向毛主席贖罪，第二天早晨便聽說他跳長江死了。

董廣奇是新洲場總場農技人員，河南農學院肄業，參加中原革命大學學習南下，原于江西省公安廳工作，隨着技術人員歸隊的號召，而轉事農技工作，他是個知識份子，看到總場挂出“打倒小爬蟲右派份子董廣奇！”的橫幅標語，沒有批鬥幾次，也是看到我這個右派份子多年沒有翻身，便跳長江自盡了。

後來這劃現行反革命份子是怎樣在新洲場壽終正寢的呢？這由于反黨組織不只是“你說他是”，“他說他是”的橫擴展面，但必須交待出上級領導人來，如此更上一層樓追到頂。全場反革命頭子汪凡玉，他拒不交待他的上級領導，他的理由是不宜當眾暴露，後允許讓他個別談才坦白說了。即當前總場書記田紹興，曾任九江縣公安局局長，在場打擊現行反革命便是原由他發號施令的，却追到自己頭上來了。這一位田書記始悟再追查



不得的，總場人民武裝部部長李忠炎，也內中有名，于是便不追查現行反革命了。

然而我在新洲場所謂遇貴人“是怎樣一回事呢？是我任這場棉花試驗站業務負責人時，他為站長兼黨支部書記的楊仁發。是一普通農民，人說他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到，斗大一個字也認不到一籬。但是他有頭腦，認為這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總不會長久的，這打打鬥鬥，何能了日？他保護我，不準打，常用“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最高指示作擋箭牌，來禁止打我。

其實這要文鬥，不要武鬥，是別有用意，此是約束軍隊，不要開槍放炮打派系仗，這打幾拳，踢幾腳，死幾個人算什麼國家級的武鬥？長江中此時，不是天天有死尸下流麼？

楊仁發保護我，惱怒了該站造反派頭頭萬吉成（農工）想揪楊為“現行反革命”。楊竟大膽對萬說：“我是小時候隨母因父亡改嫁的後父來此蘆葦洲上墾荒的，階級成份何點不好”？當時唯階級論，唯成份論的戰鬥春秋，楊是擁有金子招牌，“若你要揪我，你打我不贏，我便要你不得過江。”蓋萬是長江南岸邊白水湖人，新洲場于長江中間。將萬懾服，便不敢揪楊了。

我在楊照顧下，分我放牛是輕活優差，只需拿一枝牛鞭，一條麻袋，會騎牛的墊牛背供坐，趕牛赴草場，牽牛繩圍套牛頸，縱之任其優游吃草，牧童便可將袋鋪地，或坐、或睡、或看小說，走象棋、打撲克，牧童中

有句流言：“放了三年牛，官也不想做”。

我利用了這優差，寫了《植棉三字經》、《滅紅鈴蟲三字經》、《養牛四言雜字》、《血吸蟲病母牛受孕記》等科學普及資料，可惜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浪濤中，都被造反派抄走沒收了。

楊對我放牛的關懷備至，牛生虱，當時土法滅虱只有調搽 6% 可濕性六六六粉，他則親自代我動手，短系繩，守待干，以防牛舌舔藥，中藥毒死亡，他資證明，他均將承擔罪責。

母牛與小牛同牧，小牛未穿鼻繩難管，會吃莊稼，怕我受罰，將二條牛、并補化肥二百斤，換一條強有力的闍公牛，一牛易放了。

可是該牛思鄉心切，竟效“越鳥朝南”，吃草也向其故里方向。一朝出棚，我往取精飼料棉籽以喂時，竟挽斷吊繩，下江堤，徑往其故里方向奔跑，大渡長江，我只有急找楊仁發，楊從睡夢中驚醒，披衣划船，渡支流往沙洲追捉，且沙洲上牧牛人有生產隊長等，過去的同牧人亦攔代捉，牛竟繞道從洲尾入大江，當時九級颱風，淫雨霏霏，長江申漢班大輪停駛，楊欲場方小輪渡其至湖口縣登岸尋訪，小輪不敢開，衆人多測牛在此大風浪中必然溺斃了。

牛鬼牧牛，跑牛死牛，這還了得，晚上必然的打鬥難挨，只有逃之遙遙，且往上游新港渡口探視能過江否？亦停渡。

這晚宿何處？有旅社而無證明，又是“老右”，豈敢暴露，何能住店？適逢新洲場牧童，往昔是草場伙伴，當天他是造反派頭頭，怕他執行階級鬥爭為網捉我，幸他有情，蓋平時我以吃不完的米，向安徽漁民換魚，漁民沒有糧食指標買米，這一斤米可換一斤魚，此牧童也來吃過魚，這時竟產生了吃魚效益。他拍拍胸部說：“住旅社包在他身上”使我住進了江洲旅社，這旅社原來反右前我來檢查棉花生產時住之，是坐上客，今坎坷成老右是階下囚，可是晚間又來了一批支左部隊。

原號招要文鬥不要武鬥是怕隊伍動武，現在軍隊均定名“支左部隊”，不便變右了吧！我是戰戰兢兢不寒而慄，幸一批支左部隊的查詢，都由這牧童代我應付過去了。臨睡時，這一個大房間多單人床，床上的被，一或二條不等，支左部隊却均禮讓，自己只蓋一床，將多的送給其他旅客，我當時年齡四十三、四歲，此時在該室高年齡，却均往我床上送。天呀！我是“老右”你們“支左”，不把我抓走，已够幸運，何敢受此厚賜，天寒被厚，倒睡了一夜好覺。

黎明，該部隊赴新洲場支左，新洲于江洲之東，旅社門朝北，出發于門口整隊，面對旅社則朝南，隊長發出整隊口令：“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向右轉，左轉彎齊步朝堤向前走（堤上即大路）。”口令聲驚醒了我。

睡夢中，左乎右乎？誰是誰非？執筆揮筆，用右手者多，開步，跳遠皆右脚先着地，英文右字為 Right，

該字亦譯“對”的。

早晨風平浪靜，過渡到了新港找到牛故里，詢牛却未歸，是否隱情，會將之另售？但是所詢問的為其“光榮大隊書記”，他曾于九江市農技校的農村幹部農技培訓班受過我的課，按理不會騙我。

于是又只有沿大江東下，渡彭蠡之口，達湖口縣，正遇一位老同學被抓游鬥，他與我是抗日戰爭時吉安青原山國立十三中學高中同班，畢業是保送國立廈門大學物理系，我被保送江蘇學院數學系，均以家有土地，想辦農場以改進桑梓農業，同考入國立中正大學農藝系，又同班了。

他被揪鬥游街，打扮得身穿長衫馬褂，頭戴禮帽眼鏡，手中拿着不知那兒找來的一本舊賬簿和一個算盤，頸上挂了“打倒大地主郭先孤”的大紙牌，前面鳴鑼開道，後面觀眾簇擁，好不威風，非常熱鬧。

見街頭巷尾張貼他的罪狀，連平時勉勵其弟與兒女力學，為望子成龍，也是罪惡，是念念不忘居人之上，還要做統治階級。

得道天助，後來他全家，居然一弟、二子、一媳、四博士，弟為日本博士，華中理工大學教授，日本客座教授。長子英國博士，武漢科技大學教授，常與英國專家合同赴英科技研究。次子偕媳美國博士，經歷祖國如是，均留美工作。

後來太平盛世，我見他家門上春聯曰：“書山有路，

傻小子敢攀絕頂；學海無涯，痴孩兒竟涉重洋。”應該死當瞑目。可是一九九一年其得肺癌逝世，我往親視含斂，其目仍張，眼角射矢（屎），仍死不瞑目。

郭對其故里湖口縣農業生產，貢獻良多，由于中國職稱進行較遲且混亂，他為第三子之頂職而早退休，時職稱評定尚未開始，退後又不得評，僅以原技術員級套上一個助理農藝師而壽終，正其得肺疾，實亦憂傷肺也。我尚得農藝師，評高級時，地區已定了我，而縣農業局副局長張世松不通知我赴省方應試外語，八三年為幼女頂替而退休，後亦不得評了。

爲了尋牛，我在湖口縣住入低級旅社，下午到江邊見到江洲、新洲民船，探悉該牛是否找到？孰知他們却告知本單位，造反派數人，划船前來湖口縣抓我這逃犯；可是蒼天相佑，其船剛出支溝，入大江。竟下一陣雷雨，把人船淋回去了。若是我被捉住，途中船上，便要飽嘗一頓人權的人拳，來人中尚有被揪的壞蛋份子本試驗站書記陳紹彬，他年輕時，曾參與過“丟包”，即將其鬥爭的人，痛打後裝入麻袋內包扎袋口，擲于長江溺死，那麼我是否該次會被“丟包”？或被打得難受地從船上自投大江？難料！真是天公作美，吉人天相。

次晨繼續往湖口縣城郊探尋，在一農村得知該夜有外來的牛觸壞其牛欄被驅走了，心知該牛未死，于是大大舒了一口氣，心中的似一塊石頭落了地。接着却在湖口城街上遇到了本單位派出來捉我的人，是一個轉業軍

人胡家槐帶領幾名下放學生，我先知牛有踪影，且江洲牧牛伙伴來湖口買牛，得悉該縣北港村已捉到一牛，真是牛對方向記憶準確，再行數百步即渡彭蠡之口，為該牛故里區界，於是與胡相商，先往認牛，胡頗通理性，沒有把我先捉回去。

於是同往北港，確認了是該牛，但是這村提出要賠償被吃的和踐踏的莊稼，觸毀房屋等，款在數百元之多，以我當時的工資，每月人民幣十四、五元，幾年不吃也還不清債，約胡回站商量決定，使得我沒有當場簽字。

還是《毛主席語錄》吃香，該村八戶人家，後我與楊仁發相商，買了十多本這當時叫“語錄”的紅寶書，寫了一張紅紙“感謝信”用毛主席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找到該生產隊書記（即村長）的住屋，在其家中堂挂好毛主席像，貼上感謝信，放上紅寶書，燃放花爆，向像三鞠躬，口念語錄，於是毫無條件，牛也就牽回去了，這像該時是人也是神。

在認了牛的那天，便偕胡家槐等同返新洲場，以為牛找到了，應該是太平無事，那會知道貴人楊仁發保護神，以小帆船直下彭澤縣沿江尋牛下落未返，晚上依然對我武鬥補課了。

鬥爭會上被鬥者那算是人，所謂人身自由安在？人權安在？法律安在？惟荀子的“性惡論”在演奏，孟子的“性善論”避難去了。

今不作這程式的敘述，且以歷次刑罰分類命名分述之。

擊變鬼頭刑：既是牛鬼，不應有人頭，要成鬼頭鬼臉，怎樣塑造？這是一個山東佬叫谷朝章的親自動手。他原本是站內農工，下放知識青年做農工總不是滋味，要向上爬當幹部、升領導。惟一次站搬家，一個早上生產隊長分他妻去搬了一次家具，怪我未留她坐考棉種輕活，發我氣，我也批評了他有氣。該鬥爭之夜，他先動手，開始塑造，是用一根皮帶，對我滿頭滿臉揪打，打得頭腫如斗，眼臉青肥，不像人頭了吧？還不够，没有其他分場鬥之狠。

第二分場勞動改造的蔡慶榮，是都昌縣工商銀行信貸股股長崗位上劃的右派份子，鬥打得當時大便瀉血，前胸右筋骨打斷了兩根。四分場勞動的老右陳紹平，被一拳便把其一眼睛打得失明了。

于是原站內會計杜邦本向我走來，握緊拳頭，對準鼻樑，連環炮響，狠擊幾拳，鼻血噴流，這樣見紅挂彩才止。可是此會計，當時是革命的，沒幾天被其家屬住的是二分場揪為反革命，由鬥人打人而人鬥人打，舉家賁夜偷偷回其故里，湖北黃梅縣農村了。

本站獸醫師何學清，由于其兄是某大學教授，來信談了這次政治事，學清便被揪為現行反革命，此次他的鬼頭鬼臉被塑造得比我還更像，更重，更生動，沒想到有楊仁發晚上竟偷來給他推拿、按摩、接合，真是“貴

人”。

斬頭示衆刑：原來是本試驗站的一個農工隊長張忠贊，他走來對準我頸就是一刀，我爬地呼呼，似乎在摸找我那顆被斬落的頭，張在鬥爭群眾面前揚言“我不打便不打，打只打這樣一下”斬首也只一下，我頸痛止，才偷偷看到他手中拿着一把泥工圪墻的木板刀。該人後得皮一劃便出血，頸上也是劃現血痕，獸醫叫血皮脹，人醫診爲缺少血小板，幸當時他對我斬首的不是鐵刀，否則我人頭落地，便看不到他的全身一抓便出血，頸痕似刀刻，後又遭拖拉車禍，折斷了腿、谷朝璋則兒子遇車禍痴呆了。真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來早與來遲！”

這斬首示衆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紅衛兵的天下，破四舊，紅衛兵于下午四點半抄“京劇行頭刀槍劍戟”，于國子監街孔廟焚燒，既令牛鬼蛇神搬燒時濃烟，還得跪于火周圍，給以溫暖。紅衛兵還用這木刀往他們的腦袋砍去，個個斬首過刀關，劇作家小說家“老舍”頭破出血了，“老舍”沒有措去，血衣成紅色尸布，于25日投太平湖而死。

登絞繩臺刑：這次鬥爭是在倉庫內的橫樑上挂一根有活套圈的繩，繩下放了一張是我設計的棉花試驗考種桌，又是半張乒乓球桌、會議桌，桌上對準所懸繩下疊了幾層磚，促推抱我登臺并站于磚上，只要把頭伸入繩圈套內時，將磚踢開便可懸樑，心想難道我便如此懸樑自盡？對妻孥一句遺囑也未說，但是我內心不恐慌，因



爲我未犯罪，更未犯死罪，只不過又一次耍猴戲而已。正是谷朝璋命我伸頭入繩圈套內時，保護神楊仁發開口了，說“別開玩笑”，真的死了人怎麼辦？原來我入場受鬥時，見楊貴人在場，心中就不太怕，聞其聲而聽其言，我更不恐懼了。

跪菱齒板刑：這可謂優鬥“文鬥”，是一塊洗衣板上刻的菱角花紋，很深很尖，但是跪時必須拉上褲腳，露出膝蓋骨與菱角花紋相接吻，倒頗刺痛，刺骨難支，臺上正襟危坐的是造反派的當權人物，形似“蘇三的三堂會審，而這却是多堂會審，聽到一聲“滾”！“死走”！這是皇恩大赦，便很高興趕快溜之大吉，暫時解放了，退出鬥場。

北京烤鴨刑：這是中央農墾部的造反派，從北京帶來的道地名菜名，演譯成名刑名，只有他們才能設計出來，冬天燃了一大盆木炭熊熊烈火，他們適當隔離取暖，挨鬥者緊靠火盆，站立低頭，或跪一窄長木板凳，還得低頭，左右無依無靠，懸子叮當，不慎再深鞠躬，便要投身火盆，自焚己身，火烤得滿頭大汗，徒呼奈何！新洲墾殖場總場書記文經儒，副場長許發松等，均受過此刑。

紅場日炕刑：這是在江西師範學院第二教學大樓前一塊紅粉拌水泥場地，名曰紅場。原爲南昌中意飛機修造廠大棚，構件被附近村民拆用所遺廠的地面；院方改建成滑冰跳舞露天活動場。十年動亂，1966.8.11 造反

派令全院教職員工游鬥的計 141 人，佔全院教職員工 27% 成牛鬼蛇神，在炎暑烈日 40℃ 高溫下，跪于紅場一百多人成不規的圓圈，自上午 10 時跪至下午 2 時，個個手掌膝蓋燙得血肉模糊。教師中熊化奇副教授為中文系主任、省政協委員、民主同盟成員。中文系教師黎仲明，民盟成員，抗日戰爭時遷廣昌縣的省立南昌一中教務主任，1941 年曾代校長。院醫務室主任醫師周天柱均曬倒地死了，革命的紅衛兵還要踢幾腳測死活，倒地的熊化奇，人抬放第二教學樓門口平臺下，倚門席地斜坐，女生萬女德硬說熊是裝死，踢幾腳見無動彈，全場由院文革籌委會主任熊明坤（學生）才大赦說“回去鬥”收場，否則還要曬死更多，歷史系教授何基，觸景在家自殺身亡，共死四人。（見江西師範大學校史十年動亂。121 頁）

頸骨測力刑：頸挂黑板在此發源于新洲場內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九江縣分校，造反派學生紅衛兵，對其黨委書記張盛庚反教育的刑罰，一塊大黑板重約十多斤，以鐵絲穿其上端，挂于頸項，鐵絲嵌入頸肉，却也痛楚難忍。

一次張氏跪鬥于禮堂講臺上，原來是他訓話站的地方，現在却要跪着，頸項上還得挂懸黑板，張正非常難受之際，有一個學生氣勢汹汹，跑上臺將張的頭往下按，苛斥吼叫“低頭”！你還想抬頭？這樣黑板便落下擱在臺地板上，鐵絲鬆了，不必頸懸，輕快一些，舒服多了，

張原戰慄認爲該生登臺對他表演拳擊，又要嘗人權的人拳！後來才知道還是他的“保護神”。

後來環游十數里長的新洲場圍墾堤的游鬥，依然挂黑板，還加了新洲場副場長趙鵬九，原任解放軍營長轉業，均累得珠汗淋淋，氣喘呼呼。

游鬥圍堤，還得戴高帽子，全場牛鬼蛇神太多，近百數十人，高帽得自己扎做。本試驗站書記陳紹彬自做高帽子頂有一個橢圓球，人問這代表何物？陳說：這是一個蛋，因我被揪爲壞蛋份子。聞九江地區書記王書楓，（後任省人大副主任，五二年他任瑞昌縣縣長把我由省農技推廣工作隊留下。）當時高帽子，造反派依其身高而扎得等高，在九江市街上游鬥時，左右各一人以叉棍扶住。

我自做高帽是在原牧牛草帽上，扞插一個篾圓錐體筒，連草帽邊上，均糊以白紙，戴之比篾扎高帽箍頭要舒服，且可以帽邊拉下遮臉避羞，他人難見我真面目，尚可竊視他人；結果途中依然有一個人，揭起我的帽邊，欲識廬山真面目，笑謂“原來是這位放牛佬”！這高帽子舒服多了。“放牛佬”是我牧牛時揮動鞭兒走四方，與牛共遨遊時，很多江洲、新洲棉農認識我的封號。

游鬥時被揪的牛鬼蛇神不得少一個，場醫院傅景會院長跳長江自盡了，依然扎一個稻草人貼白紙寫傅景會以代之，由該院醫師曹金鐸背着，或跨騎曹肩以代游。原場委書記程昌鑫、黃浦軍校六期生郭文成，解放前任

過永修縣縣長等，是為觀眾注目者也。

這揪鬥游鬥，不少人不知後果如何？寧願一了百了，自投大江，武漢武鬥不斷發生，長江浮尸，幾乎天天有十多具下流經過。

一位妙齡衣着時髦女郎，二條辮子長過膝，擱淺于江洲新洲堤外的沙洲上，正是：

誰家女多嬌！何故大江漂？  
長辮逐浪轉，粉面泛波濤；  
沙洲尸擱淺，肥腿狗吃掉；  
胸有刀刺迹，死因難測曉。

脚被家犬吃了一腿，後幸由好心人，就地掘穴挖沙埋之，但見身有刀刺迹，是情殺抑鬥殺？不得而知，後悉該女名江國華是九江市人。

新洲場位于長江中之洲，朝鄱陽湖之口，因老河道于洲北而屬江西，是江洲下端堤外延伸之洲，毗鄰鄂皖，所以造反派有三源，三個司令部不是一致，一個司令部叫“九一六”，是南昌發展來的，一個司令部叫“井紅司”，這二個是合作一致的，另一個司令部叫“紅造司”其意可能是紅衛兵造反司令部，是武漢發展至黃梅縣，再發展至九江，九江發展至新洲，所以新洲槍聲，手榴彈聲，夜有所聞，一人夜起在自家門口將蹲地大便，竟被堤上造反派巡查的，見手電筒光一槍擊傷，幸未斃，環境如此惡劣，場內農工能走的都走了。

本場這棉花試驗站只剩我一人，不敢逃，也因牧牛

離不開，適廚房大竈在修理，我便將二口大鍋，單人床二頭，各放一口，應付槍彈入室時，便滾入床下，頭腳可以对入屋彈鍋先御之。

家居沙河街，妻事縫紉，也被揪鬥為漏劃地主份子，天天當南潯鐵路火車經過沙河站時，要隨所有的沙河街牛鬼蛇神，屆時集體列隊跪于站臺上，挂牌俯首迎送火車，這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掃臉出醜型。且新洲場棉花試驗站的造反派積極份子谷朝璋，又率人到沙河街鬥爭我妻，抄家沒收現款、金、銀等財物，谷尚將抄得金戒指，入其私囊未繳公。

據此思索，繼續亂下去，終非了日，不如舉家遷返故鄉，以度殘生。在家鄉親戚故舊多，先父行醫四十年，活人無數，本村宗族親誼，從來未收診費，貧病尚且贈藥，有德無怨，我自幼讀書于外，無德無怨。當時新淦（干）縣委副書記兼縣長饒啓文，曾二次病危為先父之起死回生，又是鄰村佃戶，也種過我家的田。縣公安局局長唐年葆，是我任教新淦縣金川鎮中心國民學校時的學生，可能是兩柄保護傘，也許在這武鬥中，稍較安全，但是老和尚的一本經，普天一色，何保護之有？

家有事相商，睽違兩地，如何聯系呢？在一個夜，偷將信往投郵箱，緊張的情緒如偷渡哨口，味得後來口翻苦水，聞膽汁是苦的，以為味破了膽，可能是味得膽汁逆溢了。

妻偕幼女，幼子回故鄉了，可是公社卡住其戶口，

不落實到本村，我以爲戶主未到，便對場方堅決多次申請，報告呈了十次以上，才遣送我回原籍。

故里的公社抓到戶口，要把我全家分于農活艱苦的山村，怕回本村會對我“保皇”。我徑往見公社書記黃發龍，他原是縣城曾木匠店的學徒參加革命，他在公社院子門口接見，我說是申請回原籍，他說到了公社便是你的原籍，我說具體出生地樓前自然村是我原籍。他重復：“到了公社，便是你的原籍”。我說：固然，若擴大原籍範圍而言，全縣，全省都是我的原籍。他即翻臉說：“你還跳皮，就不分你到樓前”。這土霸王只有他說的沒有你說的，現已得老年痴呆症。

于是便被分配到公社的邊陲，村民無土著，均是移民，民性橫蠻，生活艱苦的丹元自然村，却使子女妻室同開始度我的挨打受鬥生涯，尚不如初成右派上九江岷山。這次猶株聯妻孥，妻能縫紉不準做，幼子被叫“右派崽”，甚至他讀小學，在校、在路上常受該丹元村小孩打，後來我本村“樓前”有較大的小孩子于該桁橋小學，見幼子被欺，爭幫，橫目相對，便不敢了。幼女當時僅十三歲要幹村婦成人的活，妻也經常受鬥挨打，回思往事，涕淚汪流。

關於我所受的鬥打，是又難以盡述與形容，一言以蔽之，簡直非人也。且不以過程而以刑罰型類取名分述之：

專埋死嬰刑：回思舊社會，農村以住廟住祠堂（宗

祠)人的社會地位最低。凡是那家死了嬰兒，便叫他們去埋，給以小惠。我家下放到該丹元村，未數日，即有孫寶長死了一初胎嬰兒，便由該村一老嫗，財祥之母，把我叫去，命我將其包扎好的死嬰，盛于破土箕中往瘞之，毫無小惠。我想着黛玉葬花詞：“爾今已死我來埋，他日葬吾知是誰？”正是大雪滿山，剛來不識地勢，只有就村後山邊，爬開雪，深掘穴，厚蓋土，緊築之。後來雪化，埋地乃村人來往之山徑上，若談地理風水，是埋在大路上，是大不吉利的，可是後來該孫寶長竟三子一女，子女繁衍。

除夕禁閉刑：舊歷過新年是家家門牆上貼着紅紅對聯，尤其門上紅紙“開門大吉”是不可少。然而我這牛鬼蛇神之家，住的是村中集體生產時的牛棚，一欄分三段，一段隔成各二室，各一大門。其中二戶，一為南昌下放戶，一為湖南糧荒外逃戶，他們都是人民。村人祈吉祥，怕我們牛鬼夜出呈不祥，晚餐時即在我家門外加鎖。

大年初一，聞門外巷中人來人往，“恭喜發財”不絕于耳！我家是發不到財，也無人來恭喜，只是全家靜坐！靜默！享受着關門也祈大吉，一直“關門大吉”到傍晚。要做晚飯了，却缸中沒有水，幸有小女兒膽大，大叫：“我們倒底犯了什麼罪？連水也沒有喝嗎？”才可能有好心人將話傳到了鎖門管鑰匙的人，對方開了門，我外出汲水歸來供妻執炊初一大年晚餐。後見電影

《元帥之死》賀龍被禁閉，以碗盛屋檐水等鏡頭，直至饑渴而死。

靈寢掃臉刑：劃成右派進行跪鬥，就是給其掃臉出醜，我是故里的大學生，舊社會是有點地位，分子異村，原籍沒有掃臉，于是本來原放祖宗牌位的神臺，名靈牌室，原祖宗牌位于破四舊燒光了，靈寢成光臺，于是將一位是城內原最大百貨店老板鄧友諒，一位舊社會鄉隊副鄧遠性和我三人，跪于靈臺上，向來鬥爭和看熱鬧的村民低頭認罪，算出醜掃了臉吧！還有劉少奇也跪在左旁，是稻草人標名。

倒拖死狗刑：雖然我是“老右”原改造時，仍多從事農業技術推廣指導及教學工作，算是利用一技之長進行思想改造，耐不了重體力勞動，如是一到丹元村，適逢冬修水庫，得與農民一矢同仁，已累得難于動彈了。卧床于家，桁橋大隊民兵營長孫懶根，丹元村人，啓眼見尚有我這牛鬼蛇神未到，便帶一民兵排長直到我家，揭被褥從床上拖起，二人各執我一脚拖走，叫救命有何用？形如倒拖死狗。後二人改各執手脚，有如刨猪出盆，至水庫堤上，是實不能動，即命令跪在堤下示衆，至勞動收工，由妻扶歸。

如此刑罰，也有故鄉新淦縣鷺溪村李開瓊，亦“文革”時卧病于床，須要游鬥而促起，步履維艱，便用繩吊其一脚，初若趕牛鞭走，牛不走，便人在前拖，倒地亦拖，如倒拖死狗，直到游完其本村始罷，背已磨破，



没多久便嗚呼哀哉！李原是抗戰前國立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官至薦任一級，抗戰勝利，從日本手上接收九江市興中紗廠的便是他。

拾屎換飯刑：鷺溪村李開棣，抗戰前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曾開業律師。解放前夕，任江西高等法院審判官，薦任一級，解放判刑五年期滿，家本居江蘇鎮江，村人提返，不能農業勞動，文革于故里拾糞積肥，規定必須日積多少斤，不足便少發或不發飯，以致餓而病，病而死了。文革時何長工下放于峽江一地質隊，也在水邊何君村拾過糞。

油茶棍擊刑：油茶是山地油料作物灌木，質極結實，常用抬樹分肩力，中途休息時，以其杈承樹，當對農村集體生產，艱巨的勞動，是分給牛鬼蛇神去勞動。一次早晨，妻女待執炊吃早餐下田，一丘山間小田，先日我偕妻抬禾盆上山（農民是一個人頂掬）全家把禾割倒了，次晨我獨個兒去脫粒；該丹元一群小孩在小田周圍放牛，見我孑然一身，便用牛鞭打牛鬼為戲，牛鬼何敢自衛還擊。打的好玩，受者痛楚，驅之不散，我搶奪了一個小孩正打我的鞭，牛鬼奪牛鞭，這還了得。眾小孩回家說我打了這小孩，無理可申辯，這犯了滔天大罪，向生產隊長姚苟理申辯非如此，得到的答覆便是重賞我一臉一耳光，苛斥以待“跪到那兒去向毛主席請罪去！”生產隊長一句話，便是法律。我向毛主席請罪，是禾場上一家牆上，貼了一張毛主席挂像，自己只有跪于那像

下，可是這小孩的父親伐木抬樹返，聞誣言我打了他的  
小孩，這小孩父劉三庚，不問青紅皂白原因，就是用他  
抬樹的油茶樹棍，對跪着的我，如打“高爾夫球”似的，  
對我截腰一棍，打得我跌一丈多遠，繼之一手拖我如拖  
死狗，一手執棍繼打，那時我只有叫“救命”的呼吸，  
別無其他呼吸。

世上竟有好心人，一位湖南因饑荒遷來的農民劉元  
初拉着他執棍的手，叫他“別打了”，不止。聞後來該  
生產隊會上，對劉元初還狠狠批評他不以毛主席的“階  
級鬥爭為綱”。後其幼子為山西大學工學士，高級工程  
師。

在這打死狗刑後，全身痛楚，尚令下午一同去抬樹，  
豈能支與能活？決計逃跑，只有逃之遙遙。臨行時，對  
妻尚親了一吻，這是生離，也許是死別，舉家哀號！這  
跪地對像請罪也沒有用，這像必竟是人，不是神。

流亡伊始，先至妻的乳母的養子李漢杰家，要了不  
少傷草藥，沿門乞食到親友家，住服傷草藥，稍愈便徑  
赴九江新洲墾殖場，後悔當時多次報告申請回原籍，得  
到若此後果，又要求回場，幸蒙收留。也由于文革期，  
該場無技術人員，棉花蟲害猖獗大斂收，于是我入場以  
放牛為主，及時提供防蟲措施。

當時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到新洲場視察生產，也是  
抓革命促生產，看見燕子吃蟲，問經過的張裁縫是什麼  
鳥？張答這是燕子，程說這鳥能吃蟲，可以各家多養些。

張說這是候鳥，到時會飛走，養不住的。又程世清視察南昌熱水瓶廠提出節約原料，改熱水瓶膽的兩層玻璃為一層。技術人員答一層不保溫，會透熱。程囑加摻鐵末子以隔熱，該廠技術人員只有費時研究了很久。

適長江大水，圍堤恐破，牛將遷過長江，在湖口縣山地放牧，本站書記劉婉蘭、女、高中畢業，站長黃其珍，原我辦該站為業務負責人時的植物保護組成員，九江農學院中專班畢業，二人待我優厚，這渡江放牛，床及被褥衣服，都是她倆代般上船的，我只管着一頭牛，抵彼岸，我又揮動鞭子，徘徊彭蠡之濱，曾登上湖口鄱濱的最高峰，極目楚天，悲動的情緒中，思緒萬千，竟依楚詞而歌曰：

執蘇武之鞭兮！ 牧新洲牛。  
登彭蠡之巔兮！ 觀大江流。  
瞰青黃之界兮！ 是非明辨。  
嘆冤假之案兮！ 豈終身留。

注：新洲：農場名。鄱陽湖清，長江水濁，匯流至石鐘山以下始混和。

此磚拋出竟引出樂安縣文化館館長鄧繼環賜玉：

憾時命之乖兮！ 瘋馬癩牛。  
愾運交之弄兮！ 鐵盆飛流。  
眺青黃之界兮！ 清濁分辯。  
睹六月之雪兮！ 奇冤何留。  
※ ※ ※

揣光明之懷兮！ 爲孺子牛。

摘高科之星兮！ 灑盡風流。

掬報國之心兮！ 肝膽赤辨。

挺七尺之軀兮！ 正氣長留。

程世清的視察該場，有南昌下放的女學生譚冬幼，被邀至其停靠堤外江邊的軍艦上，歡度良宵，旋提爲場黨委書記兼場長，後介紹譚與其參謀結爲連理，這也是抓革命促生產。

雪地冰凍刑：丹元村的鬥我，是幾個該村黨員當權人想鬥便鬥，有如逢場作戲，一次在倉庫 室外已下厚雪，剥光我的冬衣，只剩一件薄毛綫衣，劉柏林二人抬我到室外，置到雪地有如企鵝伏雪，我也卧着等待凍斃。不久，一湖南客居劉高生說：“別開玩笑！真凍死了怎麼辦”？便仍抬我入倉庫。

然而一次桁橋大隊治安保衛主任劉老仔癩痢，管牛鬼蛇神，認爲這次修水庫擔土不力，欲促躍進，以一位年逾花甲的，舊社會任過副鎮長的龍世昌爲例，令其自脱衣成赤膊，跪之受鬥是一個晚上，白天勞動晚上鬥，室外大雪，後龍世昌不久便得傷寒痢疾死了。

螞蟥吸血刑：該丹元村水田多螞蟥，赤脚耘禾其爬上脚吸血，多時達大小三，四十條，尤以剛孵化的小者居多，其吸盤釘脚吸血，倒也痛癢難支，凡螞蟥多的田，便分工我家去耘，向螞蟥輸血，也是義務獻血。

逼入陷阱刑：該村水田多趵突泉。其中田泥稀浮深

處，人陷入竟可沒頂。一次耘禾，該村當權農民，在列隊耘時，將我排列于前行必至陷阱中，包圍促進，我被其推入時，自己只有仰臥田中，如此尚有半身可在陷阱邊沿岸，否則再進一步，泥將達腰深，甚至沒頂，待村中農民耍這猴戲得意回家午餐，我方沾混浮泥爬起，幸未遭沒頂之災。

這喂飼螞蟻，圍入陷阱，沒有拳打腳踢，大概便是“文鬥”，符合“要文鬥”，不要“武鬥”。

拳擊腳踏刑：對牛鬼蛇神是要把它們“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腳，叫它們永世不得翻身。”這也是“文革”中的口號。

對我此舉，是一次收晚稻中間休息時，該村農民自稱他們才是人民，人民休息休息，我還得束扎稻草，尚要供其取樂取樂，這次鬥爭是本村人任大隊民兵營長孫懶根主持，孫柏庚癩痢乃對我演拳擊，但這拳擊只能他擊我，不能我擊他，他是人民，有人權演人拳，我時無人權，我的人拳那能演？我被打倒在地，孫柏庚再用腳向我背部一踏，我的一根背肋骨踩斷了，後幸為鄰村雙坡村農民曾三根接合了，可是第二次再去向他求診推拿，其女來娘家作客，竟責父不應該接合，我求推拿不果，當時牛鬼蛇神的處境，可想而知。不過懶根早死，柏庚亦亡。

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腳，彭德懷元帥于文革時，除坐噴氣式飛機外，也經受了此滋味。是彭患瀉肚病，

一次入廁出來昏倒在地，有一個人踏上一腳，并對彭吼叫：彭德懷！你認得我麼？彭掙眼一看，以吼對吼，也吼叫：我認得你啊，你是朝鮮戰場上的怕死鬼啊！我恨當時沒有把你槍斃。原來這是抗美援朝時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一位師長，一次戰役未奉命撤退，彭按軍紀要槍斃他，後來毛澤東保了。庇護了，此時彭受禁閉，該人即監視彭的要人也。

彭德懷之所以如此被監禁，是廬山會議彭對大躍進的錯誤上“萬言書”，但是後幾天張聞天在廬山作了一個下午的長報告，有理論的分析，有實際的事例。<sup>①</sup>于是形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以彭為首。毛澤東說：“因黨內出了鬼，使我要做鍾馗。人云非也；是水濂仙人洞境，群猴會鬥悟空，悟空變法了。廬山會議後六年，毛澤東力勸彭德懷“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綫工作。彭說：我批都批臭了，怎能工作！毛說：臭了可以香起來嘛。彭說，我對工業不熟悉，我不能幹這差事（引書刊報 2007 年 1 月 30 日 14 版人物春秋）。

補叙刑名，有的是歷史法律全書所沒有，為我以其型命名的，尚有：

炮烙陰戶刑：這是九江縣新塘鄉舊社會馮鄉長之妻，鄉長處決了，鬥其妻。以燒紅鐵棍，剝落其褲，直通陰戶致死，其二孤哀子，馮承炎兄弟，後均于九江市農技校的學生與牧童。

拉牽奶頭刑：這是豐城縣黎山脚下農村，對一位地主家的未婚閨女，使脫衣成赤膊，兩乳頭各系一小麻繩，逼問錢財時便緊拉繩牽動，有如舟逆水行或無風逆上而拉行，後該閨女受此侮辱，歸家即自盡了。

赤膊吊冷刑：這是新淦城郊地主內的中少年婦女，于農會逼現金時，集中皆脫光上衣綁吊，既令其冷，又可取樂，婦女惟有垂泪不敢言，唯鄧敏正後妻，半老徐娘，體膚白胖悅目，衆皆注視，說了一聲：即使令冷，單褂也得給我們一件以遮羞，搏得了幹部一笑而已。

這反右派運動中，主要在第二次返右運動，即文化大革命運動，尚有一字之差而致殘及一舉不慎而喪命者，新淦縣糧食局幹部萬祥雲，南昌人，被揪要寫認過，且每張檢討上離不了很多“毛主席萬歲”，寫得太多有一處筆誤寫了“萬主席萬歲”，他自己姓萬算不了老幾，但依然批鬥他想當主席，滔天大罪。結果人權執行人拳，人棍打得人滾，一直打得足乏力，站不起，行不動才休，終致行路跌斷了一腿。

江西師範學院中文系鄧老師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檢討時寫毛主席語錄中“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把“掃”字寫成古體字“埽”。既不是簡化“扫”字，又不是繁體“掃”字，批鬥他把帚拋于土旁不掃，對抗毛主席，他也就只有低頭認罪。

我于新洲棉花試驗站夜寫檢討中，應用“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已是夜

深入靜，適拖拉機在屋後耕地“嗒嗒”的響，我隨筆寫“舵”為“拖”字，又語錄中我們的隊伍，八路軍新四軍，我寫成八路軍和新四軍，多了一個“和”字。經九江縣文革辦公室批下為“拖手”是侮辱毛主席，多一“和”字，是篡改毛主席語錄，只得跪門低頭認罪一次。祇是不知古之文字獄又如何？

如此等等醜不欲聞者，也是遵從毛澤東語錄指示“革命不是繪畫綉花，不是做文章，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秦始皇有過焚書坑儒，其焚書令規定：除秦國的歷史書及醫藥、卜卦、種樹等書外，六國史書及民間藏《詩》、《書》、《百家語》等，一律燒掉，違者處以鯨刑，并罰做四年築長城的苦役。有敢談論《詩》、《書》、《百家語》者，處以弃世重刑，以古非今者，舉族連坐，官吏挨戶搜書焚之，頗多珍貴書被焚。致于坑儒，僅咸陽城御史大夫即拘捕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追查其借古諷今，非議時政，酷刑逼供而後坑殺之。

如此浩劫，歷史實存，未致冥滅。秦之此舉起因，是官中方士盧生和侯生逃之夭夭引起，及齊國方士徐福帶領童男童女，尋找海上仙山與長生不老藥騙局，遷怒了始皇，致有的論著說被坑者是方士，却更多論著則認為被坑者是儒生，有的說則二者均有而以儒生居多。由于秦始皇本來輕視儒生，從其長子扶蘇向父王進諫詞中有“諸生皆誦法孔子”之句，也證實了被坑者是孔子之徒的儒生，但有不太同意如此對待儒生，後扶蘇被宦官



趙高與李斯偽造始皇遺詔，逼之自殺，立胡亥為秦二世，又被趙高所殺，李斯也被趙高所殺，趙高立子嬰繼二世之位，後子嬰殺趙高。見《秦始皇大傳》的記載。從《論衡·語增》中作坑 467 人，此第一次坑儒在盧生等逃走後。第二次坑殺活埋儒生 700 餘人，史料記載秦始皇先命人于驪山溫谷秘密挖坑種瓜，瓜熟後令儒生下谷觀看，儒生們觀看中有議論爭執，秦始皇即令往坑內填土全活埋了，載《詔定古文尚書序》。後人將該谷叫“坑儒谷”，漢代又叫“愍儒鄉”，在今臨潼縣西 10 公里的“洪慶堡”，後人也叫“滅文堡”。此公元前 212 年前后，甚至秦朝宮廷內任職的七十多名為“博士”的儒家中，竟有六十二名被埋掉了，而祇剩八人活着。非儒者尚有活埋趙括所率與秦作戰失敗的趙國被秦俘兵四十萬人。又建修秦始皇自己的陵墓，動用了七十多萬“刑徒”和工匠，墓竣工後，為了保墓中之密，全活埋于陵墓附近。書可以焚，人體可掩，而人心却難平，仍留傳到今二千二百多年。劉少奇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堪資后日對比鑑定。

郭沫若是科學院院長，作家，一九七四年初首都“批鬥”，摘印了他著作中的尊孔言論，準備做“矢的”批鬥，被毛主席發現而制止了。但是江青仍在一次會上公開點名，“郭老是尊孔的”，并叫喊起來亮相。“是嗎”？郭只好站得畢恭畢敬應聲：“是、是”！并準備全焚自己的所有著作即焚書。張春橋、江青都逼他寫批“秦始皇的宰相”，影射周總理，糾纏了三個多小時，郭不敢理

會，當晚即發高燒，大病一場。

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郭以《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為題致閉幕詞，恭恭敬敬地說：“允許我把我的粗糙之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郭在詩中稱“江青同志，你真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于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綫上陷陣冲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可是郭的一個兒子郭民英（抗戰時 1943 年生于重慶），在 1967 年 4 月竟自死去，沫若哀慟中尚忍氣吞聲地向該兒有關部隊，申訴自己沒有教育好孩子，民英不該死于“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1968 年 4 月他的另一個兒子郭世英（比民英大 3 歲）于北京農業大學受造反派鬥，綁架關押，第四天才由郭沫若的秘書往看，已死了三個小時。遍體鱗傷，手腕足踝被繩索勒入肉內。

粉碎“四人幫”時，郭沫若卧病醫院，即填：

### 水調歌頭

粉碎“四人幫”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皇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杰。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

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這首詞原載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載“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郭詞：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燦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翻案，奈不得人心。三項爲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兩首詞祇隔五個月零九天。

又該刊同期有陳艾撰文“我看郭沫若，”談到郭夫人用大字（每字寫在20多平方米的宣紙上）抄寫毛澤東詩詞，然後郭夫人將此一噸多重的巨著裝上吉普車，至毛澤東面前以表忠心，受到毛的稱贊。這是極少見的搞個人崇拜的手法。

以前郭沫若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在一萬公尺的高空，在圖104飛機之上，難怪陽光是格外地明亮，機內機外有着兩個太陽，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理想，凝成交響曲的樂章，像靜穆的崇高峻嶺，也像浩渺無際的重洋”。已是時過景遷了。

文化大革命是紅衛兵破四舊，毀了書及古物。而對秦之焚書坑儒，傳言只燒了幾本諸子百家雜說，坑儒是幾個方士而已。傳言“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坑儒理應

當”。毛澤東讀《封建論》呈郭老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毛在與當時中央的有關負責人談話時，還念出了自己的另一首詩：“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名高秕糠的孔學，未料二十一世紀竟建孔子學院，中國三十六所、世界四十四所，日本東京文京區有孔廟，孔學竟飄洋過海了，是流芳百世與遺臭萬年的階級鬥爭。

郭沫若的焚書準備，引動日本有人要來中國看“焚書坑儒”。其實早有紅衛兵的破四舊燒了不少書及土改毀書；致于坑儒，則以湖南省道縣放出殺人衛星于國內最大。

這真實的事是1967年8月26日夜晚，在湖南省道縣源山溝。大隊共產黨書記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率數十名民兵，把地主、富農及其子女計十八人，以鐵絲或繩捆着丟入深不見底的“溶洞”叫哨眼，由唐支書宣佈他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死刑。點名逐個推下，翌日并扔石頭入內，其中周群是橫嶺中心小學女老師，丈夫蔣漢正“文革”初即清出教師隊伍，回老家勞動。并三個孩子，大的8歲，連另一個4歲女孩丟下叫“丟哨眼”。另一著名60歲老中醫蔣文凡，臨死前討點水喝也不給。後來只爬出一個十七、八歲青壯年，也不敢去救人，七天七夜以後，周群由學生救出，已是不成人形

了。

根據湖南省兩位記者披露有關部門調查材料，周群所在的該道縣，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計 65 天 10 個區 36 個公社，468 個大隊，1590 個生產隊，2778 戶，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殺 4193 人，被迫自殺 326 人。

道縣所屬零陵地區“文革”期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殺者 7696 人，被迫自殺者 1397 人，另外致殘致傷者 2146 人。

在階級鬥爭為綱時，該死亡人中，四類份子 3576 人，占 39.33%，四類份子子女 4057 人，占 44.63%，貧下中農有點輕度歷史問題的 1099 人，占 11.54%，其他成份者 411 人，占 24.20%，其中未成年 826 人，被殺者中，最大年齡 78 歲，最小年齡祇 10 天。

殺人手段計槍殺、刀殺、沉水、炸死、投岩洞、棍棒打、繩勒吊、火燒、摔死（用于未成年孩子），當時類似此大殺事，全國有七大起，而以此放衛星最大（引文聿著《中國“左”禍》441—445 頁）。

總之，這文化大革命號稱十年浩劫，多少百萬計：人民連坐困頓，含恨而死，家庭分崩離析，書籍付之一炬，古迹破壞，墳墓挖掘，非正常死亡人口，據專家估計，最少也在 773 萬人。歸納建國以來，非正常死亡人口《華盛頓郵報》估計 8000 萬人（6000 萬—8000 萬）。

## 九、幸运和悲恫

我自一九五七年于江西省九江農業試驗站劃成右派份子，該站後經文革共死了九人，我是十人中一生者，誠九死一生話當年，怎樣還能活下來？且改造中增添一個“右派崽”，正如原來同事的農技人員周利泉，吉安縣人，歷次政治運動中在九江縣農業局也是被排擠的，回到了故里，任到了中共吉安縣委組織部部長，後來問我在這些運動中是怎樣活過來的？他倒很關心我，事實上，我也有過，自絕思想多次，在丹元村修水庫，那次跪在堤下掃臉出醜受辱時，即想了却殘生，一了百了，不忍棄妻孥，掙扎活着，當油茶棍擊而逃亡時至九江回原單位新洲場，若不收留，回憶文革時，場投江而死者四人，是如此滔滔長江水，我亦欲盡飲長江水，幸蒙收留未投。

然而新淦縣桁橋大隊的劉揚善，以捕我為名，實欲藉此外出旅游，尤以觀光廬山與長江，日後旅費可扣我妻女農業勞動收入，幸新淦縣公安局局長唐年葆不出逮捕證，并勸說他們“我是現于原單位工作”。平時在丹元村對我武鬥太狠時，我也找過這位早年教過的小學生，他也會電話給大隊一級勿武鬥，後該大隊竟發函至新洲場，誣陷我在家鄉民憤很大，要新洲場把我押送回家。場不便留我了，對我說此事非場方意見，我只得要求場方，經同意讓我獨自回家，于是又流亡徘徊于各親友處。

挨到了除夕前夜到丹元村，尚不敢入家門，黃昏尚

蹲于村後山上深柴叢裏，不敢下山，何去何從，見樹枝欲上吊，惜身上無繩。只有一根皮褲帶，吊頸太短，未成。

聯想到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住了四天，是巡視大江南的過程中去的。是否批鬥彭德懷時，曾說如果解放軍聽彭德懷的話，我就上山打游擊之語。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有人說毛的巡視大江南的過程，便是佈置即將發動“文革”，上井岡山是萬一即“文革”事情進程不理想，則再來從井岡山打游擊開始，所以該詞寫于一九六五年五月而于一九七六年一月，才交《詩刊》發表，詞中強調革命的成功是他個人的力量，“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接着朱德于一九七六年二月發表了《昔上井岡山》，他強調革命的成功是集體的力量，“路綫成衆志”，“老中青一體”。當時，“文革”把老革命很多變成了反革命，有點不知誰是真馬列，假馬列？搞不清楚，王、張、江、姚四人幫篡黨奪權，最後還是真馬列要推翻假馬列的“真心搞馬列，地覆天又翻”。這些給了我的啓明曙光，真、假馬列，日後定見分曉，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是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鬥爭。市井有聯曰：“九天攬月，月呈陰晴圓缺；五洋捉鱉，鱉乃江張姚王”。

又回想到一九五八年上岷山，妻同舟共濟，岷山雪夜縫婦給了我的溫暖，詩載《贛水悠悠》是中正大學校

友詩詞薈萃。《岷山雪夜縫婦》詩：

萬籟俱已寂。竹舍孤燈光，  
軋軋催杼轉，嫗婦縫紉忙。  
瓦隙雪飄墜，頂笠披蓑防，  
遺得他人暖，難顧自身涼。  
雪花浸衾裯，尋破布蓋張，  
嬌兒蝸縮睡，體冷似冰霜。  
引領待黎明，瘞雪幸未僵。  
只緣夫戴盆，隨來此山鄉。  
夫勞糊己口，家賴婦掙糧；  
子女尚肄業，求免輟學荒。  
機聲系四命，針針碎肝腸，  
且冀浮雲散，冬盡綻芬芳。

注：戴盆：覆盆蜕变。《抱朴子·辨問》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李白《贈宣城趙太守》詩：愿借羲皇景，为人照覆盆。此喻戴“右派份子”帽子。

鄧繼環館長也贈金玉之句：

雪夜岷山暗，孤燈衝雪光，  
懿德賢慧婦，縫紉徹夜忙。  
舍瓦漏殘雪，蓑衣斗笠防，  
但顧人間暖，何懼自家涼。  
冷雪凍寒衾，破布怎蓋張，  
嬌兒難入睡，效母傲雪霜，  
任憑天酷冷，休把兒凍僵。  
只因覆盆冤，合家困異鄉。



夫子賣苦力，賢內掙食糧，  
子女憂輟學，天老恐地荒。  
機輪飛滾轉，骨肉連心腸，  
日出化冰雪，德婦傳名芳。

妻實是我家中興主，本已冬盡春來，應算幸運，可是却又是冷空氣寒流侵襲降臨，早春乍暖又降寒，草色遙看近却無。

我家被故鄉公社書記黃發龍不準回原籍，分于丹元，村民無敢接近我家，惟一同宗鄧短仔之妻，天天來我家倒淘米水及米湯養其豬，尚認為有人接近是幸事，正可利用她以竊悉村中情況，“今晚會不會鬥爭呀？打呀？”于是兩婦附耳切切私語，呼吸接觸，該婦久患肺結核重症，妻因此感染，不得壽考，心甚悲切。

後來妻逝世于二〇〇〇年八月卅一日，享年八十，葬廬山東林寺之華裔陵園內敬賢園。挽其聯曰：

相結髮六十三年，青梅竹馬，施衿扎禡，逝卿均成斷腸史；

伴夫冤二旬一稔，茹苦含辛，共濟同舟，遺叟只是彈淚人。

家居此村，外地子女通訊，也被沒收，只有聯系毗鄰五里許的妹夫村桓田，由妹轉，妹夫亦于政治運動妄加“地主”份子，不便往來。一次僅七歲許的外甥侯明強送信，妹給其隱藏于扎高的疊折褲腳內，赤足破履，避走山徑、阡陌小道，適經“社里村”遇本大隊治保主

任劉揚善，正在路旁栽禾，苛斥叫“住”進行搜身，解衣脫鞋，切膚摸尋未得，甥繼往我住村行，忽揚善叫其回，脫落甥扎束的褲脚得信，當即賞賜幾巴掌，沒收此信，所謂公民有通訊自由權何在？甥惟哭至我家談。後該甥竟考取廈門大學金融系，我贈一支鋼筆而草“贈筆歌”以勉之，且錄一、二：

贈君一支筆，憶爾傳書日，阡陌辱搜身，刺激化動力。

贈君一支筆，慶登“厦大”籍；珍惜四年時，白駒易過隙。

贈君一支筆，毋歎筆劣質，堪以繪藍圖，山川留爾迹。

贈君一支筆，勿忘父經歷，辛酸夜課子，光耀望可即。

而該甥後頗有成，獲碩士、高級經濟師。

我這次的慘景，遠勝第一次反右運動，彼時只受“一拳一杯水”，這次不知凡幾。一次新洲小學學生，幹革命鍛煉時鬥我“頑固”，我說不是“頑固”是“頑強”。應該頑強地活下去，所以除夕前夜，外歸待黑偷入家門，仍被發現又叫去挨鬥，我也仍掙扎活下來了。

然而回思往事，我被劃右派份子時，只不過三十六歲，正是青壯年工作時，很想學以致用，在農業科技上做一點微不足道之事，選出過棉花品種“八葫桃”，“毛葉垂鈴”；油菜品種“復角果油菜”等。可是被“造反

有理，革命無罪”的紅衛兵或領導沒收無遺了。

八蒴桃棉：是一個八瓣棉桃單鈴，經過兩年的株系單鈴選育，其後代多五瓣棉鈴，而無一個三瓣棉鈴，纖維長度，接近長絨棉，衣分也較高，纖維色澤是乳白色，瑞昌縣供銷社一位從事棉檢四十年的老棉檢人員對我說，他從未見過如此優良色澤的棉纖維。因棉花的果實屬蒴果，故名“八蒴桃”。

毛葉垂鈴棉：是棉花葉片的正反兩面均具較長的絨毛，害蟲不趨葉產卵，和不吃此種棉葉，有利抗蟲。其棉鈴柄較長，棉鈴成長後便下垂，吐絮時鈴殼在上，遇雨絮不積水，棉殼不藏水，不利棉花病菌繁殖，又有利抗病害。

復角果油菜：是油菜的果實屬角果，一般油菜的花是四片，花冠如十字，故屬十字花科，一朵花具雌蕊一枚，雄蕊六枚其中二枚退化，故稱四強雄蕊，受粉後一花只能結成一個果實，即單角果。然而這復角果油菜，是一朵花雖然花冠四片，但是花內雌蕊，可多至二枚，三枚，四枚，達五枚，雄蕊隨雌蕊枚數而成的4的倍數，受粉能成角果2-5枚，在油菜主莖，尤其頂端，結得較多如此角果，尚得從其肥料研究之，尤對微量元素之施用研究。

八蒴桃棉，毛葉垂鈴棉，均參與一九五七年國內優良棉花品種對比試驗，其中有南京華東農科院選育推廣的“華東2號”，廣西百色農科所選育推廣的“廣西毛

葉抗蟲棉”等，增產優質以八葫桃屬首位，依次華東2號，毛葉垂鈴棉，廣西毛葉抗蟲棉等。

復角果油菜與當地白菜型油菜生產種對比，初步試驗，能增產種籽與提高含油率，增加含油產量。

新洲場牧牛是頗優閑，我利用了這優閑時光，不揣淺陋寫了《植棉三字經》、《滅紅鈴蟲三字經》、《農學三字經》、《放牛四言雜字》、《血吸蟲病腹水母牛受孕記》、《棉花配比施肥》等，亦可聊作科學普及資料，可惜稿被抄沒。

只因幼女受株連失學失業需頂職，我只得提前退休。隨之即受聘江西省九江農業學校（前身江西省九江農學院）任教，地址于馬回嶺，原于江西省九江農業試驗站（後名九江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今九江市農業科學研究所）代站長，旱作研究室（組）主任（組長），被錯劃右派，地址亦在馬回嶺。草填：

## 水调歌头

### 重返馬回嶺

“重返馬回嶺，賴滅四人奸，睽運二十餘稔，憶往泪潸潸。所幸風陵安渡，回顧傷亡不忍，拂悸有心酸。身受雪辜日，報國再揚帆。

行四化，追科學，戰農關，以前科研抄沒，思整復原難！因是桑榆景晚，雖不加鞭奮蹄，也只夕陽間。燼燭存餘亮，繼晷照明攀。”

于此教學之餘，仍利用市農科所、縣農科所、學校農場進行試驗研究，並得市農科所業務所長熊烈民副研究員之親自執行甚

感。

一九八六年辞聘江西省九江农业学校教师草《告别》诗：

重回又别离，但与愿无违，  
东隅虽早逝，桑榆尚拾遗。  
死灰献余热，老牛奋夕犁，  
攻关肥微素，增产益庶黎。

乃至右派被錯劃改正後，所試驗研究的“微量元素復合肥”與國內外同類產品對比試驗能領先，詳所著《微量元素復合肥試驗研究開發》。又噴灑蔬菜，有利人體健康，是增加了蔬菜中的微量元素。有利成含硒茶為可防癌抗癌茶，廬山大面積雲霧茶可供改進。《復合微肥噴灑蔬菜對防癌抗癌帶來希望》論文，已選入《中國醫藥衛生學術文庫》論文編號 Y23-1257。願與陝西紫陽茶之防癌抗癌相比美，當繼續研究之。

該微量元素復合肥依作物分類，曾合作與九江江洲科技市場批量投產，為採購員得回扣，進次品原料，亦因購貨化工知識不熟，認貨不辨，復合有失理論肥效，造成有失農民信譽。一九九九年長江大水，江堤破，廠浸倒，停產了，尚欲東山再起。

未再起之時，曾街頭零售。草擬《擺地攤沽微肥》句：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耄耋孺子牛，夕陽惟奮犁；  
研斯奇材貨，效毛遂奧秘；  
蹲站擺地攤，增产益庶黎；  
伊始固顏厚，勝乞叩門馳。

注：微量元素復合肥，其元素尚屬稀奇材料，有利農作物增产優質。配方奇異，毛遂自荐奇才。

凡此反右，光陰浪費，成果被劫，悲慟莫名。一九七八年冬得右派錯劃改正。心想把浪費時光，追補上去，草擬《追逝》

戴盆二十載，罪屬莫須有，  
攻農圖報國，白了少年首。  
逝者其如斯，追補忘夜晝。  
花甲重起步，古稀稍成就，  
~~耄耋續奮犁，期頤從心欲。~~

從兄鍾伯，原華中大學，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西北師範學院教授，聞我從事土壤微肥的探討，偕華中農學院（今華中農業大學）共同研究的《棉花潛在性缺硼與有效施硼的應用》獲國務院農牧漁業部農業技術改進一等獎，贈詩三首：

曾渡風陵險惡船，却疑媧手是虛傳，  
輸君妙補人間地，贏得豐收穰穰歡。  
老去何曾效一奇，靜觀鯤化我心知，  
殷勤寄語兒曹識，小叔原來不是痴。  
曾役蠻邦困楚鞭，覆盆長夜仰呼天，  
男兒有志能回轉，洗盡中華毒口禪。

山東曲阜師範學院中文系曾靜教授賜聯：

擅棉作以蜚聲，藝真則譽遠；  
攻微肥而軼藍，桃碩兼絨長。

湖北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陳家潤，農藝班友賜詩曰：

烏雲滾滾漫天佈，荆棘叢叢遍地栽。  
多少英才無限恨，無數冤屈有餘哀，  
額慶英明匡正道。鋤奸扶危國泰來。

四人幫正在篡黨奪權，居然在一九七六年之秋，行政傳達那時有地震，囑作戒備。其時我在新洲四分場勞動，一個晚上雷鳴，均出屋，見長江上游西方，烏雲滾滾，雷聲陣陣，以為地震開始，將雨入室躲，敞門備逃。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澤東逝世，十月六日打倒四人幫，後不傳地震，此將是地殼塌震？抑將政變或反政變的政治地震呢？幸未成災。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向中共中央送交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既撥亂反正，我只有等待落實，原送我勞動教養時不收，經彭澤想游小孤山不果，今落實，我住星子縣長子家，便往游廬山秀峰寺，并略抒懷：

落實待時日，游山且偷閑，  
渴飲銀河水，饑餐星子饅。  
冤假虎威定，案豈龍捲懸，  
朝曦驅霧散，秀峰現真顏。

註：落實：撥亂反正，落實政策。銀河水：秀峰寺龍潭水，來自“疑是銀河落九天”的廬山黃岩瀑布。星子饅：星子縣購饅備饑。龍捲懸：懸案豈若龍捲風捲而懸之。

一九七一年夏，陳毅代表周恩來已往北戴河看望朱

德，康克清，朱德慢慢說其心聲：“我們這些人，革命幹了一輩子，現為顧全大局，做出這樣的容忍和個人的犧牲，在國際共產史上是少有的。將來問題都會清楚的。”這後幾句話，他怕陳毅未聽懂，重復了一遍。此顧全大局，豈鷸蚌之旁有漁翁耶？結果傳說朱德死于車禍。

蓋1969年10月17日會議發生爭執，氣氛很緊張，毛主席突然離題提出，國際形勢可能突然惡化“蘇聯要宣布開戰，美帝要準備入侵，蔣介石布署反攻大陸，印度要侵占西藏”。

不少老革命看着老革命被打成了反革命諱解，一次王震去請示葉劍英，“幹了一輩子的革命，現在竟成反革命！究竟怎樣辦？”葉對王做了一個手勢，伸出一手握緊拳頭，翹起一個大母指，然後大母指彎下成一緊拳，再往前一伸直手。後理解為現在大母指尚翹起，彎下便是待大母指倒下，握拳伸直手便是再動手，正如逮捕江青時，江青說：“怎辦？主席尸骨未寒，你們就這樣行事嗎？”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十年間，是文化大革命，也是第二次反右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起的。毛澤東批評江青，你們不要搞四人幫，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豈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背後，尚有其一特大後臺，是誰？累計之。幾人幫邪？這十年歷史上稱“十年浩劫”。自沈重的一九五七伊始，經過“歷史悲雲”，繼之“十年浩劫”。二十年歲



月漫長。

文化大革命時，中國與蘇聯早已交惡，流亡于莫斯科的王明，竟編著《毛的背叛》，他認為一九六六年毛以“文化革命，實質是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的中國人民以及蘇聯和世界共產運動進行的一次反革命”。王明說“毛在國內利用軍事力量，摧毀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的中國人民，惟毛一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譚震林、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和薄一波，一個個受到無情的打倒、打擊和鎮壓。朱德、陳毅、徐向前和聶榮臻被騷擾。中共書記處的成員王稼祥、黃國誠、羅瑞卿、習仲勳、王任重、劉寧一、楊尚昆、胡喬木和劉瀾濤受到傷害。中共中央委員會174名委員中，140名遭迫害，佔80.5%。毛澤東說：“我一生只做了二件大好事，一件是諦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件是進行了文化大革命。”

歷史上有皇帝被拉下馬，太上皇鞏位者，有始作俑者，這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手發動的，由于彭真未要北京報紙登載姚文元評吳晗的《海瑞罷官》，認為不該罷了彭德懷的官，毛便對江青說：“你到上海去找林彪，看看北京是他姓彭的天下還是姓誰的天下？”林彪一來，便發起一個“紅衛兵”運動，毛澤東曾八次接見“紅衛兵”大鬧革命，弄得天翻地覆。

後來林彪也看到了老革命多被打成反革命，自己只是黨章上接班人，尚未接到手，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未

經人民代表大會，也就以“叛徒”“內奸”“工賊”打倒了。對“國家主席”一職，毛說不設，林說要設。毛巡視江南于武漢發言：“有人想當國家主席”！林感到矛頭針對自身了等等；便想謀害毛主席云。趁毛此次南方出巡，于鐵路南京至上海，準備其火車經過時，炸橋，毛于南京，車上接見了許世友交代了工作，即轉津浦鐵路回北京；一說上海未下火車，車上議事，要對毛謀殺，天機洩漏，便從山海關乘三叉戟飛機南下廣州。林彪反革命集團計劃以廣州為中心，劃長江與毛相對峙，另立中央。所以江西的省級機關單位，都往贛南遷移，可是當林彪飛機起飛，周恩來即通知關閉全國飛機場，廣州機場熄了燈，林機不得落，飛返山海關機場也無燈，乃往北飛，周已脅持空軍司令吳法憲于人民大會堂同在微機上監視，見林乘的飛機已北飛，出了國界入了蒙古境，周對吳說：“怎麼辦呢？”吳說：“發導彈打！”結果請求毛主席，毛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一說發了三組導彈九枚，才擊落的，一說毛、周與林通了話，歡迎其回來，林立果怕回來，搶奪駕駛而飛機墜毀。另一說飛機爲了躲避導彈而低飛落地，一翅觸地而引起爆炸，故尸新鮮，尤以葉群如生，不似高空爆炸，一說飛機着火于空中燒了二十分鐘才墜落，誰說可信？總之 256 三叉戟飛機墜毀于蒙古溫都爾汗，林彪落得個折戟沈沙，機上八男一女均死無完尸，林彪暨妻葉群（林辦公室主任）子林立果（空軍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

副部長) 劉沛豐 (空軍辦公室副處長), 楊振剛 (林彪的專車司機), 邵起良 (機組空勤特設機械師), 張延奎 (機組空勤機械師), 李平 (機組空勤主管機械師), 潘景寅 (機長、駕駛員、時任空軍專機副政委)。是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2 時 30 分。周于人民大會堂三天三夜未合眼, 繼此、電話各省、市、軍區, 處理林彪的黨羽爪牙。林機墜毀事報告毛主席, 毛很高興說: “這是理想的結果!” 又一說毛要周寫檢討, 閱檢討後, 均緘口未表態, 直到第七次檢討, 毛看後才說了一句“算了吧”!

爲着樹立和維護林彪副統帥的地位, 衝擊打倒了黨政軍如此多老幹部, 學校停課、工廠停工, 舉國上下無一幸免, 煤炭部長張霖之活活打死。姚桐斌榮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1960 年航天材料及工藝研究所所長, 研制生產出兩種性能優良的高溫鈦焊合金, 爲我國自行研制的新型火箭發動機奠定了材料基礎, 其性能和質地, 在世界同類產品中是佼佼者。他是留學英國的博士, 在我國內高中于 1941 年在吉安青原山國立十三中學畢業, 江西全省高中畢業生會考, 個人總分第一名; 大學于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礦冶系工學士, 獲英博士初于英國研究, 後到西德繼續研究。1956 年 9 月于瑞士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7 年在周恩來親自關懷下, 從海外歸來的著名的火箭材料專家, 1968 年 6 月 8 日被“造反派”整死了, 搬至其家丟于沙發上, 其妻工作返家, 保姆哭訴“姚所長打死了”! 時年 45 歲, 正是科學家的

黃金時期。

可是1971年12月，一次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回來無往日鎮定，臉色變灰白，即揮手，“散會”！“散會”！衛士長張樹迎扶着周恩來走進電梯，明顯感到周全身在發顫，走進游泳池！毛主席臥室的門窗大開，毛主席平躺在床上，臉青唇紫，似乎沒了呼吸。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也冷靜地離床較遠站着，周緊張向醫生問情形，判病況，緊急調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主席的臉有了血色，大口喘着氣；稍後，眼漸睜開，周到毛床邊，雙手握着毛主席的手，泪水奪出，語音哽咽，衝口而出說：“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中！”，是否該十二月會議討論林彪反黨集團的來龍去脈等等，涉及毛主席的領導大權？毛主席知會議情況，致使喉痰哽阻，幾致畢命。知毛心思想者，周最模底，張樹迎常對周秉德（恩來侄女）說：“你伯父一直維持毛澤東的地位，你說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爲了黨！一個這麼大的國家，總歸得有個頭兒吧！”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遞捕江青，撒潑脫褲子稱“要解手”，想待他的援兵，當女法警押她走時，只有說“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們竟這樣行動嗎？”最終江青保釋外出在家就醫，于浴室自縊死。如此，文化大革命結束；只是撥亂反正，善後工作。史有助桀爲虐者，呂雉篡漢，韓信受戮，周勃中興者。

## 十、錯划改正

後來史料，對“反右派鬥爭”的評價，是這樣寫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以所謂“大鳴大放”，攻擊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同年六月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對右派的進攻，實行反擊，到一九五八年夏末基本結束，當時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對劃定“右派份子”的人進行復查，將錯劃的作了實事求是的改正。

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只這十年，這以前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

在鄧小平，胡耀邦的關懷下，尤其胡耀邦，那次胡任中共第一書記，出國訪問回，于烏魯木齊即打電話，問反右情況。胡更以非凡的膽略、魄力和熱忱，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他提出的“兩不管”原則：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

時候，什麼情況搞的；“不管“是那一級，什麼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過來。大刀闊斧，勢如破竹，六十年代的“叛徒集團”。“牛鬼蛇神”，五十年代的五十多萬“被錯劃的右派”，及此以前歷次政治運動，遺下的大小數不勝數的錯案，都在這些日子內昭雪沈冤，重見天日。

未改正的右派份子，只有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五人。

後 1989.12.16 彭文應終於滬獲平反，却是其 85 歲冥壽誕辰時，彭曾救助周恩來經濟于困難之時。（載國立中正大學前期校友通訊 120 期）

這件事值得大書特書，使中國元氣，得以恢復。

陳雲談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由于 1943 年 3 月 20 日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如此赋予了毛的权力超越于中央集体之上，解放前未发生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一九五一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争端开始。

正是党内高层不正常，刘少奇当了主席不便说，恩来、陈云算同犯了错误不能说，朱德意见较少，林彪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不便多说，由彭德怀来写这封信最合适，彭后自述“当时对那些“左”

的現象非常忧虑，不幸在廬山打成了“反黨集團”頭子，  
“文革”搞得天下大亂……（書刊報 2006 年 9 月 5 日 4 版頁）

致于對我是如何錯劃改正呢？我在大鳴大放中，未鳴未放，對於寫申請上山下鄉，大字報表態我準備了上山下鄉寫得簡單，是被扣上不願下放上山下鄉，也是罪狀。所有罪狀如前述“對肅反不滿”等。一九五八年一月份，江西省九江農業試驗站該單位，當時組織領導關係，名譽上是屬江西省農林廳的機構，可是省廳只下達農業科研業務和下撥經費，行政領導省不管，九江地區不管，九江縣更不管，中共黨支部却是委托該站所在地馬回嶺區委員會代管，因幹部中只站長一人是黨員和幾個農工是黨員。

如前述一九五八年七月上了岷山，一九五九年九月即任教師，如前述經受了『文革』，一九七八年我又被起用于新洲中學（新洲墾殖場學校）任教師，授高初中化學和動、植物、生物課。當公佈錯劃改正時，九江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原省九江農業試驗站于一九五九年改的名）已經準備作錯劃改正，定了行政人員張守德二人，作調查處理，可是他們找不到我的原始檔案。但我見到的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廿八日檔案由押送我去彭澤芙蓉農場勞動教養的人胡克柏隨身帶着，該場不收又帶到九江縣農林牧科下屬機構，茆山頭林牧農試驗場而置該場，後調往國營岷山墾殖場勞動，由押解人帶到了

該場，以後由該場調九江市農業技術學校任教師，及至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岷山分校任教，至該校下馬調九江縣農業科學研究所從事試驗研究，及其過程是沒有檔案相隨，不知檔案所置。

由于找不到檔案，不知為何錯劃以便改正。後來在九江地委檔案館南湖賓館地下室，找到了一封我給地委書記、（後江西省人大副主任）王書楓的信，是反右定了我為極右份子，兼歷史反革命份子，處理送勞動教養時，臨行前夕于馬回嶺寫置郵的大膽認為這是冤案，是一些吹毛求疵、斷章取義莫須有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希能申冤！于是以此為依據，進行錯劃改正。認為我鳴放事迹是當時報紙上登的，非出我心才詆毀攻擊，于是我這二十一年前已自定的冤案，也就真正成為冤假錯案。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六日中國共產黨江西省九江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支部委員會，給我的通知書：“鄧鍾瑞同志：關於對你的右派份子的改正問題，根據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和中共中央（78）55號文件精神，經九江地區審查改正錯劃右派工作領導小組，以潯審改（79）第137號文件批准，同意改正，撤銷劃右派所受的原處分決定，和中共九江縣五人小組甄別定案小組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對你的反革命分子的結論。恢復政治名譽，從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復原農技十級工資待遇。致禮



但是右派的錯劃改正，其分類有“普右”即普通右派，“極右”即極端右派，“中右”即中間右派，“右派言行”四類，有文件可查。另有“選舉右派”如前述沈德章，尚自知之。“檔案右派”是當時單位領導把你的右派事迹，寫于你的檔案袋中，尚不自知已是右派，亦稱“無名右派”。更有因成“老右”而致殘、致死，被害者如前述最是傷心瞎眼的“瞎子右派”葉翔中。筆誤寫“毛主席萬歲”成“萬主席萬歲”，打跌成拐子的“拐子右派”萬祥雲。賣力捐擔成駝背的“駝子右派”陳學思。鬥成“痴呆人而非右”的程德昌。流浪無食“逼扒右派”凌興都。從不多言，未鳴未放，江西教育學院老師（當時未評職稱），後廬山東林寺佛教大學古漢語教授宗遠崖先生，成有名的“啞巴右派”。北京大學才女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1957年劃成右派，繼成現刑反革命判刑20年，曾保釋又入獄，被強姦，而拉得內衣衫扣子無一粒，由其妹寄入針綫，自將褂褲縫聯成一體，以鬥抗強姦，成爲“強姦右派”。1968年4月29日時年36歲，在上海秘密槍決，口塞東西不能言。還有上海公安局人，向其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却無骨灰交其家屬。

如此右派份子，後九類又將如何改正錯劃？

## 後語

這本《右派滄桑》小冊子，主要是記載一點自己遭

遇經歷基層局部情況的見聞，實事求是，不虛美，不隱惡，是亂鋤中一棵無名小草的基層雜憶，九死一生話當年，為時太晚，但願“右派依然讓我們痛心”的人，能寫出其更多的金玉大作，也留給我們自己及所有受株連的子女，作前車之鑒。

只惜我乃農技人員，僅有一枝似鋤小筆，不如作家，文學家，史學家，可用如椽大筆，早已把這段傷痕文史，寫了全國性的，上層性的，已淋漓盡致了。

我和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是欲使這當時實情，留傳下去，不致暝滅。也寄望如此歷史，一去不復返了。這正若老伴生前所說的“鬼畫符”，“自現己醜”，誠然、牛鬼畫的偷生符，是否能啓視一些不知其時悲劇、浩劫情況的人，引以知之。原九江縣農業局農技人員周清泉，後回其吉安縣任中共縣委組織部部長，來函詢我是怎樣活過來的？我回信告知總結為“臉皮厚，經得掃。內人賢，共患難。子女好，無怨言。不怕死，挨住打。看得清，黨內亂。會平息，忍待時”。

前面我所談的反右派花絮是基層概況，右派的不幸，毛澤東曾說：“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大右派章伯鈞，癌症使其無回天之力，惟英國際名人辭典上了他的名字。羅隆基在某女士離開后，成了“孤人寡夫”，晚上摸其心痛病救急藥掉地不得而猝死。儲安平生不見人，死不見尸，惟其友人回憶開門拾得“再見！平安！”

紙條。章乃器至死堅信：“時間會解決問題”李天德上万言書《獻國策》，地區法院建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縣法院改判徒刑得生，成六年囚徒。

## 反右派歌曲

- 塑造右派  
(歌一)  
錯話改正
- “右派右派，像个妖怪，  
当面他說好，背後來破壞”！
- “右派右派，不是妖怪，  
存心要倒他，謊言他破壞”。
- 塑造右派  
(歌二)
- 錯話改正
-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  
興風作浪，要想上台。  
是白說黑，是好說壞。  
混水摸魚，心腸太隘，  
人民同心，反擊右派。  
攻擊右派，實是魔怪。  
興風作浪，搞他下台。  
是白說黑，是好說壞，  
無中生有，心腸太壞。  
鄧胡同心，平反右派。
- 塑造右派  
(歌三)
- “唱起山歌你且聽，罵聲右派害人精，  
陽關大道你不走，偏向獨木小橋行。  
東邊點火西邊罵，硬要天下不太平，  
只想偷梁來換柱，挖我人民專政根，

人民個個怒火起，团团來把他围定，  
你拿鋤頭我拿鏟，株株毒草都鋤盡”。  
歌二、三（均載《反右派始末》585頁）

錯話改正 “唱起山歌你且聽，捏造右派害人精，  
陽光大道不讓走，戴他緊箍咒帽行，  
煽動壞蛋把他罵，硬要天下不太平，  
吐故納新來換柱，引蛇出洞好除根，  
人民敢怒不敢言，騙他鳴放把罪定，  
小平、耀邦大平反，右派重見天日晴”。

慚愧所攻農藝，只有如鋤小筆寫此，然而九江县建設局副局長董祖照閱我《漫步滄桑》有感，竟賜金玉之作《七律》：

“先生巨筆寫春秋，滿吐玃珠話戚休。  
磊落光明偏遇晦，忠言諫語反招尤。  
無情歲月艱難度，大好年華空白流。  
霧散天開終見日，何須回首計沈浮。”

愧感交加，對滄桑拙作不妥之處，尚請閱者大方家指正。

人云：中國共產黨是鞏固的，個人的錯誤，全黨是有錯必糾，三個代表，振興中華。

（本書承蒙廈門大學歷史系羅耀九教授，近代思想史專家，通信指導，南鋼中學高級教師，文史學家王章慶先生，審閱斧正，皆前國立中正大學校友。及九江縣政協陳文夫先生主管老協、陶淵明詩詞學會，均先後審閱，謹此致謝。）

## 作者简历

鄧鍾瑞，别号辑五，晚号桑榆居士。江西新干县（经纬）楼前村人，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生，新淦县振国小学、江西省立南昌一中初中、国立十三中高中等校毕业，国立中正大学（农艺系）学士，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技术员，派驻乐平县、瑞昌县农技工作队（队长），江西省农业专科学校教师，瑞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站长）兼任瑞昌县人民政府农林水利科业务负责人，江西省九江农业试验站旱作研究室（主任）主任（组长），曾代站长。1958年经历“沉重的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继任九江市农业技术学校教师、劳动大学岷山分校大专部教师、九江（市）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业务负责人、国营新洲垦殖场棉（花）试（验）站业务负责人兼育种组（组长），气象哨指导。经历“文革”浩劫后，继任新洲中学高中化学生物教师，『右』经错划改正任九江县农业局六级农艺师（中国农学会会员高级农艺师），江西省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农业咨询（委）员，江西省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会农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九江农业学校讲师。先后偕江西省棉花科学研究所、九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九江县农科所、江洲科技市场等地，以复合微肥喷试棉花、水稻、油菜

等，江西三湖园艺场，江西省吉安农业学校，江西农业大学以复合微肥喷试柑桔、棉花，又与华中农业大学参与其“对棉花潜在性缺硼与有效施硼的应用”，同获国务院农牧渔业部农业技术改进一等奖，并获荣誉证书。以长期坚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复合微肥的配合应用”获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九江市农牧局二处农业技术改进奖，九江县人民政府老有所为精英奖。《复合微肥喷洒蔬菜对防癌抗癌带来希望》该文已选入《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论文编号 Y23-1257。晚年于国、省级刊物、登载论文 22 篇，编著《棉花配比施肥》、《微量元素复合肥试研开发》、《右派沧桑》三书已脱稿付梓。九江江洲科技市场已批量投产“微量元素复合肥”。一九九九年长江大水，江洲堤破厂倒停产，且待东山再起。育种选育了棉花“八蒴桃”棉、“毛叶垂铃”棉，“复角果油菜”品种，一九五七年于江西省九江农业试验站参与“全国各该作物区域化试验”名列前茅，籽棉、皮棉产量依次棉种为“八蒴桃”、“华东 2 号”、“毛叶垂铃”、“广西毛叶抗虫”棉，八蒴桃棉株系选育，后代多 5 瓣铃而无一 3 瓣铃。复角果油菜比白菜型油菜，增加结实数含油率，单花能结 2—5 角果数，以主茎较多。惜皆被造反有理，“文革”革命无罪，红卫兵毁灭无余。

# 右派滄桑

## 全文提要

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只這十年，這以前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

文聿著《中國“左禍”》引鄧小平提詞：根深蒂固的是“左”的東西。“左”的根子很深。“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非賣品)

	右派揭谛		
揭 谛 揭 谛	右	派	般 若 揭 谛
	沧桑		
	反右真谛		

- ※一棵无名小草的基层杂忆
- ※引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往事
- ※九死一生夕阳耄耋话当年

桑榆 邓钟瑞 编著

王章庆 罗耀九 校正



新  
乎  
知  
覺

PDG